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资料



增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

陈集歼灭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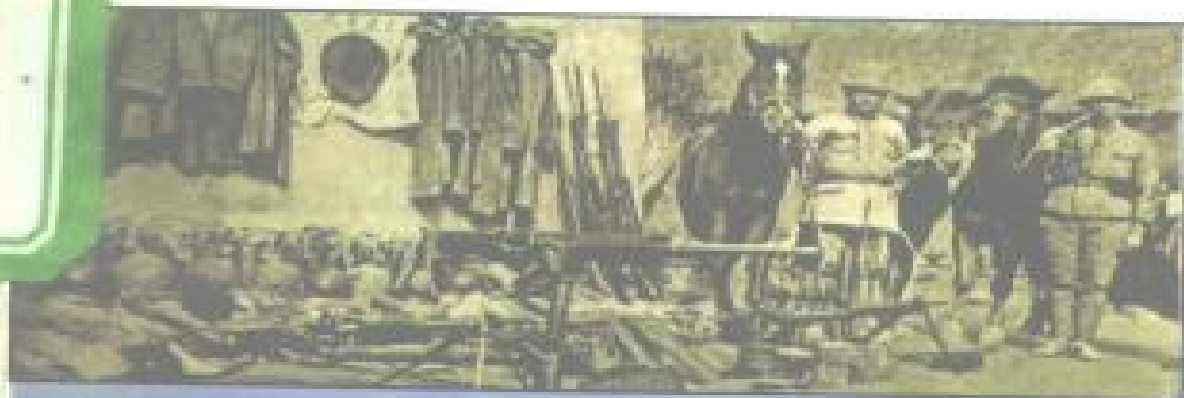
在我军第一所航校学飞行

援越顾问团工作琐忆

【上图】一九四八年春，在部队中作报告时的陈集。他是位为人和善的军事将领。

【中图】陈集同志在越南战场上指挥作战时的照片。

【下图】陈集同志在越南战场上指挥作战时的照片。



D239
6-42

930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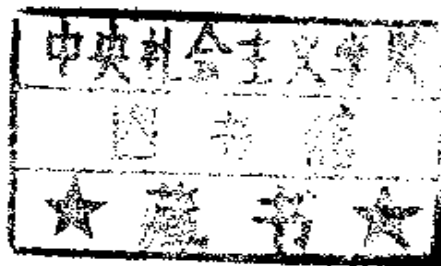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五十四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200041427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年·北京

责任编辑：汪新 陈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五十四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6
ISBN 7-80023-868-7

I. 中… I. ①中… ②中…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N.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05092号

中共党史资料(第五十四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1929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35号

电话:(010)2581570 传真:(010)258153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春雷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6.5印张 150千字

1995年6月北京第1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ISBN 7-80023-868-7/K·798

定 价:5.50元

DH94/19

目 录

文 献

增强新干部新党员的党性 陈 云(1)

回 忆 录

忆抗日战争时期党在东北的秘密工作 钟子云(7)

惨绝人寰的长城“无人区” 李运昌(14)

陈集歼灭战 邢泽 王志甲 沈政 孙志杰(26)

回忆嫩江剿匪 张汉丞(31)

在我军第一所航校学飞行 韩明阳(55)

援越顾问团工作琐忆 张德群(71)

专 题 资 料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围绕三民

主义的一场论战 郑德荣 董世明(77)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

的财经工作 高宏的(92)

- 毛泽东在安徽推广责任田的前前后后 刘以顺(102)
“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冤案
酿成始末 陈文斌(123)

会议介绍

- 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 林蕴晖(136)

大事记

-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
大事记(之四) 编写组(151)

史实考订

- 中央致叶挺两则电文释疑 余海明(201)

增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

陈 云

编者按：这是陈云同志于1942年9月在延安写的一篇未曾发表过的文稿。原标题为《延安新干部党性薄弱现象及如何增强其党性问题》。在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特予刊出以志纪念。该文现已收入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陈云论党的建设》一书。

最近，中组部需调一批人去敌占区工作，其先决条件是，他们要在敌后有可利用的社会关系，或能找到立足过渡的关系。通过在各机关、学校寻找和与有关同志谈话，在条件比较合适的一百七十七人中，除少数人表示服从党的分配，接受工作外，其余大部分人均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或掩饰推诿，或当面拒绝。这些人都是抗战时期入党的知识青年。在国内外斗争日益艰难的时期，尤其在整风时期，竟有这样多的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观念如此薄弱，实在是相当严重的现象。

不服从党的工作分配的是些什么人呢？

第一，自称文化人的人。这些人表面上以无秘密工作经验或社会关系与身体不好等为理由，实际上自命不凡，

以文学家、戏剧家、歌唱家自居，怕危险或离不开爱人。

第二，在社会上混过事，有些世故经验，抗战时走顺风入党的人。这些人在谈话时，尽量减少某社会关系的可利用程度，实际上是因家在延安，现在工作相当稳定，不愿做危险的事。

第三，年轻幼稚、苟安现状及对秘密工作恐惧，或在参加革命时即多少带有光耀门庭思想的人。这些人在延安机关、学校中是相当多的。他们除丢不开爱人、对秘密工作恐惧、怕危险外，还有不少是因为现在回去，没有一官半职，觉得对家庭乡里，面子上不好看。

第四，一帆风顺的大学生。他们原是少爷出身，参加革命时有赶热闹的成分。他们的社会关系并不坏，却要描写得无法利用，实际上也是离不开爱人，怕危险。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几种人不接受工作的一个共同的基本原因，就是没有为革命随时准备牺牲生命的明确观念。他们中也有人曾想到革命难免要牺牲，但最好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万一临到自己头上，也应尽量躲避。所以，遇到党分配有生命危险的工作时，他们总要用尽一切办法来推诿，而且为了推诿得很漂亮，使党不宜察觉，他们总有一大堆理由为自己辩护，什么自己“特殊”呀，“不合个性”呀，党还“不够了解”他呀，他“还不到牺牲的时候”呀。在他们看来，不接受党要求的工作，是因为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不合乎干部政策。甚至少数人竟含有这样极端荒谬的思想，以为拒绝党的工作，实际是为了爱护党；如果接受工作，反而是一时的感情用事，党性不强，不替党爱护干部。

另外,从各种表示愿意接受工作的人来看,也还没有那种在延安牵挂多、身体弱、敌后关系不好,而能经过考虑,决心为了党的利益去牺牲个人一切的人。这说明,即使接受工作的新党员新干部,也还没有达到一个党员应有的党性水平。然而,尽管如此,毕竟去敌后工作的人,生命危险性是很大的,他们表示愿意去,说明他们的个人利益多少被克服着。这不能不说同他们过去受过的下层的相当锻炼或延安某些学校较严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新党员新干部中很少有能无条件接受工作的人,这是否意味着抗战后入党的知识青年和大革命或内战时入党的知识青年的质量有根本的不同呢?

从各时期参加革命的不同阶级出身上的人数比例上看,现在党员的质量虽较过去有很多差别,但并无根本上的不同。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均系小资产阶级,普遍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他们在每况愈下的生活中日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以至不断地加入到党内来。大革命和内战时如此,抗战后更加此。所不同的是,在三个时期中,随着环境的不同,斗争各有偏重,因而参加的人数比例不同,受革命的锻炼也不同。如果把大革命和内战时大批脱党的人算进来,那时的党员数目也是极大的。现在仍留在党内的大革命和内战时的党员,连牺牲的人算在内,同那时的党员数目相比,倒是少数。虽然在抗战后有不少人因抗日而加入党,但由于党教育和战争环境的锻炼,照样能把他们中的很多人提高到真正党员的水平。所以说,抗战时入党的知识青年比大革命或内战时入党的知识青年,虽有区别,但在质量上还是一样的。如果单就政治常

识的水平看,由于大革命和内战以来政治斗争的增长,进步书报的增多,抗战时入党的知识青年倒比过去两个时期还要高些。

那末,为什么延安的新党员新干部会有这样严重的党性薄弱的现象呢?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延安的新党员新干部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学生,他们生长在抗日的环境,又处在和平的边区,入党后就未得到适当的锻炼,有的还是“老延安”,几年来只在几个机关、学校转来转去,碰不到任何较大的困难。因此,他们的缺点很少有机会得到暴露和纠正,甚至还在无形中增长。如果看同样党龄的新党员新干部,经过几年前方的或下层工作的锻炼,则显然与长期在延安的新党员新干部有所不同。这更说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青年,只有在长期的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才能逐步消除其小资产阶级意识,增强无产阶级意识。

第二,我们在教育上的一些缺点或多或少助长了他们的不良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学校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使他们对书本上的条文津津乐道,无形中助长了其自高自大的态度和不务实际的作风。(二)组织教育中的某些不适当的做法,助长了他们投机虚伪的心理、自由散漫的习气和看重个人利益的偏向。比如,组织生活多流于形式主义,忽视真正的纪律教育;又如,分配工作或学习时,迁就得多;再如,党的建设教育未能着重强调个人服从党的问题,模糊了干部与普通党员的界限,等等。(三)本位主义的影响。比如,一些机关对于经过学习后仍旧要调回本单位工作的干部,往往直接将其送入某

校或要求中组部送入某校,实际某校对其并不合适;又如,某些机关、学校暗地拉人,甚至中组部调动某系统的干部时,某干部本可接受调动,而原机关、学校却有意无意地示意其不接受调动;另外,还有一些机关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当发现某党员思想意识不太好时,不去耐心教育,而用调工作、送学校的办法推出门了事。凡此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某些新党员新干部的个人主义思想及不良倾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在延安新党员新干部党性薄弱的原因,既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因其有内在原因,所以,党性薄弱现象难免。因其有外在原因,所以,党性薄弱的现象完全可以防止或在短时间内得到克服。办法就是改变外在不好的因素,使它成为好的因素。要使一个党性观念不强的人较快地达到坚强的境界,可以用加强对其教育和锻炼的方法。这在过去老党员老干部身上得到过证明,现在前方的新党员新干部身上也得到了证明,在这次接受去敌后工作的人身上又得到了证明。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新党员新干部如何教育、如何锻炼。

根据目前新党员新干部党性薄弱的情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增强其党性的工作:

第一,加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教育。利用这次整风的机会,以这些不接受工作的人为例,在各机关、学校展开讨论,以转移风气。要使人们了解,没有党就没有个人,只有在党性建立之后,个性才有可能建立与发展。每个党员必须具有随时准备为党牺牲的决心,这是党员是否合格的标准。必须明确自己是革命的牺牲者,而不是革命胜

利的享受者。要知道,牺牲的场合,不仅在残酷的刑场上和战场上,而且还在极平凡的技术工作和事务工作上。在这些岗位上任劳任怨、千辛万苦、积劳成疾也是牺牲。牺牲的价值不取决于表面上代价的大小,而取决于党对它的需要。

第二,大批地分派新党员新干部到下层锻炼。在整风后将大批的延安新党员新干部派到地方上去,派到技术部门去,派到事务工作中去。对新党员新干部使用的基本原则是,要使其多走逆风,少走顺风。必要时,对某些新党员新干部要分配其不愿干的工作,以磨炼其意志。但组织部门在分派工作时,必须审慎行事,不得草率,防止出现更坏的结果。

第三,加强纪律教育。组织部门在分派工作时,事先必须多加考虑,一经决定,绝不准讲价钱,严格纠正过去的迁就作风。在安排新党员新干部工作与学习时,必须拒绝任何人的非组织路线的建议,严格纠正本位主义的一切直接或间接的不合组织纪律的作风。在各学校中及党的建设上,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强调无条件地服从党,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对违犯纪律的人,要及时地给予适当的纪律教育与纪律制裁。各级行政与党的负责人,应对过去纪律教育情况详加检讨和总结,并把纪律教育作为日常考察的一个内容。

忆抗日战争时期 党在东北的秘密工作

钟 子 云

1938年8月我从苏联回到延安后,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工作,任干部部干事,二十四、三十班班主任,并为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班讲党的建设课程。1939年党中央成立了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其成员有王明、康生、杨松、张松(李范五)、李延禄、刘澜波和我(可能还有王若飞同志)。不久,我即离开党校到东北工作委员会去工作。1939年的五六月间,中央决定派我到晋察冀边区,专门负责联系东北抗日联军的工作。

1938年以前东北抗联和党中央的联系主要是靠我们党驻莫斯科的代表团,1938年之后,中央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回到国内(延安和新疆),故抗联和党中央中断了联系。党中央为了加强东北的工作,成立了中央东委会,并抽调一批东北籍干部成立了东北干部训练队,派我和张发到晋察冀边区去建立交通站,物色比较熟悉东北情况和能在东北活动的干部去东北工作。我在晋察冀分局领导和帮助下,抽调了孔力、岳武等同志去东北工作,同时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又陆续派来东北籍的干部王东、王

松、朱鸿恩、倪景阳等人，先后于1939年和1940年将他们派到哈尔滨、牡丹江和密山一带去建立交通站和联络站。由于当时敌人的统治严密，活动猖獗，他们花了两年时间，仍未与抗联取得联系。在这段时间内，有的干部因叛徒（如倪景阳）出卖而被捕，有的交通联络站（如设在孔力家的联络站）也遭到敌人的破坏。

1941年初，中央社会部决定将我负责的这部分工作与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的工作合并。这样，我除继续担负寻找东北抗联的工作外，还受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同志的委派，到涞水县计鹿村建立平西交通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主要任务，是接送中央社会部和分局社会部派出的人员和从当地党委中寻找适合去平津、保定等敌占区工作的人员，建立交通站、联络点，以及深入敌占区进行各种情报工作，并为社会部代管所有在平、津、保、唐、山海关和东北各地区的一切打入敌伪内部的情报组织。而继续寻找、联系东北抗联，只是我负责的一部分工作了。这期间，凡是由东北情报组织派交通送到联络站的密写情报，均在我负责下用电台向中央社会部和晋察冀分局社会部转报。

正义之战得道多助。平西交通联络站的活动不仅受到当地党政军同志和人民群众热情支持，还受到国际友人的大力帮助。英籍老朋友林迈可便是很出色的一个。林迈可于1938年至1941年之间在燕京大学任经济学导师，在这段时间内他与我们北平党组织在燕京大学的地下党员肖再田、肖芳等同志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他和他的夫人李效黎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给我们提供情

报,掩护我们党的工作人员进出北平城。1941年秋季,我代表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长许建国同志进入北平城内检查工作,就是林迈可同志用摩托车把我送进城里的。他还将过去二十九军留在天津外国租界的一批军用物资,几经辗转,送交八路军。林迈可还利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为我抗日根据地购买和运送各类药品(如奎宁)和通讯器材、电台等,做了不少工作。

当时在日寇统治下的北平市内购买西药和无线电器材是极其困难的。林迈可为我们购买这类军用物资,每次都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险。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我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我更加深切地怀念这位可敬可爱的国际朋友。

我在晋察冀边区六年,主要是负责与我在敌占区(包括东北在内)敌伪上层的情报点线进行联络工作。在这一时期,东北许多长期埋伏在敌伪高层机关的同志,多是原留学日本各大学的学生,他们最初在日本组织了抗日同盟会和读进步书籍的读书会,后来建立了党的组织。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们就转入我们党的情报系统,成为我们党在东北秘密情报组织的工作人员。

这个情报组织的前身是1935年在日本成立的“东京反帝大同盟”。以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张为先为中心,由丁宜、陈卓毅、赵家宾、于静纯等人参加。1937年又由侯洛、田琛、丁非、高亮、马昆山等人参加,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两个组织于1938年合并为“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其宗旨是根据马列主义进步思想开展抗日斗争。他们在日本从同乡、同学、同宗、亲戚、好友中培养和发展

了许多坚定的抗日分子为会员。以后,这个组织又先后改为“东北青年救亡会”(其外围组织为“新知识研究会”,国内部分名为“觉社”)、“晋察冀东北救亡总会”、“东北人民解放同盟”等。

这个组织的成员继 1938 年和 1939 年从日本分两批回国后,到 1940 年春季,其骨干都已陆续回国。这些同志并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利用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这些同志大部分是伪满政权上层人物的子弟)为党从事情报工作。他们的工作先由华北联络局后转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管辖,主要的任务是收集战略情报,深入卧底,严守秘密工作纪律,不同一般地方党组织发生任何横向联系。因此,这个组织在长达十年的隐蔽过程中,除个别同志因打入国民党内部而在国民党东北情报组织被日伪破坏时受牵连、被当做嫌疑犯遭逮捕外,未受到其他破坏。这样,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于东北城市和农村所建立的其他秘密革命组织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唯有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这一情报联络组织一直保存下来。1944 年初,毛主席看到他们写的《满洲工作报告》后高兴地说:满洲不是铁板一块。满洲的工作大有可为。

到 1945 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这个情报组织已发展到 70 多人。他们以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三个大城市为中心,辐射沈阳、大连、锦州、山海关、长春、吉林、扶余、图们、四平街、哈尔滨、密山等地,形成网络。其成员由于特殊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条件,可以直接获取重要情报。如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儿子张梦实(原名张绍纪)和侄子丁非(原名张绍维);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直属日本关

东军)部长于冲汉的儿子于静纯(他是伪满军校中校教官,其兄于静远是伪满经济部大臣);伪满皇帝溥仪的侍卫少将处长佟济熙儿子佟志彬(本人是伪军中校);溥仪的当家侄子伪高射炮兵团长宪东;伪满军法处少将处长的儿子王诚(原名王恒烈)和侄子王谦(原名王恒绪);伪满哈尔滨军管区上校旅长的儿子孙为(原名孙仲元)等。

该情报组织成员潜伏在伪满重要军政部门的有:海军方面的金有声(伪海军上尉、江上军司令官宪原的秘书);陆军方面的石迪(伪陆军中校,曾任军事部参谋,后调任黑龙江省密山军管区参谋),于静纯(伪陆军中校、伪军官学校教官),张进(伪军官学校少校教官),于清淮(伪军少校教官),佟志彬(伪陆军中校),宪东(炮兵中校团长),马凡(伪哈尔滨军区学校教官);空军方面的关明修(伪空军上尉、沈阳航空部队飞行军官);警察方面的张克诚(任过黑龙江省黑河讨伐队队长,后调任伪吉林省扶余县警察署长)。此外,还有关克(伪军事部次长秘书官室文官秘书),巩天民(志诚银行常务董事),张为先(志诚银行董事会监事)等。

还有些情报人员任伪满各机构的中层职员,能接触机要。有的任伪满国务院总理秘书室及八大部等机构的专职采访记者,有的在伪满军需局、协和会、中央本部、交通部公路总局,图们海关、伪满图书公司、中央银行、兴农金库、工商银行、志诚银行、商工会,奉天省广播电台等机构内任职。

这个情报组织在抗日战争中,克尽职守,积极工作,向抗日根据地送回一系列的重要情报,如:1、关于日本关

东军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和战略思想。2、关于住在伪满地区的日本人的反战思想。3、关于伪满陆海空军的编制、兵力、武器装备、军事部署、军队训练、作战能力、军官士兵的思想动态。4、关于海军舰种、数量、性能、航线、港口要塞设施的情况。5、关于空军的机种、性能、机场、基地的情况。6、关于港口要塞设施和机场基地的详细地图。7、关于辽宁、长春(新京)、沈阳、鞍山等地区的重要设施,对武器生产工厂、交通要道等目标则画有详细地图,以备供空中轰炸时使用。8、关于从伪满陆军、警察方面收集到的日伪军对我东北抗日游击队袭击的情报。9、关于敌军、警、特联防镇压、防谍等方面的措施。10、还有伪满财政、金融、预决算,重要经济和文教政策等方面的情报等。这些情报送到延安,甚得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同志称赞。毛主席说:我们的情报工作突破了伪满洲国的“钢铁国防线”,是我党对东北工作的先锋。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这个情报组织的大部分同志未公开自己的身分,有的打入敌人内部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他们在搜捕日寇和伪满要犯,侦破国民党特务组织以及东北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张梦实同志向苏联红军提供情报,将以张景惠为首的伪满内阁大臣级汉奸一网擒获。之后,他又随末代皇帝溥仪等要犯一起在苏军押解下去了苏联,在那里担任翻译和读报工作六年之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回来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又如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直接派到北满和哈尔滨等地开展特务活动的军统滨江组少将组长张勃生,也是靠他们提供的准确情报抓获的。在解放战争中,他们

策划驻防在南满的国民党部队的师长王家善起义，在辽沈战役消灭廖耀湘部队的作战中，他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党在东北的情报组织在长期的秘密革命活动中，曾经发挥积极主动精神，组织过各式各样的群众性组织，如上面提到的“东京反帝大同盟”、“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以及各种读书会等，对于宣传抗日思想，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培养革命骨干，团结爱国青年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组织虽然未经过上级党的领导机关批准，但实际上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应当在革命斗争史册上记下他们光荣的一页。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哈尔滨建立的“北满临时省委”，也类似这样的组织，虽然它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同样为党做了大量革命工作。

惨绝人寰的长城“无人区”

李 运 昌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冀热辽地区工作。日本侵略军曾在冀热辽长城线南北制造 5 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综合使用了种种法西斯残暴手段摧残人民群众，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浩劫。值此抗战胜利 50 周年之际，我作为历史见证人，将亲闻目睹日军制造“无人区”的暴行揭露于世，使后人永远牢记那段惨痛的历史，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驳斥日本某些人矢口否认侵略中国的滥言，维护历史正义。

逐步扩大的“无人区”

冀热辽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共产党领导下在敌后战场创建的 19 块抗日根据地之一，处于华北连接东北的战略地位，肩负着挺进东北的战略任务：即以冀东为基本区，以长城为战略中轴线，向热河、辽宁地区出击，最终收复东北。1938 年，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决定，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冀东党组织成功地发动了 10 万武装抗日大暴动。虽然由于西撤的错误，使起义的队伍受到严重

损失,但是为开展冀热辽敌后游击战争打开了局面,奠定了基础。经过1939年隐蔽发展,1940年又形成了新的局面,建立起冀东抗日根据地。于1941年和1942年间,连续发动战役行动向长城外的伪满辖区出击,在热河、辽宁开创出大片的游击区,相继在长城外兴隆的雾灵山、狗背岭、五指山、青龙的王厂沟、都山、老岭,平泉的光头山,绥中的加碑岩等深山区建成抗日游击根据地。以这些根据地为依托,先后建立丰(宁)滦(平)密(云)、承(德)兴(隆)迁(安)青(龙)平(泉)、承(德)平(泉)宁(城)、凌(源)青(龙)绥(中)等抗日联合县政权。并且与冀东基本区联合一片,形成了冀东、热河、辽宁三角地带的战略格局。

然而,作为冀热辽战略中轴线的长城线,当时被日本侵略者划为伪满洲国的“西南国境线”,而满蒙地区则被日本视为“生命线”。冀热辽八路军向东北出击,就象触动了日本侵略者最敏感神经和最致命的要害。日寇竟然丧心病狂地贼喊捉贼,信口雌黄叫嚣:“满洲国主权被侵犯”,要“封死中共党政对满洲国的侵略进攻”。于是,将在东北地区对付东北抗日联军的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的毒辣措施搬了过来,变本加厉地实施。1939年和1940年间,抗日游击队在热南地区活动,日军就连续两年在局部地区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但受到抗日游队的打击和群众的反抗而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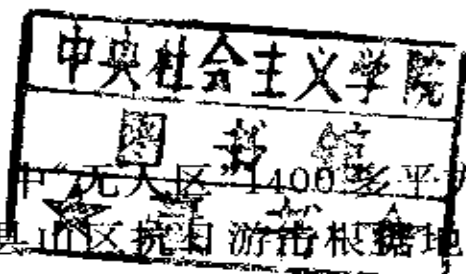
1941年,冀热辽八路军对热南地区发动战役出击,立即引起日本关东军的严重警觉,于5月17日由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发出《西南地区特别肃正》作战命令,出动重兵“扫荡”,开始大规模制造“无人区”。9月15日,又升

格由关东军防卫司令部发出《时局应急西南地区特别肃正》作战命令。

在日本关东军防卫司令部的指挥下,从1941年下半年,将在东边道进攻东北抗日联军的日伪军政骨干全部调到热河。并且从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地抽调日伪军及专搞“集家并村”的特种部队——警察讨伐大队布置到热辽长城线上。1942年至1944年制造“无人区”高潮期间,聚集在长城线上的日伪军达10万之众。

从1941年9月,日伪军在热辽地区实施《特别肃正》和《国境地带无人区化》措施以后,即全力以赴建设集团部落,强迫群众集家并村,全面制造“无人区”。为了支援群众开展反集家斗争,八路军曾不断发动战役出击,向辽西、热中纵深发展,但日伪军依仗雄厚兵力,不断强化措施,凡是八路军所到之处,立即同步实施“无人区化”措施。将抗日游击区制造成“无住地带”,将抗日游击根据地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彻底摧毁。“无人区”的地域范围逐步扩大,按现在区划,包括青龙、宽城、承德、兴隆、滦平等5个县的全境;丰宁、隆化、平泉、宁城、建昌、凌源等7个县的大部分地区;绥中、喀喇沁旗、围场局部地区。据测算,“无人区”总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其中“无住禁作地带”约为8500平方公里。被集家的自然村1.7万个,共建立2506座“人圈”,被驱赶集家的群众约340万人。

为了配合日本关东军在长城外侧制造“无人区”的行动,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冈村宁次亲自策划指挥下,从1942年9月起,在长城线内侧,东起卢龙县的桃林口,经由迁安、遵化、蓟县、平谷、密云、怀柔至昌平县的桃峪口,制造



了一条长 600 公里的封锁带。其中“无人区”1400 多平方公里。还在迁安、遵化、丰润、滦县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制造了 8 片“无人区”，如盘山、鲁家峪、潘家峪、莲花院。

就这样，在东起九门口，西抵独石口（约长 850 公里），北起围场、南至长城内侧，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绝缘体式的特殊战略封锁带。

丧心病狂地“攻伐民众”

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的毒辣措施，完全是针对共产党团结人民群众发动人民战争的战略策略，妄图用集家并村和驱逐群众的办法，切断共产党、八路军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竭泽而渔，摧毁抗日游击根据地，消灭抗日力量。

根据日本关东军防卫司令部《时局应急西南地区特别肃正》作战命令，于 1941 年 9 月间，日军西南防卫司令部制订出《西南地区肃正工作要纲》，承德日本宪兵队本部拟定出《国境地带无人区化》实施方案。其文件中分析说：

“中共现在所采取的对日战略，是扩大强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坚持抗战，获得最后胜利，积极地动员民众参加协力于抗战工作”。

“所谓集家，即将可能成为敌人游击区的国境地区内的居民，集结于我方据点，或其近旁地区，使之与敌人的活动完全隔离，而由我方掌握控制，乃可彻底封锁扼杀敌人之所谓人力、物力的动员工作”。

“民众的支持，乃是彼等的依靠，这样就能切断其与

民众联系的纽带，救命之纲绳，此实乃致命的打击”。

日本侵略军为了彻底摧毁抗日游击区，将一般的抗日游击区划为“无住地带”，毁掉村庄，逐赶群众集家并村。而对抗日游击根据地，则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实施最彻底的“三光政策”，进行灭绝人性地摧毁，并称之为“拔根断缘式的摧毁”。

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就是以血腥屠杀开始的。从1941年开始大集家，就伴随着疯狂的大屠杀。对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见一个杀一个。1942年冬，日军“扫荡”雾灵山根据地苇子坑村，全村共70多口人，被围住50多人，一次被杀绝。只有十几人外出幸免。

1943年冬季，日军集中万余兵力“扫荡”五指山根据地，漫山遍野搜索了半个月，搜出800多老人和妇女儿童，几乎全部就地屠杀了。

宽城县孟子岭、王厂沟、石柱村一带，是日军制造“无住禁作地带”的重点地区。1943年9月10日，驻喜峰口的日本宪兵队第二游击队对这一带“扫荡”，从这一带逮捕了580人，屠杀了380人，200人被送往东北当劳工，80%死于苦役之中。从1943年12月，石柱村被划为“无住禁作地带”以后，遭到日军连续摧毁，全村700多人，被屠杀300多人，有22户（100多人）被杀绝。

兴隆县是日军制造“无人区”的重点，全县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地区占面积的40%多，特别是1943年以后，在几块根据地里，不要说是中国人，就连牲畜、家禽，凡是有生命的东西全不放过。到后来，在热南区根据地里，连一头驴一只鸡也难以看到了。

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毒辣手段之一，就是彻底摧毁群众的一切居住条件，对一般的集家区，划为“无住地带”，强迫群众将房子彻底拆毁，搬进“人圈”。在“人圈”以外，绝对不准居住。而对划定为“无住禁作地带”的抗日根据地，从一开始就是纵火焚烧，片瓦不留。据统计，整个“无人区”的 1.7 万个自然村落，全部被夷为废墟，总共烧毁、拆毁 380 万间房屋。

为了摧毁抗日军赖以隐蔽的山林，日军在每年冬春之际，到处纵火焚毁森林。大面积的森林被焚毁殆尽，连一般山场的树木、植被也大部毁于战火，郁郁葱葱的壮丽河山成了片片焦土。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掠夺更是疯狂到了极点。从制造“无人区”之日起，就伴随着疯狂的烧杀，彻底的抢掠。本来生活就极为穷苦的山民，经过日军几年连续的“扫荡”，一切生活用品早已荡然无存了。可是日军每次进山“扫荡”，依然是到处搜索抢掠，连半口破锅、一只空瓶也不留。搬不动的碾子、磨盘，也用炸药崩碎。据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热河省（重点是“无人区”）被日军抢走粮食 96 亿斤，牲畜 24 万头，其他物品难以数计。

最为根据地人民所深恶痛绝的手段，就是日军连年“割青扫荡”。所谓“无住禁作地带”，就是不但不许居住，而且禁止耕作。然而，根据地人民为了生存，为了战斗，就得坚持生产，日军就割毁庄稼，破坏生产。据调查，兴隆、承德、宽城、青龙、滦平几个县，从 1942 年起，割了第一次青苗；1943 年割青苗范围更大，在重点地区割了两遍；1944 年在不少地区割了三遍。1945 年 8 月，在五指山、雾

灵山根据地“割青扫荡”的日军是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才下山的。

特种集中营——“人圈”

日本侵略军制造“无人区”的中心环节，就是建设特种集中营——“集团部落”，实行集家并村控制民众，把群众象猪、羊一样“圈”起来，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所以群众都称“集团部落”为“人圈”。

群众被驱赶出家园集并到“人圈”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生活立即陷于绝境。据冀热辽行署 1946 年调查报告，因日军制造“无人区”共荒芜了 600 万亩耕地。即使老百姓在“人圈”附近准许耕作的范围内种点庄稼，打下粮食也要缴纳各种“出荷”和苛捐杂税。吃穿及一切日用品只能靠“配给”。老百姓吃的是配给的“共合面”，是用豆饼、苦橡子和霉烂的粮食磨制的，又臭又苦又涩。

百姓穿的就更到使人难堪的地步，按规定配给的布很少兑现，最多每人三四尺，不少地方多少年一尺也没给过。而且配给群众手里布料，都是质地极为低劣的人工纤维，或是和旧布烂棉絮重新纺织成的再生布，下水一揉搓就烂了，群众称之为“唾沫缎”或“还魂布”。男人外出或下田劳动，有一条破裤子就是好的了，不少人只是身前挂一条破布围着一片麻袋。女人们不论老少，就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也常年打光身。没办法，就在屋里挖一个洞，来了人就藏进洞里，顶着锅盖或树枝遮蔽身体，名叫“遮羞坑”。象这样凄惨的景象，我们在“无人区”里活动时，是屡见不鲜的。

“人圈”里是划定范围由各户自建住房的；可是已经一贫如洗的老百姓，连糊口生计都难以维持，又哪有能力建房，多半是搭个马架子窝棚。不少人家从被赶“人圈”直到日本投降，几经寒暑，还是住着破烂窝棚。冬天，塞外的暴风雪袭来，满屋飞雪，冰冷彻骨。到了夏季，屋里、院里、街里一个样，遍地是泥泞、污水、垃圾、粪便，臭虫、虱子、蟑螂等恣肆繁殖。伤寒、霍乱、疟疾、痢疾、鼠疫等可怕的传染病连年广泛流行起来，吞噬了千千万万的生命。据各地不完全的统计，平泉县127个部落村，共7万多口人，死于瘟疫1万多人。建昌县集家并村后，共死于瘟疫7700多人。兴隆县在1943年夏季一次瘟疫大流行中，就死了6000多口人。大水泉部落，一次流行鼠疫死了300多人。现已发现线索，可能是日军搞细菌战所致。

尽管“人圈”外有高墙、碉堡，内有严酷的统治制度，然而，日本侵略者深知，仅仅靠这些手段是隔不断共产党同人民血肉相连的鱼水关系的。要彻底切断共产党同人民的关系，必须从根本上切断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纽带”。所以，从1942年大规模集家并村之时起，就一次又一次地搞大“检举”，搜捕基层党员干部，破坏基层抗日组织，血腥镇压人民群众，以强化部落中的反动统治。

日伪在初期搞大“检举”时，还要立些名目，如“匪团组织大检举”、“通匪家族大检举”等等。对被“检举”的人，也要加上一些罪名，什么“国事犯”、“思想犯”、“经济犯”、“密输犯”，以及“通匪”、“济匪”、“资匪”等等。而到1943年以后，就采取一网打尽的办法。如承德日本宪兵队本部统一指挥的“二·一”工作计划，就是从1943年2月1日

开始全热河省的大“检举”。根本不讲什么原因和罪名，而是将部落中 18 岁至 60 岁的男人全部逮捕，然后逐个“剔抉”。兴隆县一次被抓捕 5000 多人，半壁山警察署辖境就捕去 2000 多人。揪木林、大莫峪两个小部落村，共有 122 户，被屠杀了 104 名青年男子，成了“寡妇村”。在“无人区”里，出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寡妇村”。

在频繁的“检举”搜捕中，被抓到的群众都遭到严刑审讯，反复折磨，当场屠杀一批，释放一部分，余下的大部分特别是青壮年男子，都被关进各县设的“置留场”，再审讯逼供，过一遍筛子，又送到承德和锦州监狱，再一遍一遍地过筛子，反复酷刑拷问。

日伪在各地的“置留场”和监狱，就是残害中国人的一座座魔窟。而以承德监狱最集中最残酷。在那里，象灌凉水、压杠子，已是一般化的刑罚了，什么电磨粉身、军犬撕尸、挖肝摘心、活拔神经等酷刑就有 10 多种。

著名的旅游胜地承德离宫避暑山庄的西墙外的水泉沟，就是日本法西斯集体屠杀中国人和陈尸的“万人坑”。累计有几万多中国人被屠杀在那里。

日本侵略者对大“检举”中撒大网捕到的青壮年男子，经过层层过筛子，屠杀的屠杀，判刑的判刑，最后对那些实在找不到“罪证”借口的人，也不放过，绝大部分被送往东北各地或日本劳工集中营去服苦役。据 1946 年热河省救济委员会调查，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止，共从热河省抓走劳工 15.2 万人。抗战胜利后，只有 20% 回到了家乡，80% 下落不明。

大批劳工除陆续被虐杀于苦役之中外，更有被集体

屠杀者。最为残忍的是，日本法西斯将被抓捕的老百姓供新兵“胆量教练”的活靶子，更有的送往“七三一”部队作细菌武器活体实验之用。

据《热河抗战简史》记载：日本侵略者在热河地区制造“无人区”过程中，共屠杀、虐杀 10 万多人。这是当年估计数字，实际上是远远超过了的。如前所述，日本侵略者先后共从热河省抓走劳工就有 15 万人之多，按比较可靠的统计，80% 死于苦役或被集体屠杀。

在日本法西斯“无人区”政策统治下，中国人民的生息繁衍都难以为继了。据统计，日军统治热河 12 年半，各地区人口锐减。如兴隆县，1933 年统计，总人口 15 万，按旧中国正常人中增率，到 1945 年，起码应增殖到 20 万左右。然而，由于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的疯狂摧残，全县在根据地被屠杀的 1.4 万人，在“人圈”中遭杀害的 2 万人；死于瘟疫和冻饿的 1 万余人，再加上生活极为困难与战乱等因素，绝大多数妇女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到抗战胜利时，人口已不足 10 万人了。

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的罪恶行径，是世界战争史中罕见的重大战争犯罪公案，必须彻底清算，牢牢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顽强的战斗 最后的胜利

由于日本侵略者对“无人区”里根据地的连年摧毁到了灭绝一切生机的程度，要坚持住根据地，头一个紧要任务，就是必须创造最低的生活条件，千方百计地生存下来。抗日军民在山野里架帐篷，山洞、废窑、长城烽火台，

都是安身之处,有时就象原始人一样穴居野外。

为了适应“无人区”特殊环境,能够在异常频繁的战斗情况下坚持生产,各根据地在大生产的组织形式上,基本采取了“劳武结合”和“变工互助”的办法,一切服从于军事斗争。党政机关的干部、子弟兵也都参加劳动。这种组织形式,当时大家都称之为“军事共产主义”,然而,它绝不是空想的“乌托邦”,而是个实实在在的斗争整体,是民族精神凝聚的结晶。

还有,要坚持住热辽地区的抗日斗争,必须一面顽强奋战保卫根据地,一面加强“人圈”的工作,打破牢笼,解放“人圈”人民群众。在有条件的地方,就采取游击队袭击,“人圈”里人民响应,里应外合,捣毁“人圈”,人民冲出牢笼,回到根据地。在日军控制严密的地方,就采取隐蔽渗透的方法,秘密开展“人圈”里的抗日斗争。据兴隆县的调查统计,到1944年,全县199座“人圈”中,60%由日伪绝对控制而转变成隐蔽抗日地区,20%转变成抗日两面政权。其中不少部落已完全为抗日政权所控制,抗日干部及游击队可以开会或住下。不少地方重新建立了党组织。

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抗日军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战在“无人区”里,终于在热辽地区坚持住抗日游击战争。然而,在极端艰险的斗争中,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相继牺牲的党政军领导干部500多名,战士6000多名。仅在兴隆县境内,就牺牲党政干部300多名,战士、民兵3000多名。

为了实现中共中央挺进东北最终收复东北的战略部署,于1943年和1944年间,我们又连连发动战役出击,支

持“无人区”群众坚持斗争，并向热辽地区纵深推进。于1944年底，经中共中央批准，建立冀热辽军区，创造了新的局面。1945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举行局部反攻的战略计划，冀热辽军区子弟兵组织三路挺进支队，向热西、热中、热东及辽西出击。吹响了对日反攻作战的前奏。

1945年8月10日上午6时45分，日本外务省发出乞降广播，延安八路军总部立即发出七号受降作战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区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中共冀热辽区党委立即进行部署，先后出动1.2万部队和2500名干部，向热河、辽宁进发，迅速控制热河全境，进驻承德、朝阳、赤峰、锦州、沈阳等大城市。并由冀热辽军区16分区的司令员曾克林同志偕同苏联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代表飞往延安，向中央直接汇报了东北情况，并经过谈判，与苏方达成谅解，由八路军接管热河、锦州，允许八路军进入东北。中共中央当机立断，由原来“向南发展”转变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新的战略方针。向东北派出10万军队、2万名干部，为争取东北取得先机之利。

陈集歼灭战

邢泽 王志甲 沈政 孙志杰

陈集战斗系我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于 1943 年 3 月下旬发起的一次漂亮的歼灭战。此战一举全歼日军第三十五师团的一个中队,在苏北战场上,创造了歼灭战的范例。参战主攻部队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的事迹也为人们交口称誉,到现在当地人民仍然怀念着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们。

陈集是个小镇,约有 200 多户,位于阜宁西南,是通向东沟、益林、黄营、北沙的要道,也是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敌三十五师团林我夫大队的崖畅也中队,侵占该镇以后,还没有形成坚强的防御体系,只抢修了一些简易工事,这种情况表明敌人还立足未稳,正是我们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为此,旅、团首长决心抓住这个时机,打下陈集,拔掉这个钉子,消除我根据地军民的心腹大患。

陈集战斗由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兼八旅旅长张爱萍亲自指挥。由于敌人装备好,战斗力强,旅首长决定集中优势兵力进行这次战斗。二十三团一、二营 5 个连队担任主攻,旅特务营一连和侦察队加以配合。团在阜宁方向打援和堵击陈集可能的的外逃之敌。建阳总队在东沟、益林方向

打援。二十三团三营由叶建民参谋长率领在北沙方向打援。

打响陈集战斗的当天下午，在团部驻地的一个大院里，召开了全团班长以上动员大会，张爱萍旅长在会上作了生动有力的战斗动员。首先讲了敌情和作战有利条件。他说：根据侦察和情报，陈集驻有日军1个中队，80多人，携有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掷弹筒3个，步枪50余支。从敌我兵力对比来看，我们占绝对优势，直接参加陈集战斗的部队八倍于敌，部队士气高涨，并且有和日军作战的丰富经验。这些都是胜利的重要条件。

张旅长特别指出：二十三团是一个有战斗力的部队，曾经与日军多次交战，立过战功，所以这次把陈集的任务交给你们，希望你们一定要打好，为二十三团争光。

为了打好陈集战斗，二十三团认真、紧张地进行了战前准备。组织干部战士侦察地形，了解敌情，准备攻坚器材，更深入地进行战斗动员，参战连队普遍地组建了奋勇队，并同地方联系取得他们积极配合。

3月25日晚9时许，二十三团5个参战连队在胡继成团长的直接指挥下，利用夜幕的掩护悄悄地接近了陈集守敌的警戒线。10时许，一营一、三连从镇北，二连从镇西，二营五、六连从镇东，同时从各方向发起了冲击。各连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了敌人的警戒线。

5个连队象五把尖刀，勇猛穿插，把敌人的指挥系统和兵力部署打得乱作一团，真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各连与敌逐屋展开争夺，我们夺过来一座房子，敌人又拚命地想夺回去。有一座房子我们与敌人反复争夺了四次。三

连奋勇队攻到一所大院时，敌人用两个小队来包围我们，在半小时内，向我们连续进行四五次猛烈的反扑，我军沉着应战，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击退。借着手榴弹爆炸的火光，三连同志发现紧挨着的房子原来是敌人的弹药库，敌人拚命反扑，就是为了保护弹药。三连同志明白，击毁敌人弹药就能迅速取得胜利。周保江连长一声令下，三连奋勇队一直冲到弹药库房门口。同志们迅速将十几颗手榴弹打进弹药库里，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引起巨响，火光四起，弹药被打着了，整个房子也被打着了。

经过两小时的短兵拚搏，敌人被我歼灭过半，残敌大约 40 人，在混乱中被我压缩到陈集西北隅的一个大院里，进行顽抗。凌晨 1 时左右，我一连在敌人固守大院的北面，三连在东北面，五连、六连在东南和南面，二连和旅侦察队在西面，对敌已形成紧密包围。敌人既难突围，又不投降。而我们虽有绝对优势兵力，但受到地形和武器装备的限制，攻击一时也难以奏效。

为了尽快歼灭被围之敌，凌晨 2 时许，胡继成团长在二营阵地上，召集营以上干部，分析敌情，重新部署。胡团长提出，地形许可的，要近迫作业，挖交通沟，接近敌人，进行火攻，要想办法把敌人占领的房子烧着，迫敌出洞。会后，各连队迅速地行动起来。阵地上，有的挖交通沟，准备火攻，有的喊话，争取敌人投降。三连副指导员刘连义平时努力学习日语，并教会战士用日语喊话，这次他积极喊话，当喊到“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优待俘虏，缴枪不杀！”时，敌人以密集火力向其射击，他被击成重伤，仍坚持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直至壮烈牺牲在阵地上。

4 时许,张爱萍旅长在胡继成团长陪同下,来到前沿阵地。张旅长靠近枪眼观察敌情,敌人一枪打穿他的大衣,好险哪!五连连长马正全马上把他拉开。张旅长视察敌情后,肯定了各连挖交通沟,接近敌人,准备火攻的措施。

天亮以后,天气发生了变化,雨愈下愈大,交通沟里越来越湿,近迫作业也越来越难。但为了创造火攻条件,各连仍在一铲一铲地挖沟,一步一步地接近敌人。敌人虽然困兽犹斗,但他们四面被围,援兵无望,粮已绝,弹将尽,实已成为瓮中之鳖。上午 9 时,一连战士陈全林,首先爬到敌人草房上,向房内投手榴弹,未能奏效。接着一连战士陈大章,用长竹绑上棉花、浇上煤油作为火攻工具,利用敌人火力死角,把敌人固守的大院正房房角点着了。火借风威,愈烧愈旺,敌人感到顽抗有死无生,想从豁口向北突围。一营事先就估计到这一点,在豁口外的独立房内布置了兵力,由红军干部、一营特派员苗元厚率领一连机枪班挖好枪眼,封锁敌人。敌人突然在豁口处打出白旗,接着又掷出几排子弹,表示就要投降。很显然,这是敌人企图先涣散我军的警惕性,准备突围。

9 时半,鬼子先打出烟幕弹,遮挡我军的视线,然后端着枪,在一个手持指挥刀的鬼子率领下,大喊大叫地冲出大院奔向北面的豁口。他们分为两路,一路直扑独立房。在那里遭到一营特派员苗元厚率领的一连机枪班迎头痛击。苗特派员和机枪班同志的机枪、步枪、驳壳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打得敌人东滚西爬,鬼哭狼嚎,杀伤敌人八九个。但仍有几个敌人趁我机枪换弹盘时,利用死角冲进我

军独立房内。苗元厚和机枪班同志用驳壳枪、刺刀同敌人激烈拚搏后，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另一路敌人没命地直窜村边水围子，敌我双方的机枪、步枪、手榴弹各种火力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片火海。旅特务营一连沿水围子南岸迅速赶来，截击逃敌。

张爱萍旅长、李雪三政委、胡继成团长也都赶到了。张旅长见到王志甲教导员，当即命令：你赶紧带部队追击，一个敌人也不能让他逃掉。俟逃敌逃到陈集东北的郑家庄前时，遭到早已在那里准备打援的二十二团迎头痛击，全被消灭。

至此，陈集日军中队长崖畅也以下 83 人全部被歼。我们部队缴获重机枪 1 挺，轻机枪 3 挺，步枪 40 余支，掷弹筒 3 个，洋马 3 匹，其它军用品一部，烧毁敌电台 1 架，弹药 30 余箱，拔除了敌在我阜宁地区中心安设的一根钉子，创造了苏北平原歼灭战的光辉战例。

与此同时，在八旅和盐阜军分区首长的通盘部署下，建阳总队在 3 月 25 日夜，袭击了东沟敌人，全歼伪自卫队 20 余人，并打退了增援的日军。阜宁、阜东、射阳总队也于 25 日夜，分别袭击了阜宁、东坎、六套、七套之敌。建阳总队一部还袭击了花头墩据点，歼伪三十三师 1 个连。涟东总队袭击北沙据点，歼敌 30 余人。这些袭击战斗有力地配合了陈集歼灭战。

陈集战斗的胜利，对挫伤敌人士气，制止其伪化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对盐阜人民争取反扫荡全胜的信心和决心，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回 忆 嫩 江 剿 匪

张 汉 丞

这些年来,每逢冬季,特别是刮风落雪的时候,我便不由地回忆起当年在嫩江剿匪的艰苦岁月,想起为东北解放而浴血奋战的警备二旅广大指战员以及与我们同甘共苦的嫩江人民……

警备二旅创建于1945年11月,隶属西满军区领导,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军进军东北时在嫩江省建立的一支人民武装。解放战争时期,这支部队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开展剿匪斗争,历尽征战,消灭土匪8000余人,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了土地改革及其成果,有力地支援了东北人民解放战争。

一、警备二旅建立的前前后后

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党中央审时度势,向全党全军发出了进军东北的伟大号令,并从全国各根据地抽调13万大军,两万名干部进军东北,开辟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我正在延安中央党

校学习,组织上决定派我参加工作团,和林枫等同志一道首批进入东北。1945年8月下旬,我们从延安出发,昼夜兼程,拼命赶路,终于在10月初赶到了当时的嫩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市。和我一起到齐齐哈尔的还有刘锡伍、于毅夫、冯继新、朱光、王盛荣等同志。我们到齐齐哈尔后,首先与苏联红军警备司令部取得联系,然后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组成了中共嫩江省委、齐齐哈尔市委,成立了省政府和省军区,组建了警备一旅和警备二旅,由刘锡伍任省委书记,冯继新任省委组织部长,于毅夫任省政府主席,朱光任齐齐哈尔市委书记,王盛荣任市委副书记,王明贵任省军区司令员,我任警备二旅旅长。

当时嫩江省同东北其它地区一样,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动乱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出兵我国东北的苏联红军捷足先登接管了嫩江,但实际上他们接而不管,给坏人造成了可乘之机。一些地主、恶霸、流氓、惯匪拣了日本投降时丢下的武器,招兵买兵拉队伍,建立反动政权和组织各种游杂武装,一时间匪患四起,“司令”如毛。当时,嫩江省有三股大土匪:一股叫“光复军”、一股叫“黑六旅”、一股叫“黑七旅”。“光复军”盘据在齐齐哈尔市,“黑六旅”和“黑七旅”在嫩江省西部地区流窜。这些土匪头子都有国民党的委任状,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土匪,东北方言叫“红胡子”。这些“红胡子”有明的、有暗的,有政治的、有经济的。什么“草上飞”、“花蝴蝶”、“一条龙”等等名目繁多,形成了一时颇大的土匪势力。

我们初到嫩江时,全省广大农村的政权机构仍然是日伪时期那一套,村村都有维持会,各村的维持会大都掌

握在地主老财手里。光复以后，各村又成立了民团，名义上是保护村庄，实际上都是为有钱人看家护院的地主武装。这些组织大部分与土匪有勾结，明来暗往，串通一气，欺压百姓。由于连年战乱、日寇掠夺、地主盘剥、土匪蹂躏，素以美丽富饶著称的嫩江平原被践踏得萧条、破落，一片凄凉景象，人民群众生活很苦。许多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有的一家人合穿一套破棉裤，谁出门就穿上，其他人只好裹条破棉絮蜷伏在茅草屋里的土炕上。在政治上，嫩江的群众也跟东北其它地区一样，在伪满时期，与关内隔绝了14年之久。日本关东军投降后，在不少人都存在着盲目的“正统”观念，因而受骗上当，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对共产党八路军则一无所知。他们对土匪恨之入骨，渴望翻身解放，但又十分害怕土匪，敢怒而不敢言。要打消群众的惧怕心里，启发他们起来斗争，协助人民政权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工作，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要荡平匪患。

开展剿匪斗争首先要有部队，我们的部队在哪里？当时省军区只有几个干部，警备一旅是个空架子，警备二旅则连个空架子也没有，只有我和警卫员张之楠两个人。为了尽快建立剿匪武装，我到省军区找王明贵同志研究解决兵员问题。王明贵原在东北抗日联军，抗战后期随抗联撤到苏联境内，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时，他又随红军回到齐齐哈尔。王明贵同志给我介绍说，嫩江省各县都有县大队，大队长都是苏联红军进驻嫩江以后任命的。让我去了解一下，看能否接收。根据王明贵同志提供的情况，我带着警卫员到了龙江县富拉尔基镇。当时富拉尔基镇驻有

苏联红军,为了取得他们的支持,起码是免遭反对,我到富拉尔基镇后,首先到苏军司令部做了自我介绍,并把随身珍藏的毛主席像章作为证件拿给他们看,算是挂上了号。当天下午,我以省军区派员的身分召集龙江县大队全体人员开会。宣传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军队,讲解革命道理。当兵的都觉得很新鲜,听得入神。大队长却听不入耳,在会场上烦躁不安,引起了我的警惕。当天晚上,这个大队长要我和他住在一起,我没同意,另找了一间房子住下了。夜里12点左右,我正在屋里考虑第二天的工作,突然听到门外有动静,我警惕地把手枪抓在手里,警卫员也机警地打开了枪机头。接着,屋门开了,闪身走进一个人来,来人正是县大队的大队长。他进屋后倒背手站在门口,见我们已有戒备,表情很不自然,说:“你怎么还没睡呀?”我随声回答:“天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随后他又没话找话的搭讪了两句,就倒退着出了房门。出门后转身走时,我见他手里握着枪,我当时意识到,此人来意不善,很可能是想暗杀而未能得手。

次日,龙江县解放委员会委员长(解放委员会是苏联红军到东北后建立的政权组织,县解放委员会相当于县政府,委员长行使县长职权)到富拉尔基镇检查工作。我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对他说了。他听了很惊讶,告诉我说,他们已经查明县大队长是土匪,前不久他还在朱家坎一带强奸了几名妇女。县解放委员会正准备处置他,让我赶快离开县大队,到他那里去住。第二天,县解放委员会以开会的名义,把县大队的大队长召去抓了起来。这个家伙被抓的时候,悔恨万分,吐了真言,说后悔那天晚上没

下手,把关里来的那个共产党打死。

此后,我又对景星、泰来、甘南等县的县大队做了调查。这些县大队成份都很复杂,兵权没有掌握在可靠人手里,又都与土匪有勾结,要接收改编他们根本不可能。东北许多地方的经验也都证实了这一点:凡是企图利用土匪头子组织起来的队伍的几乎无一成功,大都是在紧要关头杀害了我们的干部,又把队伍拉回到国民党那里。我接受了富拉尔基的教训,决心动员和依靠群众,组织一支可靠的人民武装。于是我又去找龙江县解放委员会委员长,请他帮助解决兵员问题。因为据组织介绍和当地群众反映,都说这个委员长是好人,有民族气节,有正义感,特别是他抓捕县大队土匪大队长一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才找他。此人果然是热心,主动以县解放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县发出了通知,帮助我们做宣传,号召群众踊跃参军。这一招很灵,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听说要建立自己的军队打土匪。都积极报名。要求参军的人络绎不绝,仅十来天的时间,就有一千多人报名参加我们的队伍。为了防止坏人混入部队,我们对报名参军的人进行了审查,主要把住年龄关。因当时本地 22 岁以上的成年大都当过满洲国军、伪满警察和土匪。所以,我们征兵的年龄是 16 岁到 21 岁,个子长大的 15 岁也可以。

在征集新兵组建部队过程中,上级给我旅陆续派来了干部,这些干部大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后来又从太行和新四军调来了两个建制团的干部。我们把这些干部和征集来的新兵编成了 3 个团,随即于 1945 年 11 月中旬正式成立了警备二旅。

当时的编制情况是：

旅 长：张汉丞

副旅长：李 楠

政 委：顾卓新（嫩江地委书记兼任）

尹时炎

朱民亲

旅部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

参 谋 处 长：翟东平

政治部主任：刘 焯

组 织 科 长：李 超

宣 传 科 长：陶恒进

保 卫 科 长：李仁堂

后 勤 副 部 长：范 琼

卫 生 部 长：解 华

下辖三个团：四团、五团、六团

除上述三个团以外，内蒙古札兰屯一带还有一个支队也属我们领导。

这个支队有三百来人，全部是蒙古族，所以取名叫“蒙古支队”。支队领导人叫鄂论日土。在剿匪斗争中，我们经常联系，互通情报，共同战斗。

在组建警备二旅的同时，我们着重抓了部队中各级党组织的建设。成立了旅党委，团、营、连、排也成立了相应的党组织，重申了党的纪律，实行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确立了党在部队中的领导地位。

开展剿匪斗争，不但要有人，还要有武器弹药。日寇刚投降不久，枪炮、子弹扔的到处都是。我见到富拉尔基

村公所存着几百支枪，我们取来了。后又派一部分人到兴安岭拣回来不少枪炮、弹药，装备了部队。因为有了炮，旅部又组建了一个直属机炮营。全旅上下清一色地日式装备，这在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

1945年11月底，国民党接收大员彭济群，坐苏联飞机到齐齐哈尔任嫩江省主席。国民党接收人员一到，苏军就把嫩江省管理公务之全权交给了彭济群等人，同时要求我党、政、军机关和单位撤出齐齐哈尔。当时大家都很气愤，刘锡伍、于毅夫、王盛荣和我一块找到苏军司令部交涉，王盛荣同志会俄语，给我们当翻译，与苏军警备司令吵了三个多小时，因为他们有《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做依据，结果无济于事。

撤出齐齐哈尔以后，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迁到甘南。警备二旅迁到富拉尔基，以此作为立足点，在龙江、景星、泰来、甘南等县展开了剿匪斗争。

二、全歼“黑七旅”

“黑七旅”的旅长叫宋同山，是嫩江省方圆几百里有名的大土匪头子。此人兵痞出身，早年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连长，后被日军俘虏下煤窑当了劳工。这个家秋认贼作父，卖身投靠日本人，对劳工大打出手，受到日本人的赏识，当上了工头。日军投降后，蒋、日、伪合流，宋同山一跃成了嫩江地区的要人。他收罗伪满官吏、警察宪兵、地主恶霸、惯匪、流氓、大烟鬼等，组织起一支4000余人的土匪武装，全部是骑兵。这股土匪凶残狠毒，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当地群众对他们深恶痛绝，又恨又怕。面对这样一

股凶残的匪徒，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同志指示我们：打土匪要猛、要狠、要穷追猛打，一旦抓住土匪头子，一定要严加惩办，决不能放虎归山。根据黄司令员的指示，我们在部队中开展了忆苦教育，用土匪残害人民的各种罪行教育部队，激发广大指战员的阶级仇恨和剿匪热情。同时还学习了一些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使指战员们政治觉悟有了显著提高。为了对付敌人的骑兵，我们又先后把五团和六团由步兵改为骑兵，在茫茫的嫩江雪原，与黑七旅展开了斗争。

清剿黑七旅的斗争是非常艰苦的。当时正值严冬季节，冰天雪地，行军时雪深没膝，路也看不见。部队御寒物资奇缺，在零下40多度的天气里，干部战士只穿着一套单薄的棉衣。行军时不少人马不敢骑，时常牵着马跑，来暖暖身体。嫩江西部人烟稀少，部队宿营常常找不到房子，就在雪地里烤火过夜。有时打伏击，因为地冻得坚似磐石，挖不出工事，干部战士就把麦秸堆起来，浇成冻墙作掩体。在这种冰筑的掩体里，趴的时间长了，衣服就和地上的冰冻在了一起。当时，部队真正在战斗中减员的并不多，而冻伤减员则大大的超过了战斗减员。不少人冻坏了手脚，一些骑兵战士冻坏了小便。严寒威胁着部队，阻碍着剿匪斗争的开展。为战胜严寒，度过难关，我们首先在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号召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看到光明，从精神上藐视困难，使部队保持高昂的战斗情绪。同时积极想办法解决各种物资供应问题。部队御寒物资奇缺，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能就地筹多少就补给多少。部队收集了当地群众的防冻办法，教

育战士们防冻。有的连队把日军投降时丢下的毛毯子剪成小块,分给大家包脚。有的人把孢子皮、猪皮、牛皮剪成块穿上几个小孔,扎起来当鞋子穿。因天冷枪拉不开栓,撞针缩短,击发时枪打不响。为了护枪,战士们两个人合盖一床被子,抽出一床做枪套。广大指战员靠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保证了剿匪斗争的顺利进行。

在作战中,我们根据土匪熟悉地形、民情等特点,一般以团为单位行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争取主动,争取时间,多打小仗,多打胜仗,积小胜为大胜。这样,既能造声势,震撼敌人,又能鼓舞志气,教育宣传群众。清剿黑七旅的斗争从1945年12月开始,到1946年4月基本结束。在此期间,敌我双方频繁交战,主要战斗有以下几次:

第一仗,朱家坎战斗

朱家坎是中长铁路的一个大站,是龙江县境内的一个大镇子。黑七旅在这里安了据点,驻着大约一个营的兵力。1945年12月中旬打朱家坎时,我带一个团从富拉尔基出发,冒雪行军,走了一天到七棵树宿营。晚上进行了战前准备,决定由管理科长带一个骑兵班留在七棵树作为战斗后方,大部队第二天一早出发,直奔朱家坎,打敌人个措手不及。想不到我们的作战计划被七棵树的坏人知道了,他们连夜赶到朱家坎给土匪报了信。第二天,我们还没有接近朱家坎,敌人就迎上来,象疯狗一样向我们猛冲,部队仓促应战,就地还击,打了十几分钟,敌人就逃跑了。这一仗双方各有伤亡,战绩不佳。朱家坎战斗刚结

束，七棵树的一位老乡赶来报告，说我旅留在七棵树的一班人全部被土匪抓了起来。听到这一消息，部队立即原路返回，赶到七棵树一看，留下的人除管理科长和两个战士逃离虎口外，其余 12 名同志全部被土匪杀死了，尸体扔在村外的雪地上。这些被害的同志，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有的从关里千里迢迢来到东北，有的是刚参军不久的新战士，他们壮志未酬身先死，大家心里真比油煎还难受。同志们面对死难的战友脱下军帽，肃立默哀；几百匹战马不嘶不鸣，似乎也在垂首哀悼。我们首战失利，主要是由于指挥员缺乏在新区对敌作战的经验，对敌情估计不足造成的。这一血的教训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对阶级敌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该有丝毫的麻痹。战后，我们及时认真地进行了总结，对部队进行阶级教育，提高革命警惕，丰富对敌斗争经验。

十来天以后，我带部队剿匪路过七棵树，发现烈士的坟墓被刨开了，12 具尸体统统被拉了出来，扒光了衣服，暴尸荒野。目睹此情此景，干部战士都气得两眼冒火，怒不可遏，我心中的仇恨更是无法用语言形容，土匪杀害我们的同志连尸首都不放过，这是何等残酷的斗争啊！由此我联想到陈云同志的指示：你们到了新区，首先要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否则，就死无葬身之地。——这用鲜血换来的经验应该牢牢记取。

第二仗，解放景星

景星当时是个县城。黑七旅大约有一个团的兵力盘据在那里。战前，我们派人进行了详细侦察，摸清了敌人的兵力布署及火力配备情况，召开了民主会和战前分析

会。针对土匪机动性强的特点，决定由我和参谋长率六团出击。这一仗，我们吸取了朱家坎战斗的教训，严密封锁消息，先组织轻便部队迂回包围，主力部队随后跟进，进行扫荡，在土匪闻风逃窜之际歼灭之。战斗打响后，敌我双方在景星城东的开阔地展开了激战。子弹呼啸，刀光闪闪，杀声震天。我旅指战员策马冲入敌阵，奋力拼杀。匪军招架不住，弃战向西北逃窜。我军穷追不舍，边追边打，最后把敌人赶到景星西北的沼泽地里。当时正值严冬季节，沼泽地到处是冰，匪兵的马到冰上站不稳，跑不动，乱作一团。我六团部队在沼泽地边猛打，当场又击毙百余名匪兵，还缴获了一些马匹和枪支，打了一个漂亮仗，解放了景星县城。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苦难群众第一次见到了人民解放军。当我们的部队经过县城的时候，群众都怀着好奇的心情，跑出来看望子弟兵。景星解放后，由六团驻守，开展剿匪斗争。

第三仗：攻占碾子山

这一仗消灭土匪二百余人。攻占碾子山以后由五团驻守，负责在碾子山、李三店、札兰屯一带的剿匪。这样以来，北至甘南，南至景星，东至富拉尔基，西至内蒙古边境，方圆百余里的主要城镇都被我们占领了。部队一面剿匪，一面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帮助龙江、景星等县建立了县政府、县大队，各区建立了区中队，各个村庄都组织了民兵，成立了“贫雇团”。同时，我们还领导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大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大灭了地主老财的威风，很快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广大群众为打土匪、保家乡，用血汗和生命帮助我军夺取胜利。他们的优

秀子弟大量地源源不断地参军,使部队充满了新的血液和前进的活力。到1946年2月,警备二旅已经发展到两千余人。为了防止土匪的进犯和骚扰,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替部队联络送信、送情报、当向导、送粮食、护理伤病员。每当我们作战归来,群众都跑到村口热情迎接部队,争着把战士拉到自己的家里,腾出热炕给部队睡,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给战士们吃……。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和保护,是很难在嫩江站住脚的。

第四仗:李三店遭遇战

在李三店西南方向二十多里处的几个村子里,驻扎着几百名黑七旅匪兵。我旅打下李三店以后,决定乘胜追击,消灭这股敌人。

1946年3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们带着五团、六团一部分部队和一个机枪连,从李三店出发,直奔匪军驻地。部队出发后,五团在左,六团在右,抄小路赶到前面去包围敌人,指挥机关和机枪连走中间。次日凌晨三点多,五团和六团摸到敌人驻地,结果扑空了。几乎在同一时间,旅指挥机关和机枪连遭到敌人袭击。后来才知道,袭击旅指挥部的敌人就是我们准备消灭的那股土匪。敌人从四面围来,企图吃掉我们,我指挥机枪连占领一块高地顽强抵抗,我自己抢着一挺机枪猛烈扫射,连续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但由于土匪人多,火力猛,打了一个多小时,机枪连有近一半同志牺牲了,还有不少人受伤,子弹差不多打光了。这时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离我们只有20多米远了,匪徒们蜂拥而上,嗷嗷叫着抓活的。面对敌人的器

张气焰，干部战士毫无惧色，坚守阵地。不少同志上好了刺刀准备同敌人展开白刃战，拼个鱼死网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了。五团和六团听到枪声跑步赶来。从外面包围了敌人，形成了敌围我，我又围敌的局面。这样一来，我们机枪连从内向外打，五团、六团从外向内打。敌人前后挨打，顿时乱了阵脚，一时间被杀得尸横遍野。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歼敌四百余人，消灭了这股顽匪，还缴获了许多枪支、马匹。

第五仗：全歼黑七旅

在警备二旅的沉重打击下，黑七旅连遭败绩，短短三个月的时间被我军歼灭两千余人，兵力损失了一半。土匪气急败坏，开始避开我军主力，对我后方根据地进行疯狂地报复。

1946年4月初的一天，我收到省委书记刘锡伍同志派人送来的一封信，说黑七旅残部已经从内蒙绕到甘南附近集结；“工人独立大队”正准备叛变，欲与黑七旅里应外合，妄图颠覆省委和省政府，让我旅火速赶到甘南。

所谓“工人独立大队”，实际上是伪满时期的伪满军和地方上的一些惯匪组成的一支杂牌武装。后来被省军区收编，但从来无人管教，他们自己随便行动，与黑七旅明来暗往，联系密切。

我收到信后，因情况紧急，已无暇多虑。当天下午我们一面命令部队迅速集结，一面积极做出发准备。晚饭后，部队从富拉尔基出发。一路车轮滚滚，马蹄翻飞，驰骋在茫茫雪原，连夜向甘地奔去。经过一夜急行军，跋涉二百余里，于次日凌晨赶到了甘南县城。到甘南以后部队原

地待命，我和政委尹时炎同志到省委接受任务。刘锡伍同志向我们做了详细介绍。当时情况已十分严重：黑七旅先头部队距甘南只有20里路，一旦进犯，用不了3个小时即可兵临甘南；“工人独立大队”叛变已确定无疑，正在蠢蠢欲动。刘锡伍同志代表省委指示我们立即动手，先把“工人独立大队”中队长以上的头目抓起来，然后把全队的武器缴掉，把人员控制起来，防止其与敌人里应外合。同时做好战斗准备，还击黑七旅的进犯，保护省委，保卫甘南。

接受任务后，旅部召开了旅团干部会议，研究布署行动方案，对部队作了战前动员。

当天下午，我们以开会的名义把“工人独立大队”中队长以上的头头召到驻地，准备在会上把他们抓起来，谁知这帮家伙戒心很强，来开会的每人带着四五个保镖，个个保镖都是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紧跟在上司屁股后头寸步不离。当时我问他们：你们来开会为什么还带这么多警卫人员，而且又都是荷枪实弹，这样到旅部来不好吧！他们说到处都是敌人，要时时警惕。由于对方戒备很严，我们未得下手。事后，我们几个旅领导干部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会议决定：当天晚上在县政府大院召开警备二旅和“工人独立大队”全体人员大会。并事先做好布置，把“工人独立大队”安排在会场中间，我们的队伍摆在两侧，在开会时用武力逼他们放下武器。晚上开会时，我正在台上讲话，“工人独立大队”朝台上开了枪，当场打死我七八个同志。警卫员为了保护我，一下子把我扑倒在下面，接着一梭子弹打过来，警卫员牺牲了。见此情景，我们的队伍也开了火。二个团的兵力把“工人独立大队”夹在

中间，边打边喊：“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在我强大的军事力量震慑下，“工人独立大队”一部分人缴械投降，顽固分子被当场击毙，消除了一大隐患。

我们解决了“工人独立大队”的第二天，黑七旅残部倾巢出动，又纠集了三四百“红枪会”反动分子当炮灰，开始向甘南进犯。我旅按照既定部署，由四团在甘南以南的集县村一带正面阻击敌人，五团留作机动。战斗打响后，“红枪会”分子冲在前面，很有节奏地高喊着“刀枪不入，刀枪不入……”，杀气腾腾地向我军阵地逼来，我四团严阵以待，等他们走近了，团长一声令下，机枪、步枪、冲锋枪一起向敌人扫去，一个个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敌人象秋后的秫秸顿时倒下了一大片。“红枪会”分子拼命精神很强，他们前边的倒下了，后边的又紧跟着冲上来。打了不到一个小时，“红枪会”分子全部亡命于我军阵前。刚打垮“红枪会”，黑七旅又开始了冲锋。上千名匪徒象旋风一样驱马向四团阵地猛扑过来。土匪头子在马上指挥匪兵边冲边喊：“兄弟们，冲啊！到甘南发财去！”为了阻止敌人，我四团迅速调整防守，把队伍分成三排，前排卧倒，中排跪下，后排立起，组成了一个密集的立体火力网，在有效距离里向敌人马匹猛烈开火，打得土匪人仰马翻，寸步难行，几次冲锋都被顶了回去。在我军顽强阻击下，敌人打红了眼，死盯着四团阵地不放，一心想从这里突过去，冲向甘南。这时，我见时机已到，于是一面命令四团吸引敌人注意力，一面命令五团从两侧迅速向敌后迂回，断其退路，包围敌人。正当黑七旅疯狂进犯我四团阵地时，五团在敌人背后打响了，一时使敌人陷入了进无门，退无路

的绝境,成了瓮中之鳖。我旅两个团分别占据有利地形,把敌人围在中间,时而组织骑兵向敌群冲杀,时而集中火力猛打。经过大半天拼杀,黑七旅几乎全军覆灭,匪旅长宋同山侥幸漏网,在混战中,他带着几十个残匪夺路逃到了内蒙古境内。

全歼黑七旅的胜利消息象春风一样吹遍了嫩江两岸,广大群众喜笑颜开,奔走相告。人们抬着猪赶着牛来慰劳部队,感谢子弟兵为他们除了一大祸害。个个屯子敲锣打鼓扭秧歌,欢庆胜利。

三、解放齐齐哈尔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经过近五个月艰苦奋战,我们在嫩江终于渡过了难关。随着黑七旅的覆灭,各地反动游杂武装相继被铲除,土匪地盘日益缩小,我们力量越来越大。除了齐齐哈尔被敌占据外,大片地区都已解放,革命政权一批批建立,为我军夺取嫩江剿匪的彻底胜利创造了可靠的基础。

1946年春夏之交,在西满军区的直接指挥下,我旅同兄弟部队相配合,发起了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齐齐哈尔是个土匪窝子,有一万多土匪盘据城内,号称“光复军”。“光复军”司令叫尚其悦,是嫩江省讷河县人,恶霸地主出身。国民党接收大员彭济群任嫩江省主席以后,尚其悦很快与彭济群勾结在一起,当上了彭济群的卫戍司令。彭济群、尚其悦为了讨好、拉拢驻齐齐哈尔苏军,给驻齐苏军司令找了妓女,打了金子,送了大批珠宝、绸缎,把这个家

伙拉下了水。在苏军看来，彭济群政府是嫩江省唯一合法的政权机关，“光复军”是正牌的卫戍部队，不容侵犯。彭济群、尚其悦们可以随便出入苏军司令部，不受任何限制。苏军对我们则是多方限制，百般刁难。不准我党政军机关驻在齐齐哈尔，把我们从小城赶到乡下，后来又干扰我军到齐齐哈尔剿匪。因此，在剿匪斗争中，一些被我军打得在乡下无处存身的土匪、地主武装和地痞、流氓都纷纷逃往齐齐哈尔投靠“光复军”，栖身于苏军的保护伞之下。所以，要消灭“光复军”，捣毁彭、尚反动政权，解放齐齐哈尔，首先要让苏军撤军。为此，刘锡伍、于毅夫、朱光、王盛荣和我曾联名给彭真同志写信，信的大意是：驻齐齐哈尔苏军头目与国民党、土匪有勾结，串通一气，限制我军行动，干扰我剿匪斗争，建议与苏联远东军司令部联系，将其撤走。

4月底，我们接到西满军区指示，告苏军即将撤军，命我旅立即做好攻城准备。

5月1日，苏军开始撤军。在撤军过程中，这伙苏联红军的败类象强盗一样，见什么抢什么，大发横财。当时我们正在中长铁路沿线的富拉尔基，每天都见到有苏军的专列从这里通过，车上装的大都是粮食、布匹、衣物、皮货、药材以及猪、马、牛、羊等等，就连办公用的桌子、椅子也被他们装上火车运走了。几天时间，齐齐哈尔以及附近的村镇基本上被洗劫一空。当地群众骂他们说：“大鼻子”（指驻齐苏军）和“小鼻子”（指日本人）是一路货，都是到中国发财来了。

在苏军撤军的同时，我旅部队开始集中，向齐齐哈尔

靠拢。5月25日，苏军全部撤离。26日，我旅与兄弟部队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齐齐哈尔，断绝了敌人与外界的联系。

正值我军围城待攻之际，西满军区副司令员倪志亮同志赶到嫩江，任攻城总指挥。攻城前，指挥部召集各部队负责同志开了战前准备会，制定了作战方案，决定5月28日晚开始攻城，具体战斗分工是：警备一旅攻西门，西满军区调来一个旅攻南门，我旅四团攻北门，六团在东门外埋伏，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会后，我们连夜分头行动，向部队作动员，构筑工事，进行战前准备。广大指战员听说要打齐齐哈尔，都高兴极了，个个磨拳擦掌，求战热情非常高涨，请战书、决心书象雪片一样飞到旅部。

齐齐哈尔东面是沼泽，一面靠嫩江，城头工事林立，城下水流湍急，易守难攻。我军兵临城下后，“光复军”预感不妙，更加戒备森严，妄图依靠嫩江水泊做天然屏障，固守城池，与我军决一死战。为了把战前准备工作做得细致充分，我们对敌情进行了详细的侦察，把敌人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以及敌军的指挥特点、作战能力都摸得一清二楚，做到了心中有数。根据侦察的情况，我们抽调了一百余名战斗骨干组成了五个尖刀排，又做了一些云梯，准备在部队发起进攻时强行登城，然后打开城门，接应大部队进攻。

5月28日晚九时许，指挥部下达了攻城命令。顿时，攻城部队杀声四起，枪炮齐鸣，震撼着夜空，数以千计的炮弹在城头开花，齐齐哈尔陷入了一片火海。在强大的火力的掩护下，我指挥尖刀排开始登城。北疆的5月，正是

乍暖还寒，冻人不冻水的季节。为了行动方便，尖刀排的同志们不顾寒冷，脱掉棉衣，抬着云梯，渡过护城河，迅速摸到城下，搭上云梯，向城头攀登。正当这时候，敌人发现了。匪徒们居高临下，向尖刀排猛烈扫射。我们的同志一个个从云梯上倒下来。第一次登城失败了！接着，第二梯队又冲了上去。但由于敌人的机枪封锁很严，尖刀排还没过护城河被敌人火力压了回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第二梯队退下来的时候，我一看表已是夜间两点多钟，离天亮只有两个多小时了。在这段时间里，尖刀排如果登不上城头，打不开城门，就会影响整个战斗。当时，我心急如焚，立即召开火线党委会，简要地总结了前次攻城失败的教训，修改了作战计划，决定把旅部机炮营和全团机枪集中使用，把敌人火力压下去，掩护尖刀排登城。这一次，由于我军火力集中，敌人被打得抬不起头来。第三梯队终于登上了城头。紧接着，第四梯队、第五梯队也上去了。尖刀排登上城头以后，敌人见防线已破，狗急跳墙，疯狂反扑。尖刀排数十名战士，利用敌人工事顽强抵抗，以一当十，奋力拼杀，不断扩大战果。终于抢在清晨五点钟前打开了城门，接应全团冲进了齐齐哈尔。紧接着，警备一旅和西满军区那个旅也打开了西门和南门，攻进了市内。

我旅四团攻进城后乘胜前进，以排为单位，与敌人展开了巷战。土匪开始非常顽固，死到临头不投降。他们依靠市区的明碉暗堡和房屋建筑负隅顽抗，企图阻挡我军前进。我们采取“掏麻雀”的战术，用炸药包、手榴弹，一个碉堡一个碉堡地炸，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打，打掉一个前进一步，逼着敌人步步后退。打到下午三点多钟，我旅四

团攻进市区中心，攻进了伪省政府，在省政府大楼上升起了第一面红旗。当红旗徐徐升起的时候，干部战士都激动得热泪盈眶。站在楼顶上的同志们高兴地呼喊：“齐齐哈尔，人民的城，我们回来了！”

战斗进行到下午4点钟，敌人被打得焦头烂额，溃不成军，破门向东逃去。谁知刚出城不远，便遭到了埋伏在城东的我旅六团的迎头痛击。我站在城头上清楚地看到：旅副参谋长吴永福一马当先，率领千余名骑兵，冲过荒草甸子，从宽大的正面向敌人扑去。匪兵们刚吃了败仗，又遭到意外打击，更加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我六团官兵士气旺盛，跃马扬刀，向敌人猛烈冲杀，杀得敌人鬼哭狼嚎，血肉横飞，不到两个小时就胜利结束了战斗，全歼溃逃之敌，缴获了大批武器和战马。在这次伏击退却之敌战斗中，六团九连一个名叫王强的战士打得非常出色。他原名叫王全，身强力壮，英勇善战，闻名全旅。所以我给他改名叫王强。在这次伏击战中，他一人两匹战马，一挺轻机枪，全身都背满了子弹。战斗打响后，只身冲入敌群，在马上抱着机枪猛烈扫射，歼敌近百名，荣立一等功。

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全歼“光复军”一万两千余人，活捉了国民党嫩江省主席彭济群，生擒“光复军”司令尚其悦，取得了嫩江剿匪斗争决定性的胜利。

齐齐哈尔解放后，指挥部在齐齐哈尔为参战部队召开了庆功大会。我旅战绩卓著，受到西满军区通令嘉奖。我旅四团被留驻齐齐哈尔市做卫戍部队。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及机关随即迁到齐齐哈尔，嫩江省委、省政府、省

军区和齐齐哈尔市、市政府也从甘南迁回齐市。

四、实行土改，挖匪根

1946年6月，陈云同志到齐齐哈尔，召集主持党、政、军负责同志开会，传达东北局关于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陈云同志指出：我们要想在东北扎下根来搞革命根据地，建设巩固后方，必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东北的贫苦农民祖祖辈辈没有土地，他们是多么渴望有自己的土地呀！有人说东北土地多，农民不需要土地，那完全是地主阶级理论。我们必须坚决地实行土地改革，打倒地主阶级，把土地分给农民，让农民得到根本的利益。只有这样，群众才能真心实意地拥护和支持我们，才能自觉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和我们一道斗争。否则，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西满分局书记兼西满军区政委李富春同志也在讲话中说：我们在红军时期，毛主席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有太行山等许多抗日根据地，我们依靠这些，巩固的后方和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持，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今天，我们同样要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要达到这一目的，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大任务：一是打仗剿匪，二是实行土地改革。要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遵照东北局的决定和西满分局的指示，嫩江省于1946年夏委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我旅派出一部分同志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同时担负着保卫土改的

任务。

当时，嫩江地区的大股土匪虽然已经被消灭，但敌情、社情仍十分复杂，反动地主武装、小股惯匪盗寇、“黑七旅”、“光复军”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活动仍十分猖狂。在土改运动中，这些土匪势力和地主恶霸勾结在一起，经常夜间窜进村子烧杀抢劫，疯狂地向人民群众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尤其严重的是，有少数暗藏土匪混进了革命队伍，从内部搞颠覆，杀害土改干部，破坏土改运动。闻名嫩江的“李三店惨案”就是一例。1946年夏天，嫩江地委书记顾卓新带一个土改工作队在龙江县李三店区搞土改试点，工作队成员有我旅干部刘焯、贾克、翟东平、赵敬璞、李超等人。搞了一段时间，大部分工作队员都撤了出来，李超等几名同志留下来巩固土改成果，不幸遭到了敌人袭击。“李三店事件”区中队中队长黄鹏飞策动区中队叛变，用割舌头、剜眼睛等非人刑罚残酷杀害了李超等三名土改工作队负责同志。类似流血报复事件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生，搞得群众人心惶惶。许多人因为怕敌人报复，不敢参加土地改革，不敢斗争地主，已经分到手的土地、财产也不敢要了，土改运动遇到了严重阻力。

面对阶级敌人的疯狂破坏，为了彻底铲除匪根，坚持贯彻东北局关于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我们接受“李三店事件”的教训。加强了对土改工作队的保护，同时结合土地改革的深入进行，开展了“挖匪根”的斗争。

在“挖匪根”斗争中，为了防止敌人从内部破坏，首先对内部进行了整顿。对所有的干部逐个登记、审查、建立档案。通过整顿我们发现制造“李三店惨案”的首犯黄

鹏飞原来是一个混入革命队伍的暗藏土匪分子。在整顿中,对类似黄鹏飞式的人物及一些其他不良分子,坚决进行了清洗,纯洁了革命队伍。

其次,是依靠和发动群众在土改中“挖匪根”。我们组织了二、三十人不等的小分队跟随土改工作队下乡,一面搞土改,一面“挖匪根”。事实证明群众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群众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反动地主武装土崩瓦解后,依附地主阶级的暗藏土匪分子也象地老鼠一样,一个个被挖了出来。清查的结果表明,这类老鼠性土匪在嫩江地区分布很广,数量也很大。清除了这些社会渣滓,就从根本上拔掉了土匪的老根。

对流窜于社会的小股“麻雀式”土匪,我们一方面组织小分队进剿,同时发挥我军的政治工作的威力对土匪分化瓦解。一般说来,土匪都很顽固,是不易瓦解的。但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同样有胁从的不坚定分子。他们当中有的是被抓、被逼和其它原因误入歧途,还有的是想发财当了土匪。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无疑是能够争取的。为了瓦解土匪组织,我们配合土改工作队举办了土匪家属学习班。对他们不打、不骂、不虐待、不胁迫,以常人之心真诚相待,耐心地启发教育。给他们讲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的大好形势,交待我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使其丢掉幻想,打消顾虑。号召他们及早动员自己的亲属脱离匪组

织,弃暗投明。通过教育使不少土匪家属提高了觉悟,认清了形势,纷纷捎信动员他们的亲属脱离匪组织,回乡生产。对于那些从土匪队伍中回来的人,只要他不是罪大恶极分子,只要把问题向政府、向群众讲清楚,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们都表示欢迎。家境贫困的照样分给土地、房子、粮食和衣物,使这些人很受感动。有的还主动给自己原来的同伙捎信,介绍他们回乡的情况,宣传我党我军的宽大政策,对土匪起了分化瓦解作用。

在“挖匪根”斗争中,由于我们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正确路线,斗争开展得顺利迅速。到1946年底,全部肃清了残匪,铲除了匪根。这使广大贫苦农民打消了顾虑,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土改热情。土改工作队所到之处,村村都成立了“贫农团”、“贫农协会”和民兵组织,带领群众斗地主、分田地,用当地群众话说,叫“砍大树,挖财宝。”伟大的土改运动,犹如燎原的烈火,在嫩江两岸熊熊烧起来了。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热爱子弟兵,对党的号召,一呼百应,积极支援前线。辽阔的嫩江平原成了我们的可靠根据地。

嫩江剿匪的胜利,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我们开始挺进嫩江的力量虽然不大,但由于党的领导,高高举起了人民解放的旗帜,坚持放手发动群众,积极打击敌人,壮大我军的力量,因而完成了剿匪任务,开创了嫩江革命根据地。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历史的时候,我都深深地感到:兵民是胜利之本,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就是胜利的保证。

(姚恩轩 整理)

在我军第一所航校学飞行

韩 明 阳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决定利用东北日本关东军的航空基础，在东北解放区建立一所航空学校。那时，我是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的年轻学员，非常幸运地被调到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成为这所航空学校第一期毕业的飞行员。

一、我当“空军”啦！

1945年只剩下最后一个星期的时间了，我们这些从山东抗日根据地战略转移到吉林省通化市的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的干部和学员们，正在积极作开展拥政爱民活动的准备，紧张地练习扭秧歌和排练小歌剧《姑嫂劳军》，要很好的与刚解放的东北父老乡亲欢度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新年。就在这个时候，又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为了贯彻党中央在东北创办一所航校的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要在‘抗大一分校’挑选飞行员。”其后，抗大一分校共有数千名学员、干部参加了体检，结果有104名年纪轻、身体好、文化水平相对高一些的同志被选中了，其中有王洪智、林虎和我。当时，我只有17岁，他俩都比我大一两岁。林虎是1938年入伍的老八

路,年龄虽只有 18 岁,而“兵令”却已经 7 年。当我们这些人得知已被航校录取了,真是欣喜若狂,四处奔走相告,和战友们告别,同志们也向我们祝贺。从井冈山下来的老红军、我们 8 队炊事班老班长泪水双双下流,嘱咐我们要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为我们的教导员报仇!这时,三个月前的一场国民党飞机大空袭的流血事件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那是在 1945 年 10 月份,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为了解放被日寇统治 14 年的东北父老,我们奉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从山东根据地向东北新解放区挺进。在烟青公路上,四架国民党飞机向我们俯冲扫射,教导员在指挥着部队疏散防空,飞机又俯冲下来了,偏偏这时老炊事班长在全力对付被飞机吓惊了的驮着炊事用具的马,没有疏散隐蔽。教导员狠劲地把老班长刚刚拉到路边水沟里将他按倒,只听一串机关炮声。教导员负了重伤,我们不顾敌机在空中狂叫,跑到教导员身旁。教导员看着我们,又以愤怒的眼睛瞪着天空中越飞越远的敌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停止了呼吸……”

那天晚上,所有进航空学校的人都不想睡觉,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聊大天。聊着过去在山沟打游击的战斗生活;聊着对敌机横行霸道的仇恨;聊着未来要在空中和曾经肆虐天空的敌机作战的向往。

“谁看见过真正的飞行员?”不知谁冒出这么一句。

“我见过,半年前在山东费县城驻防时,我们连和‘工农大队’(对外称“日本人工农学校”)联欢时,我见过一个因飞机故障迫降在泗水县、被我军俘虏的日本飞行员,他

在篮球场上打中锋，是主力队员，篮球打的很漂亮，还会包饺子。其他和平常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信口开河地说了这几句风马牛不相及的话。

不知不觉地度过大半夜，凌晨两点才回到各房东屋睡觉。

1945年12月25日，我们来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报到，不几天，“延安炮兵学校”和“延安干部大队”的学员也陆续到达了。1946年1月1日，航空队扩编为“航空总队”。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简称“东北老航校”正式诞生，学员大队立即进行航空理论学习，理科教官主要是日本人。5月份因战况吃紧，航空学校转移到黑龙江省的牡丹江。

在牡丹江，我们将开始进行飞行训练了。但全校只有4架日式“英格曼”初级教练机，第一期40多个飞行学员无法同时进行训练，不得不把飞行员按年龄大小分成甲、乙两班。甲班12人是23岁以上的同学，他们先飞。乙班边学航空理论边等待。可是，那4架“英格曼”嗡嗡了几个月，甲班不但没有放单飞的，还摔坏了两架初级教练机，剩下的两架都严重变形，无法使用。先飞初级教练机的门路被堵死了，此时，航校设在牡丹江市内的汽油库也被国民党的特务放火引爆炸掉了，外场存的汽油眼看就要用光了，又无新的来源。乙班飞行的希望很小了，这时，国民党军队已打到了松花江边，连哈尔滨的机关都在准备撤退，不少人实在等不及了，要求回陆军，到前线去和敌军面对面的作战。

1946年乙班学了一年航空理论，焦急地看着甲班飞

行了一年。

二、一个“日本反战同盟盟员”的“自白”

1947年春天,常乾坤校长向我们乙班的学员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经过上级批准,让我们越过初级、中级教练机,直接在99式高级教练机上学飞行。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令人鼓舞,但史无前例。教官训练班的飞行员过去都飞过;甲班12个人在“英格曼”初教机上也都飞了几小时。我们乙班飞初级教练机的门路被堵死了。中级教练机一架也没有搜集到,只有一些破旧的99式高级教练机和几架日式战斗机。当时,世界各国训练飞行员的常规都是三阶段,先飞初级教练机,再飞中级教练机,最后飞高级教练机或战斗机。我们既无初级的,也无中级的,怎么办?可以不可以打破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三级教练法,越过初、中两级,直接飞高级教练机呢?现在,常乾坤校长代表组织吹起了进军号,我们这些初生的牛犊,给老虎也敢骑的人,什么也不怕。但是,有些人有顾虑,他们觉得外国的飞行员在初级、中级教练机上训练两三年才上高级教练机,能行吗?有些思想保守的人,觉得我们这些“土包子”直接飞99高练,简直是想一步登天,开玩笑。甚至有人讥笑说:“只怕飞得高,摔得重。”但不这样做又有什么法子呢?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学员积极求飞的一块操场上,飞行编组开始了。

全体学员集合在干镇村的一块操场上,我们和飞行教官们首次见面了。航校主任教官林保毅(林弥一郎)、主

任教官系川、黑田、教官山本、鲍武生、木暮，在队前横列一排。由刘风大队长向我们一一做介绍。

飞行前测验是在航校总主任教官林弥一郎的亲自组织下进行的，所有的日本飞行教官用人构成航线起落的图形，每个重要的位置上站着一个人。当学员通过各点时都要回答教官的提问，如起飞有几个动作？注意事项是什么？遇到特殊情况如何处理？等等。从滑行、起飞、上升、第1、第2、第3、第4转弯、下滑目测、着陆、滑跑、脱离跑道、关车……答对了就通过到下一点，答错了就停止测验，进行复习后再重新测验，直到及格后才能上飞机。

木暮站在“着陆”的位置上，当我通过此点时木暮问我：“下滑速度是多少？”

“180”，我答。

“拉开始的高度？”

“7米。”

“1米平飞注意力的分配？”

“目视左前方50米地面，保持1米平飞，边下沉边柔和拉杆，轻三点着陆。”

木暮教官对我的回答很满意，手向前一挥笑着说：“很好，通过。”

测验完成后，宣布编组。我和林虎、王洪智三个编为一个小组，我们组的教官是木暮重雄，我发觉好象在那里见过面，想来想去，惊奇的发现木暮就是我在费县看到的那个会包饺子的飞行员，他高高的个子，二十六、七岁，听说还有较好的飞行技术。

在第一次见面会上，木暮教官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简

历,他说:“每个人降生都是裸体真诚入人世间,抱着幻想憧憬,寻求着千差万别的大千世界,但有时自己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在侵华战争中,是侵华日军的命运,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在侵华战争中,是侵华日军在华北空军特别攻击大队的战斗机飞行员,那时,日本人不分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地进行训练、作战,每个人总想为天皇效忠,欠下了中国人民的血债。1945年1月15日,我在驾机执行任务途中,因飞机故障强迫着陆,迫降于抗日根据地山东省泗水县县城南郊,被八路军俘虏。那时我不了解八路的政策,心中十分恐惧,曾企图自杀,还开过小差,我被八路军再次捉回。这时遇到一名日本反战同盟的盟员,名叫小岛,用他自己的感受开导我,并用木轮车把我送到根据地,到山东日本工农学校(抗日军政大学的工农大队)学习,我的生活发生了180度的急转弯。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八路军的统一战线政策,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八路军对我在政治上不歧视,生活上很优待,发了八路军的新军服、衬衣、鞋、袜、还有毛巾、牙刷、肥皂、牙膏……总之,我们的待遇和八路军的干部一样,心里很感激。春节会餐,抗大的领导专程到工农大队给日本人拜年。一次,我和中国的学员一起洗澡,发现他们枪内没有带子弹,感到中国同志想的周到、细心。

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不久,成为‘日本反战同盟’盟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为了接收在山东的侵华日军据点,我到青岛、张店一带对日军进

行战场喊话。碉堡内的日本人多次向我开机关枪。有一次，碉堡内的日军举起白旗‘投降’，八路军派出四人前往受降，在离碉堡约 50 米时，敌人开了枪，四名八路军受降代表全部牺牲，负责掩护我的一个班长也被他们打死了，我亲眼目睹了全过程，两眼冒火，跳出掩体端起轻机枪对着碉堡，哒！哒！哒！！……”

听着木暮的自我介绍，我们都感到亲切、高兴。特别感到高兴的是他是日本飞行教官中间的“老八路”，还和日本法西斯分子打过仗，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中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

三、比翼齐飞在蓝天

1947 的 5 月 7 日，这一天是我永生不忘的日子，我们要开始感觉飞行了。那时，我们乙班 30 多个人住在一间榨油的油房里，用木板打个大通铺，每人只有 75 公分宽的位置，肩膀靠着肩膀，连翻身都得彼此协调动作。头天晚上，大家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觉，都担心天气不好，不时有人到院子里去看天气，我自己也出去了三次。还好，天空繁星闪烁，一丝云彩也没有。

天空，这是我们飞行员的练兵场。过去我们是在操场上立正、稍息、齐步走，投弹、射击、拼刺刀，在山川、平原上蹲战壕、打野外。如今，我们要到天空中去学本领，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凌晨三点钟，天空还是一片漆黑，大家就起了床。今天的早餐也变样了，由平时的小米粥、玉米面窝窝头换成

了白面馒头,大碗白菜饨粉条,里面还有星星点点的肉花,就象过节会餐一样。四点钟,大家乘坐一辆短脖子日本造的运输车,出发去机场,到达机场后,见地勤人员早已把飞机检查完毕,只剩下给飞机加油了。那时没有现代化的加油车,只好用小桶一桶一桶地直接往飞机的油箱中加油,同时还要在加油的漏斗上放一块麂皮布进行过滤,以防止杂质堵住输油管。我们和地勤人员一起为飞机加油,大家小心翼翼,惟恐洒在地上一滴油,几十立升容量的油箱,我们足足灌了半个小时。当两发绿色信号弹升起在晨空时,我们的首次感觉飞行开始了。

我们组第一名飞行的同学是王洪智,他是个大个子。当他和木暮教官先后进了后座舱和前座舱,准备开车时,我就和一名日本机械员在机头的左侧摇着大摇把,就象用大摇把起动汽车的发动机一样,给惯性起动机“上劲”。由于天气冷,发动机起动很困难,我们四个人轮流摇动大摇把,先后接通了三次,累的满头大汗,发动机才发动了起来。当我们目送飞机消失在清晨的天空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飞机降落了,按顺序第二个该轮到我了。我个子矮,待王洪智同学走下飞机后,就带着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布垫子进入了座舱,把垫子放在了座椅上,调整好座位高度,又捆好了保险带,把飞机滑进了跑道。当信号员扬起白旗时,发动机一阵震耳的轰鸣,飞机象箭一样地射向了天空。正当我感到新奇之际,没想到那个垫在屁股下面的破布垫有一个漏洞,被风一吹,里面的烂草和尘土飞满了座舱,迷的我两眼直流泪,什么也看不清了。过了一阵,当

我擦了擦眼泪，往外看时，见飞机已经在木暮教官的操纵下，高高地飞翔在天空了。只见那弯弯曲曲的小河，那行驶在松花江上的白帆，那奔驰在两行发亮的铁轨上的火车……地面上的一切好象都在向我的机翼下飞来。我正看得出神，突然背后被触动了一下，我回过头来，只见木暮教官的右手伸着食指前后晃动，脸上做着内行人一见就明白的表情。我领会了他的意思是让我亲自操纵飞机，体会驾驶要领。我高兴地用力抓住驾驶杆，蹬紧双舵，唯恐飞机不听我使唤。我想：既然体检时要求两只手要有50公斤的握力，说明操纵飞机需要用力气，我这个棒小伙子一定能把飞机“震住”。谁知飞机一到我手中，就像一匹没经驯服的烈马，忽高忽低，忽快忽慢，两只翅膀左上右下象喝醉了酒似的。我吃力地做完两个大转弯后，按照教官的口令开始返航。飞机重又回到教官手中，他做的每一个飞行动作都是那样的柔和自然，我聚精会神地看着飞机轻轻的三点着陆了。

着陆后，木暮教官对我的“感觉飞行”进行了讲评。他说：“韩君，作为一个飞行员，要胆大心细，既要勇敢，动作又要柔和、细致，要象姑娘绣花一样，动作粗的、大大的不行。”这几句既无表扬，又无批评，只是指出了我加强训练主攻方向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克服动作粗的缺点，我在驾驶杆上镶上了两枚图钉，让它发出知觉信号，在飞行裤上写了“柔和”两个碗口大的字，作为座右铭，勉励和提醒自己，使动作粗的缺点迅速得到了克服。那时，每周5个飞行日，一个机械日，每个飞行日飞2—3个起落，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围绕着如何能够飞的好，不

知不觉度过两个月,在 100 多个起飞、落地训练中,一直都很顺利,经常受到木暮教官的表扬。

在乙班,还发生过用 50 公斤力量推杆起飞,差一点丧了命的故事。

当我们开始飞行时,与我同期训练的刘玉堤同学因得了大叶肺炎住院,缺课一个多月,他病愈后急于追赶训练进度,向同学们请教飞行体会,许多人传授了很好的经验,也有人传播了不准确的概念。

“起飞推杆的力量用多大?”刘玉堤问华龙毅同学。

“体检时测量手的握力要 50 公斤,说明驾驶飞机手要用劲。一只手提一桶水还不到 50 公斤呢!”华龙毅说了几句绕弯子的话,本意是要说起飞推杆要用劲。而刘玉堤却领会“起飞时推驾驶杆要用 50 公斤的力量,相当于一只手提一桶水的力量”。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场面发生了:

主任教官系川带刘玉堤做感觉飞行,按求是教官操纵学员感觉,而刘玉堤起飞时使劲的推着杆,机尾抬的比机头高得多,飞机象野牛一样,嗷嗷地吼叫着向前猛冲,系川向后狠拉驾驶杆,刘玉堤还以为是生病后力量不够,更加用力地推,眼看飞机要冲出跑道撞到机窝上,系川咬紧牙关两手一起向后拉杆,飞机终于离地了。教官很生气,空域也不飞了,返场落地。滑回停机坪,教官刚站起来准备跨出座舱,刘玉堤关车加油门过猛,把教官从机翼上吹掉在洋灰地上,摔的好长时间爬不起来。这下可把系川惹火了,后声地说:“这个学员动作太粗,不能飞!”

后来,刘玉堤编到我们小组,木暮教官单独给他“开

小灶”，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手把手地教，一有空就领着他到机场的草坪上面对面坐着，用一根棍子比划着作示范，刘玉堤一面观察教官的动作，一面琢磨用的力气大小，然后，教官把住杆让刘玉堤拉，看他用的力气是否合适。有时，木暮把头一歪，表示方向偏了，刘玉堤赶紧蹬舵修正，有时是教官故意把动作做错，让学员改正。通过地面勤学苦练，刘玉堤操纵动作的准确性有了很大提高。

空中带飞时，木暮针对刘玉堤开飞晚的特点，态度十分耐心，每次做示范动作前都亲切交代：“你看着，我来做！”然后亲自操纵一两遍，再微笑着对刘说：“好！你来做。”这时，他在后面把关，杆拉多了，他挡一点；拉得少了，他帮一把，每次做完，他总是以鼓励的目光笑着说：“这次很好！”然后再心平气和地指出刘玉堤飞行动作的缺点，提出改正的方法。为了克服刘玉堤用力大、动作粗的毛病，木暮对操纵要领要求十分严格，如起飞怎样加油门、推杆、保持方向；到多大速度该干什么，第一转弯该做什么动作。转弯时怎样看针球仪等等，要求记得一清二楚。在飞空域时，那怕是一个细小的动作做错了，也要重来。转弯速度大了或小了，盘旋中高度升高了或降低了，木暮会立即纠正：“不行，再来一次”。就这样，使刘玉堤较好地克服了动作粗猛的缺点，赶上了拉下一个多月的训练进度，在1947年的晚秋，顺利地放了单飞。

我自己在最初的训练阶段一直很顺利，可是在飞了近两个月，进行着陆动作训练时，遇到“拦路虎”，被一个技术难点卡住了，每次到1米平飞的阶段，总是判断不准一米的高度，飞机下沉和拉杆的动作配合不好，不是拉

高,就是拉低,还出现过危险动作,几次危险动作之后,形成了条件反射,每逢一米平飞的时候,心里就发慌,越紧张信心越小。这时有人认为,看不准1米平飞高度,可能是眼睛不好,经医生督促反复去医院检查3次,结论眼力很好。

木暮教官虽然是优秀的飞行员,但毕竟是第一次当飞行教官,缺乏教学经验。为了对症下药,克服技术难点,他请黑田、系川等经验丰富的教官给我“会诊”,他们和我飞了几个起落,只是在飞行诸元(即数据)保持不好上找原因,还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我对自己的技术难点克服不了,十分焦急,非常难过,我想我们同样在学飞行,为什么我就比别人差呢?

一天晚上,另人都睡着了,我还躺在床上,心里活象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脑袋里嗡嗡直叫,翻来复去地睡不着。

“我难道真的不能成为一个飞行员吗?”我反复问自己。

“他们能学会,我为什么就学不会呢?”我又这样想。

“我一定要学会飞行,为被害的战友报仇,为教导员报仇,否则我对不起党的培养,对不起牺牲在敌机炮弹下的同志!”

那天晚上,我一宿也没睡好觉,可是从那天起,我的劲头反而更大了,决心反而更强了,我时刻想着:“我要赶上去!”

木暮教官因为我的技术难点克服不了,急的团团转,背着人偷偷地流眼泪。最后,只得请主任教官林弥一郎亲

自检查了,林弥一郎和我飞了两个起落之后,就发现我的坐姿不正,叫我直起腰杆子又飞了两个起落。天哪!真是一句值千金哪!1米平飞的高度看清楚了,只是拉杆的动作还有些粗猛。

飞行后讲评,林弥一郎耐心地说了两条:看不清1米平飞高度的“病根”在于视线焦点的距离看的过近,造成相对的地面流速过大。把视线的焦点前移到50米左右的距离上,相对的地面流速自然感觉减小,1米平飞的高度就容易判断了。另外,仅仅看清1米平飞的高度还不够,拉杆的动作必须柔和,就像姑娘绣花一样的轻。为了防止拉杆动作过猛,可以用向上拔杆的办法拉杆,形成向后的合力,可以防止拉高、拉飘。

1947年7月,“东北老航校”飞行教官训练班毕业,吴恺、张华、于飞到一期乙班当飞行教官,木暮调到领航班当飞行员教官,我们组的飞行教官改为吴恺。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我落地的要领不知不觉地掌握了。动作粗猛的缺点也不自觉地改正了。

林弥一郎又要检查我的飞行技术了,这次是放单飞之前的考试。我这是第二次和他一起飞行。他上一次耐心的态度和丰富的经验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谁知这次考试飞行中,他却不断地给我“出难题”,故意制造一些意外的紧张情况。第一个起落飞到第三转弯之前,他把发动机的油门收到最小,要我飞回机场迫降,我按照迫降的要领,把飞机飞到了机场,到50米高度,他又叫我复飞,我又按要求把飞机拉了起来,再次构成起落航线准备进入着陆。林弥一郎说:“襟翼故障。放不下来了!”我只能按

不带襟翼的落地操纵,有意识地修正了目测下滑的角度、调整了落地的速度。飞机在“T”字布的侧方,顺利地落了地。以后,又飞了两个起落,都很正常,我想放单飞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林弥一郎对我放单飞的考试成绩是满意的,但当天没有马上放单飞,他要求本组教官再带飞两个飞行日,巩固一下飞行技术再放单飞。当时,我还有点急躁情绪,事后看这实在是高明的措施。

9月28日,我放单飞的那天。木暮教官还专程到海浪机场去祝贺。当我贺驶的飞机在“T”字布旁以标准的轻三点落地后,木暮教官紧紧地用双臂将我拥抱,吴恺教官热烈地握紧我的双手,祝贺我放单飞成功。从这时起,我成了正式的飞行员。现在回想起来,多亏了木暮教官的耐心指教,给我的飞行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组的4个人全都顺利地放了单飞,成为人民空军出色的飞行员。数年后,王洪智在1950年5月支援进军西藏的空投任务中,驾驶C-46运输机试飞甘孜航线成功,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荣获“空军模范飞行员”荣誉称号;刘玉堤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击落敌机5架,击伤4架,荣立特等功、一等功各一次,荣获“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林虎在国土防空作战时担任师长,曾指挥我机在东南沿海一次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2架、击伤1架,以3:0的战绩,荣立二等功一次;我自己在抗美援朝作战中,率领轰炸机大队对美李情报机构盘踞的大、小和岛实施轰炸,彻底摧毁了目标,圆满完成了任务,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这些成绩的取得,除其他因素外,也有木暮教官

一份心血。

木暮重雄，1921年出生在日本群馬县。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初期，他在日军驻南京的第三飞行军团司令部当新兵，后被选送到日本航校学习飞行，1943年9月毕业。曾在南京机场进行97式战斗机的编队飞机和射击等驾驶技术和战术训练的集训。后任日军在华北空军特别攻击大队的战斗机飞行员。1945年1月15日，在驾机执行任务途中，因飞机故障迫降于抗日根据地山东省泗水县县城南郊，被八路军俘虏，参加“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后被收编留用。曾任“东北老航校”飞行教官、主任飞行教官和空军第七航空学校飞行教官。他先后在“东北老航校”和空军第七航空学校工作了13年，使一批批中国的年轻人飞上了蓝天。1953年按照中日两国政府的协定，在侵华战争中来中国的日本人都要遣返回日本国。但木暮要求留一段，为新中国航空事业再作新的贡献。一直拖到1958年才离开他热爱的第二故乡，回到日本国。因为他是从中国大陆返回日本的，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多年，所以找工作很困难。无奈，到岳父家，改名筒井重雄，在长野县下伊那郡上乡町的乡村中开荒种地，靠经营果园为生。他的妻子儿女是先于他从中国解放区回去的，也和木暮一起从事农事劳动，是一个不富裕的农民家庭。但他们积极参加日中友好工作。每次开会，他们自带干粮，往返数百里，从不缺席。在抵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抗议日本右翼势力制造的“教科书”事件中，他们集会上街游行，表示强烈抗议。这些为正义、为和平而战的朋友在新的环境下继续为和平事业而奋斗。

木暮凭着自己的勤劳正直,改善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很快受到乡亲们的信任,他被选为自治会会长、公害对策协会会长、自治防灾会会长、青少年健全育成会干事等职,得到过6面奖状。因为他曾在中国山东生活过,会说一口地道的山东话,还会包地地道道的山东饺子,味道也是地道的山东味,所以他自豪地夸口说自己是“山东人”,还在自己家里为周围的乡亲邻里免费开办“包饺子训练班”,推广中国的饮食文化。当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说:“我是在中国走向新生之路,这都是按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学习了‘为人民服务’的结果。”

几十年过去了,我和许多在我军第一所航校学习过的飞行员都未忘记我们的老飞行教官、比翼齐飞的战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木暮重雄(筒井重雄),我们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为中日友好,为世界和平正义事业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援越顾问团工作琐忆

张 德 群

1952年7月,中组部干部处处长帅孟奇大姐找我谈话,决定派我去援越顾问团任整党顾问组组长,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工作。

当时,这项工作是由中联部主管的。我报到后,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同志即找我谈话。他说:支援越南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抗美援朝一样光荣。援越人员的待遇同抗美援朝人员一样。现在越南虽然正在进行抗法斗争,战火不断,但他们的中央机关能在越北住两三个月不移动。你们去那里工作,主要是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提出建议,供他们参考,但不要指手划脚,强加于人。我们是兄弟党的关系,这是同国内工作不同的地方,要特别注意。

分管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工作的一处向我交待工作任务后,我们一行六人于这年的8月到达驻越南北山附近的顾问团驻地。当时顾问团人员就住在山上的松林里,住处都是搭的竹楼。这既可防敌机轰炸,又能防潮湿。顾问团团长是罗贵波同志。顾问团下设办公室、军事顾问组、财经组、公安组、文教组、统战组、整党组等,共有干部百余人,大部分住在越方相应的工作单位。

1944年底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西、云南后,强

占越南的法国殖民军加强了越南同中国接壤地区的谅山、高平、老街等据点的控制，企图隔断越南同中国的联系。次年春，胡志明主席同陈赓同志商定，将越南一部分游击队集中编为两个师，由中国的两个师帮助他们训练，采用官教官、兵教兵的方法，教他们怎样打运动战、歼灭战、攻坚战，怎样使用各种武器。两个月后，我们将两个师的武器，装备他们的两个师，并派韦国清同志率百余名军事干部帮助这两个师。经双方商定，先打边界战役，使中国和越南联成一片。1950年9月6日，越军开始围歼东溪、谅山之敌，然后奔袭高平。15日战斗结束，共歼敌3000余人，拔除敌据点13个，给河内的敌人很大震动。但越军干部，旧军人多，工农少，不能带头冲，结果由中国干部带着冲，伤二十余人，我方干部反应较大。有的同志表示如果牺牲了，希望将他们的尸体运回中国。毛主席听说后讲：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援越人员同抗美援朝人员一样光荣。于是军事顾问先帮助越方进行整军，主要是整顿干部的思想作风，其次才是训练各种战术。

战争形势的发展，急需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来予以支援。1951年初，应越南劳动党中央的要求，我党中央派罗贵波同志带一些干部成立了政治顾问团。经顾问团建议和越方同意，在顾问团下面先建立了财经组，帮助越方财经部研究制定征粮法、税收法和财务制度。目的是既要保证供给，又要减轻人民负担，因此，强调必须长期打算，增产节约。其次是建立公安组，介绍我国的公安工作方针，帮助越方公安部制定除奸政策，建议他们采用镇压与宽

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除奸政策。主要打击对象是敌特和反动的越奸。办法是走群众路线,不搞逼供信;注意划清敌特和到敌区经商者,更不要随便抓小商小贩,讯问拷打。接着建立了统战组,帮助越方研究制定统战政策,以团结争取一切抗法力量,吸收各党派及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开明人士,巩固和扩大越联战线。同时还成立西北民族自治区,培养提拔少数民族干部。继之又建立文教组,帮助他们办报,组建通讯社,恢复和成立各级学校。最后又成立了整党土改组。1952年春,和平战役之后,因韦国清同志回国养病,军事顾问团与政治顾问团合并,统一由罗贵波同志负责。

1952年,胡志明主席提出整党、整军和开展群众运动,以提高干部党员的水平,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争取抗法战争的胜利。决定中央和联区开办党员训练班。上半年越党中央开办了第一期党训班,学员都是省级以上干部。由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党中央组织部长黎文良任党训班主任,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阮章任副主任。后者曾在1948年经香港到西柏坡找我党中央,并在我中央党校学习一年。顾问团派人讲两门课,一是形势任务和各项政策,二是党的建设。胡主席对训练班特别关心,经常去讲话。

1953年春节,胡志明主席派人接我和马广基去吃饭。他问了党训班的情况,听了我们的汇报,他非常高兴,说这是整党的关键,下一次还要办,人数可多些。今后秋天开始减租减息,然后进行土改,那时就不能再办了,都得去搞群众运动。吃饭很简单,一个炒空心菜,一个炒鸡蛋,

一碗鸡汤。后两个菜是为我们添的。胡主席平时喜欢吃空心菜,鸡蛋汤。他生活朴素,土布衣,抗战鞋,粗布蚊帐。他自己打字,起草文件。他经常到群众中访问,看望战士,平易近人。他的汉语讲得很好,我们谈得很随和,很亲切。其他越南领导人对我们也很关心,很重视顾问团的工作。长征、武元甲、黄国越等都曾到顾问团看望过我们,并一起合影。范文同总理还请我们会餐,并观看了文艺演出。

春节后我们又回到了训练班。这期参加的人更多,包括越南南部的干部,共 123 人。为了开展群众运动,进行减租土改,我们介绍了中国的经验,他们进行了学习讨论。看来越南干部没有这方面经验,训练群运干部是个很大问题。

1953 年春,越党中央决定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进行土改,并指定由政治局委员黄国越负责,中央委员胡曰胜协助。国内又派来一些同志组成土改整党顾问组,由我任组长。经过宣传动员,诉苦,对个别越奸恶霸进行斗争,将没收的财产和土地,分配给了贫苦农民。接着建立农救会、青救会、妇联和自卫队,改选了村乡政府。最后还提拔了一些干部,发展了一些党员。农民觉悟很快提高。这给越方干部上了很好的一课。他们以前不了解农村阶级状况,更不懂怎样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减租减息。看来应动员大批干部到农村参加减租土改,这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我党中央又从华北、华东、中南各大区调来县以上的土改顾问 42 人,进一步训练越方干部,开展减租运动。

在此基础上,于同年 12 月召开了越南第三届国会,通过土地改革法,提出土改路线: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

联合富农，逐步和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促进抗战。根据中国的经验，注意保护工商业和小土地出租者，对民主人士予以适当照顾，对地主家庭出身的干部应回避。各联区在减租的基础上进行土改试验。各级武装部队，为保护群众运动，积极向敌占区开展活动，主动打击敌人，使土改运动得到迅速发展。

1954年春，韦国清同志同胡主席商定，要发动春季攻势，以解决西北莱州周围的敌人，使越中老可连成一片。自4月初开始，越军于十天之内攻克莱州等九个据点，歼敌2000余人。法军被迫集中印支主力1.7万余人来增援，并抢占了奠边府周围据点。这些均是法军过去的老据点，全系钢筋水泥工事。周围是山，中间是小平原，奠边府在平原内。越军先攻克周围山上的小据点，但大据点仍在敌人手中。敌人在我炮火控制之下，供应靠空投，我们一时难以攻克。这时，是攻还是撤，出现争论。最后还是中方顾问韦国清力排众议，主张坚决进攻，力争全歼法军。于是立即将在中国装备训练的炮兵师调来。先在夜间偷袭敌飞机场成功，使敌无法逃走；然后炮击敌工事，再发起进攻，全部消灭了法国的精锐部队。5月7日战斗胜利结束。经过这次战役后，法国内阁垮台。孟代斯·弗朗斯上台后，同意与越方在日内瓦谈判。越方提出法国撤军，实行普选。这时法国想脱身，而美国却极力阻挠，谈判直到6月16日仍无法进展。乘休会期间，周总理于7月3日到柳州同胡主席商谈。周总理说：目前印支战争对我们有利，但发展下去，美国可能插手，不如在谈判中作些让步，达成和平协议。总理提出柬、老同越分开，越可提出南北分

治的方案。胡主席表示同意,从而打开了谈判僵局,于7月20日达成协议并签字。美未签字,但表示不使用武力阻挠。这成为越南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日内瓦协议之后,越方准备接收法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顾问团也组成接收小组,由军事、公安、财经、文教等各有关组派人参加。在接收步骤上,决定先原封不动地接过来。然后再分别情况,逐步处理,以防止敌人破坏。当时我在太原进行土改试点。根据新情况,要各联区开始进行土改试点,总结,训练干部,准备在越南北部地区全面开展土改运动。

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支和平,越南革命进入新的时期。越党中央提出了两项任务:建设社会主义的北方,争取解放南方,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奋斗。胡主席提出必须迅速地把北方建设成为全国坚强的革命根据地。1955年11月1日,胡志明主席、越党中央和政府重新回到首都河内。

中方援越顾问团也随之迁到河内。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河内正式建立了驻越大使馆,罗贵波受任为我国驻越南首任大使。国内则另派方毅、乔晓光担任顾问团的正、副团长,由方毅和乔晓夫分别负责经济建设和土改整党的顾问事务。还随之建立了工作组,由曹春耕任组长,我仍任土改整党顾问组长,直到1955年10月中越两党商定除中方派出的经济建设顾问外,其他中方顾问一律撤回中国时,我才卸掉这一职务奉调回国。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围绕三民主义的一场论战

郑德荣 董世明

抗战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围绕着三民主义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论战。这场论战对抗战和整个中国革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战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39—1940年前后，是国共两党论战的第一个高潮。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1905年提出来的指导革命的理论体系。1924年，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三民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使其成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政治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1937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递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明确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在日寇进逼，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下，国民党决定联共抗日。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蒋介石既想利用中共的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又想借机削弱甚至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这就为后来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斗争埋下了伏笔。蒋介石在思想战线上向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限制中共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三民主义。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说：“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为无可动摇、无可移易者。”“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今日中国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此，蒋介石用三民主义限制中国共产党的企图已有所表露。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1938年底，抗日根据地遍及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近20万人。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恐慌。与此同时，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日本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停止了战略性进攻，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把军事进攻的重点转向敌后解放区战场。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也遂发生变化，政策的重点由对外抗日逐步转向对内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并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会议强调，“今后本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①会后，国民党又陆续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反动法规，否认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存在；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和革命组织。与此同时，国民党控制的报刊，如《三民主义半月刊》、《中央周刊》、

^①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54页。

《抗战与文化》、《时代思潮》等，刊登了大量的反共文章；国民党还出版了许多小册子，进行反共宣传。在这一片反共叫嚣声中，共产党的叛徒、国民党反动文人叶青充当了反共急先锋。他以研究三民主义为名，纠集一些反动文人发起“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出版刊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抗战底根本问题》、《中国底现阶段及其将来》、《中国共产党底分析》、《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与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三民主义的创造性》、《中国只需要三民主义不需要别的主义》等。他们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曲解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企图以假三民主义来代替共产主义，消灭共产党。1939年5月，蒋介石亲自出马，在中共训练团党政班作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自己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披上了三民主义的外衣，并主张用这种假三民主义来溶化共产党。这样，国民党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向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猖狂的进攻。

国民党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攻，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深思与警觉，立即进行了坚决的回击。1939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指出，“我们对磨擦如逆来顺受，则将来磨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故我应以冷静而严正之态度对之。”^①同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中，明确提出了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认为“国难已至极严重关头，必须广泛的动员全国同胞，切切实实的实行三民主义，揭穿汉奸汪精卫辈的假三民主义，为具体实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三民主义而斗争。”^②5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进一步要求全党：“力争以革命的言行相符的真正三民主义去对抗曲解的与言不顾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册，第12页。

^② 同上，第59—60页。

行的假三民主义，以真正三民主义的姿态，去反对假三民主义者，即顽固分子。”^① 6月，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所谓‘分歧错离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② 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董必武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戳穿了假三民主义的面纱，有力地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谬论。国共两党的论战进入高潮。

在同国民党论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总方针，“是多方揭破其反动宣传，更加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更加提高人民的觉悟程度，更加争取广大的同盟军，以便坚持抗战到底，达到抗战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胜利。”^③ 对国民党进行宣传战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坚持抗日第一与抗战到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新民主主义政治，坚持真正的三民主义，多方揭露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阴谋，及其违反三民主义的言论行为，以推动国民党进步分子，争取其中间分子，孤立其反动分子。另一方面，争取广大同情者和同盟军，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和一党专制主义。

第二阶段，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两党的论战进入一个新的高潮。这次高潮是第一次论战高潮的继续，是国共两党之间长期存在的各种矛盾的又一次爆发，也是国共两党、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又一次较量。

1939年前后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向中国共产党发动的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71—72页。

② 同上，第113页。

③ 《中央宣传部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进攻被击退之后,它并没有就此止步,相反,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不断提高,它更加仇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伺机向中共发动新的进攻。

1943年初,蒋介石抛出了反动的小册子《中国之命运》。这本小册子是陶希圣秉承蒋介石的意旨炮制的,于1943年3月10日公开出版。它是蒋介石打着三民主义旗号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作。这本书出版后,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进行吹捧,几个月内,在国统区强行推销了几十万册。

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国民党蒋介石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在政治思想领域又掀起一次大规模的反共浪潮。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正论出版社、统一出版社、《中央周刊》、《时代青年》、《党义研究》等,出版和发表了许多反共书籍、文章;反动文人、政客、托派分子如叶青等都跳了出来,为蒋介石呐喊助威;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志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以及散布在各地的特务,还假冒“文化团体”、“民意机关”等的名义,召开会议,发表演讲、通电,进行反共宣传,甚至公然叫喊解散中国共产党。霎时,反共气焰甚嚣尘上。

国民党掀起的这股反共浪潮引起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中国共产党坚持针锋相对的原则,对国民党的谬论进行批判。1943年3月12日,即《中国之命运》出版后的第3天,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以《孙中山先生逝世十八周年纪念》为题的社论,批判国民党的反共谬论。5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的负责同志写文章,批判国民党的反动宣传。7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发出《关于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的通知》,指出,“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迫我就范。同时发动宣传攻击,以造成反共舆论。

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①《通知》要求各地响应中央的号召,动员舆论,召集群众会议,向国民党进行反击。这一时期,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重要社论,如《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国民党与民族主义》等。中国共产党人还发表了大量文章,如毛泽东的《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周恩来的《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主义的愚民哲学》等。解放区掀起了批判国民党蒋介石的高潮。

论战的主要问题

1、关于坚持三民主义的问题。

由于三民主义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所以,蒋介石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实行一党专政,反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蒋介石一方面主张“建国大业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理”^②,另一方面又背离国民党“一大”宣言的精神,曲解三民主义。1938年,《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在民族主义方面,“从前国内之人道主义者多抱世界主义之理想,社会主义者又往往信仰国际主义”,使“思想为之混乱,意志为之散漫,情绪为之薄弱,其团结因以不能坚固,行动因以不能统一,外侮一至,内溃之象,立时呈现。历史上亡国之祸,胥由于此也”。因此,在此抗战之际,应该放弃国际主义,坚持民族主义,“以发扬民族固有之道德,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71页。

^②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66页。

恢复民族之自信力。”^① 这样,《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把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解释的民族主义中的反帝内容,同国际主义对立起来,目的是反对共产党人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在民权主义方面,《宣言》在强调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为“增进民权之必要条件”的同时,着重指出,“组织训练必当有厘然之系统”,“政治之自由,尤当存在于不妨害国体、政体之范围内。至于革命期间,则政治之统一,较政治之自由为急”,因此,必须“授权政府,俾得集中人民之力量,统一人民之言论与行动,以同赴于国家至上之目的”^②。要求各政党“相约为政治休战”,“阶级斗争更不容许其发生”^③。这就是说,必须把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发展民力,增进民权,都要纳入国民党的系统,只能限制在不妨害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范围内。显然,这同国民党“一大”宣言”所申明的“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的主张大相径庭。从国民党三民主义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国民党此时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实质是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政,各阶级各政党,都要放弃自身的利益,服从国民党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国民党蒋介石就是企图用这种“三民主义”来限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力量的发展。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多次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三民主义,“服从中央”,放弃自己的思想体系,否则,则以违背“国家民族利益”论处。

中国共产党人驳斥了国民党的主张。首先,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三民主义有真假的区别,我们拥护真三民主义,“力争以革命的言行相符的真正三民主义去对抗曲解的与言不顾行的假三民主

①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67页。

② 同上,第468页。

③ 同上,第471页。

义,以真三民主义的姿态,去反对假三民主义者,即顽固分子。”^①所谓真三民主义,就是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所解释的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这种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呢?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②这种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只有实行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③其他的“三民主义”都是假三民主义,我们都不能赞成。其次,针对国民党宣传的抗战时期各政党要放弃本阶级的利益,不许进行阶级斗争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阐明了抗战时期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中,一切服从抗日利益是总原则,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民族斗争的利益与要求,而决不应相违背。“但同时,在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阶级斗争不能消灭,也无法消灭,企图根本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歪曲的理论。”^④因此,应该“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

① 《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71—7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9页。

③ 同上,第693页。

④ 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47页。

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①。

2、关于中国革命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能否用三民主义取代共产主义的问题。

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论战的一个核心问题。国民党蒋介石以国共建立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赞成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国共合作的政治纲领为借口，叫嚷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完备”，要用三民主义代替共产主义。蒋介石说，共产主义的内容很不完备，“重视经济，近于民生主义，却不重视民族和民权主义，而且共产党倡导民生，亦只重视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不兼顾全民的利益。”“三民主义则不然，它以‘公’字为出发点，所以能涵盖一切，把各方面皆行均衡顾到，无丝毫偏颇之弊。”^②叶青则公开叫喊，“中国除了需要三民主义以外，不需要任何主义”，要求“用三民主义去统一全国人底思想”^③。他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了分析，认为二者是相同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不相同。“既然相同，则共产主义便失掉它底特殊性，没有存在底必要了。那为什么不把共产主义收起，而索性主张三民主义呢？”^④

对于国民党的攻击，中国共产党人指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因为它是在革命斗争中产生的科学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为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9页。

②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9页。

③ 叶青：《与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738页。

④ 叶青：《中国只需要三民主义不需要别的主义》，《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9页。

众要得到解放,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指导作用是其他任何理论无法取代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所要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合理的社会。因此,“共产党员相信共产主义,是具有崇高理想而且有科学的根据”的^①。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革命最合理的。”“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因此,共产主义“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②毛泽东还批驳了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的谬论,指出:“‘一个主义’也不通。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现在封建阶级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有一个共产主义呢?”^③

中国共产党人还针对国民党鼓吹的中共既然拥护三民主义,就应该放弃共产主义的观点,指出,拥护三民主义和坚持共产主义并不矛盾。王稼祥指出,共产党的全部纲领有两部分,第一,为最高限度的纲领,即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求得阶级彻底解放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纲领;第二,是当前的纲领,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又称之为最低纲领。“三民主义是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中的纲领,三民主义当作纲领与马列主义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共产党的最低限度纲领)在其主要的基本的口号与要求上没有冲突,而是一般的一致,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的马列主义者认为实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需,认为三民主义是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共同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正因为

① 董必武:《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解放周刊》第1卷,第6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6页。

③ 同上,第686、687页。

如此，所以号召全中国人民为实现三民主义共和国而奋斗。”^①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主张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相同，可以用三民主义代替共产主义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有着许多重要区别，彼此不能随意混淆。第一，以民主革命阶段上的一部纲领上看，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第二，从革命阶段上来看，共产主义在民主革命阶级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最高纲领。三民主义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因此它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第三，从宇宙观来看，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第四，从革命的彻底性来看，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即有革命的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没有革命彻底性。“由于这些不同，共产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之间就有了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只看见统一方面，不看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错误的。”^②因此，不能把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混淆，更不能用三民主义代替共产主义。

3、关于取消共产党、八路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国民党顽固派主张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认为中共建立自己的组织、政权和军队是搞“封建割据”，妨碍国家“统一”，要求取消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政府，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张君勱向毛泽东写信，公开提出：“各国之政党，从无有占领一特区以行特殊政策者，以一国之内惟有一种法律，一种行政系统，

^① 王稼祥：《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第201—20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8页。

乃能成为现代国家。……今吾国号为统一。先生等亦以拥护国民政府自号于国中，而今则特区之内，俨然自成一天地，自立官制，自立税制，自立学校。若国中凡组织政党者，皆起而效法先生等之所为，则中国将分为若干政党之若干行政区，而国家非反于封建割据之局不止矣。……望取消特区之制，以增进全国之团结而利于抗战之持久者”^①。国民党颁布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则明确规定：“共党今后一切设施与行动必须合乎国家统一与独立为唯一原则。”“陕甘宁边区政府之非法组织，非但破坏国家之统一与行政体制，实为分散力量妨碍抗战之最大障碍，绝对不能令其存在。”“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及冀中、冀南两主任公署与国家整个行政体制不合，应遵令撤消”，“十八集团军所设立之所谓晋察绥军区及其分区，应即撤消。”

中国共产党人列举了大量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1943年9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国民党与民族主义》，指出，“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担当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就有反帝反封建的政纲。”“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早已结成血肉相联的关系，有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就可以保证不至于灭亡。”^② 中国共产党是取消不得的。“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③ 其次，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中国抗日的重要基地，也是全中国政权建设的楷模，是不能取消的。毛泽东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全中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

① 张君勱：《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第10期。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574—575页。

③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1943年8月25日《解放日报》社论。

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搏，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了，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① 再次，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力量，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只能有损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有损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1943年8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两篇文章：《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和《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用大量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抗日的中坚力量，是不能取消的。文章指出，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日军共36个师团60万人的58%（35万人），国民党仅仅抗击42%（25万人）。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伪军62万人的90%以上（56万人），国民党仅仅牵制伪军不足10%。“事实胜于雄辩。不是‘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假如没有共产党抗击如此大数目的敌伪军，不但中国亡了，就连国民党也早已亡了”^②。因此，毛泽东指出，“不是取消边区，而是全国要学习边区；不是取消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全国要学习八路军、新四军；不是取消共产党，而是全国要学习共产党；不是要进步的人们向落后的人们看齐；而是要落后的人们向进步的人们看齐。”^③ 国民党顽固派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敌后抗日根据地，攻击八路军、新四军，就是“要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消灭，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灭，以便统一于国民党。这是阴谋，这是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④

4、关于文化统一的问题。

在国共两党论战的过程中，国民党顽固派在文化问题上也向中共发起了挑战。叶青发表《与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认为，“三民主义文化是又简单又明了又富有内容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实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18页。

② 《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1943年8月24日《解放日报》。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18页。

④ 同上，第719页。

在空洞抽象，没有内容”，中国的文化只能是三民主义的文化，而不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必须“由中国国民党领导”；要用三民主义文化去统一“全国人底思想”，这是“中国之整个民族的文化统一主义”，谁要是不相信三民主义文化，“谁就是自外于中国。其人也便不想当中国人了。”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社论《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认为“中国只有促成政治统一的文化，没有助长封建割据的文化”。“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都在于政治统一的时期”，主张统一中国的文化。显然，国民党主张“文化统一”的实质，就是要把中共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统一”到国民党的文化中去，把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政权和军队都“统一”到国民党中去。

关于文化问题，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① 我们所要建立的新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立的新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因此，要建立的新文化不能是别的文化，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以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范文澜指出，“谈文化，既指出它的统一性，更必需着重地指出它的斗争性，同时必需指出它的进步性正义性或倒退性反动性。谈统一，更必需区别革命性正义性的统一或倒退性反动性的统一。”我们主张的是革命的正义的统一，反对倒退的反动的统一。“任何企图以反民主的法西斯化的封建专制或半封建专制来实行强迫统一的人，无论他暂时怎样拥有中央的政权军权财权，仿佛不可一世，其封建统一的结果都不免流为封建割据，都不免因受到全国人民的反抗而败亡。”共产党创立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以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主张民主和自由，“当其统治力量限于一地区时，这个地区称为革命根据地，扩大及于全国时则称为革命的民主的统一。”这才是我们所要实现的统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64页。

—①。

通过这场论战，中国共产党人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教育了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① 范文澜：《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1943年7月10日《解放日报》。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 在香港的财经工作

高 宏 的

解放战争时期,港英当局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活动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南党组织及时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通过秘密、半公开和全公开的方式,卓有成效地在香港开展了财经工作。

一、建立健全财经工作机构,制定财经工作方针

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广东党组织在香港和南洋等地设立了一些工商机构,开创了香港财经工作;1946年1月,又设立了东江纵队驻香港办事处,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担负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1946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南京局的指示,广东党组织在香港成立了半公开的港粤工委,下设文化、宣传、统战、外交和财经等专门工作小组,大力开展中共在香港的公开和半公开工作,其中包括财政经济工作。

从1946年秋至1947年夏,大批专门人才和领导干部从上海撤退到香港,加强了中共在香港的领导力量。经中央批准,1947年5月,成立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6月,港粤工委改称香港工委,原工委各小组改成委员会,健全了工委组织,扩大了工作范围;工委由章汉夫任书记,隶属香港分局;工委常委,经济学家许涤新担任工委的财经委书记。财经委下分业务组和研究组,以后又成立了统战小组。

业务组主要从事工业、贸易、运输、银行等方面的务实工作;研

究组专门从事财经资料的收集、研究及宣传工作；统战小组的主要工作是团结和争取工商界的朋友。

与此同时，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提出了“稳健、分散发展经济”的方针，并把开展财经工作，当做华南党组织的一项长期的重要的工作。根据这一方针，财经委担负全华南财经工作的指导责任，同时大力发展其下属机构的财经工作；另一方面，广东区党委及香港工委下属的统战委员会和情报等工作部门也可以继续发展各自的工商事业，开展多渠道的财经工作。而后，粤桂边和粤赣湘边区等党组织还在香港设立了后勤部（处），专事贸易及物资供应工作。1949年春，根据分局指示，华南各游击区成立了区党委财经委和地委财经小组，香港工委财经委改为分局财经委，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华南财经工作的领导。

此外，财经委在业务上继续领导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利用该机构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经济战线上的宣传、统战和情报工作。

二、开展多方位的财经工作

其一，积极从事工商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香港一派萧条，经济复苏缓慢，社会购买力很低，商业信息也不畅通；财经委在此时开展工商活动又苦于无资金，处于步履维艰的地步。方方与许涤新研究后，决定先利用安达公司的资金和关系，从小本生意做起。1947年初，方方又与广东区党委书记尹林平商议，决定将东江纵队做生意的资本（其中半数以上为工厂和商店等不动产，如启源行等）和中央拨给东纵北撤存下的经费共17万港元调给财经委使用。

安达公司是抗战后期在重庆由几名华侨党员创建的，其总部设在越南的河内。1946年安达公司迁入香港。经过公司全体人员的努力，他们不但在香港站稳了脚，度过了困难时期，而且还使业务有了新的发展。以后，该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并入总公司，在暹罗（今泰国）的曼谷和越南的河内等地建立了分公司，其办事机构遍布东南亚，形成了跨国公司。1947年下半年，以安达公司的影业

部为基础，成立了南方影业公司；1948年，又以其侨汇部为基础，成立了南洋商业银行。

至1947年年底，财经委的工商活动已净盈利16万港元，其它各部门大多能做到还本后略有盈余，并为尔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48年春，启源行在做大米生意时，被骗损失64.225万港元。尽管该年度财经委各部门大多盈利，但盈亏相抵，仍亏9178.20港元。面对如此重大的工作失误，方方与许涤新一方面多次电告中央，主动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他们与其他财经干部一道总结教训。经方方建议，启源行改做房地产生意。到1949年，该商行就已获得相当可观的盈利。

经过两年半的苦心经营，至1949年春止，财经委不但发展了安达公司、启源贸易商行和新侨公司（原联侨公司），而且还建立了东台运输公司、新联公怀、南洋商业银行及南方影业公司等一批骨干企业；经营项目从粮食、食盐、药品、五金、钨砂、橡胶、纺织、皮革、电器、汽水等，发展到运输、船务、金融、影业、房地产等；贸易范围从香港、东南亚扩大到国统区、华南游击区和北方解放区，甚至到北美及北欧等地。

其二，大力开展经济宣传工作

财经委于1947年1月创办了《经济导报》。该刊物通过宣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披露国民党发动内战及国统区经济和金融崩溃的事实，戳穿国民党在香港工商界从事的破坏活动及阴谋，报导香港、东南亚、内地及世界各大国的经济动态，沟通各地经济信息，发表经济理论研究文章，争取与团结广大的工商界人士。

1947年春，方方同意许涤新的建议，趁香港各大报社增聘经济记者之际，派出一批干部到各大报刊，扩大经济宣传阵地。到1948年秋，从《经济导报》派出的采编人员基本上控制了香港各大报的经济版。这些干部多数要担负双重工作。特别是在右派和中派报刊工作的人员，既要在宣传上有所倾向，又要保持灰色面目。这些战斗在隐蔽战线中的宣传干部，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其三,广泛开展经济统战工作

中共在香港的经济统战工作,主要由《经济导报》的编辑、记者和秘密党员配合财经委统战小组,以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去进行的。其公开的主要形式是组织“工商俱乐部”、“香港工商界聚餐会”、“反扶日会”、“二周工商从业员座谈会”、“工商运动小组”、“潮州帮商界座谈会”、“中国经济事业协会”、“经济编辑聚餐会”、“香港经济记者联谊会”、“和平论坛社”等;秘密方式则由统战小组举办小型座谈会(又称学习会)或个别谈心。到1947年底,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由工商界的中下层转为中上层。

在上述经济统战工作中,成绩最为突出的是“工商俱乐部”。它由港菲出口商会主席兼泉昌公司经理黄长水出面负责。从1948年春开始,该俱乐部每周四晚聚餐一次,人数经常高达200人。聚餐时,大家漫谈国事与工商问题。香港工委领导章汉夫、许涤新,民主人士马寅初、胡愈之、侯德榜,上海到港工商人士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笄廷芳等著名人士都曾赴会演讲。发展到后来,连在港府中任职的工程师及大学教授也踊跃参加。从1948年底开始,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捷报频传,聚餐会经常变成欢庆胜利的祝捷会。每次《华商报》、《经济导报》的记者均参加,第二天香港各报就能刊出聚餐内容,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

统战小组十分重视在香港工商界三大社团(香港华商总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九龙总商会)中的统战工作,这是与国民党斗争的一个重要场所。1948年春,华商总会举行香港光复后的第一次改选,财经委利用各种渠道和方法支持进步的高卓雄一方,使其取得了该会的领导权。这一胜利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继续与华商总会保持联系打下了基础。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进展和解放区的不断扩大,解放军急需更多的军用物资,解放区恢复生产也需要大量的原料和设备,香港与解放区的贸易已势在必行。香港工委财经委一方面自身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通过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介绍解放区

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建设总方针,消除港商的顾虑,鼓励并推动他们到东北和山东解放区、以及北朝鲜开展贸易。平津解放后,黄长水和香港大成行经理陈祖沛,不信国民党散布的谣言,不惧怕他们的恫吓,率先开展港津易货贸易,进一步推动了香港与解放区的经济往来。

1948年夏,财经委争取了《大公报》主笔王芸生。他表示《大公报》今后要为共产党服务,同意每周给半个版面出《经济生活》副刊,完全由财经委负责。以后,王芸生经中共中央同意,进入解放区。

章乃器也于1946年冬将他的上川公司从上海搬到香港。在港期间,他的政治态度更为明朗,主动为上海来港的资本家接通与财经委的联系,并积极为解放军募捐、募药。1948年冬,章乃器更动员募集约3万余港元的药品全部送往华南各游击区。1949年夏,他最终决定将上川公司迁入解放区。

三、从财经上支持内地的武装斗争及党的其它工作

华南各地自1946年年底恢复武装斗争后,部队和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到1949年夏,仅部队人数就超过10万人。由于这些地方基本上是新区,又是游击区,经济来源十分有限,财政经常陷入困境。鉴于此,香港分局一方面强调各地要自力更生解决财经困难;另一方面,根据各地情况,每年不定期地数次在财政和物资等方面接济各地,每次接济款从两三千至数万港元不等,各地所需的电讯器材及医药用品等,绝大部分也由香港党的领导机关提供。分局还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在香港及东南亚等地的工商界和华侨中积极募集捐款、药品、衣物等,救济各地被摧残的群众和指战员。1948年春,仅在暹罗(泰国)华侨中,一次就募集到捐款暹币20余万元。同年底,在香港工商界中,也募集到了大量医药(折合港币3万余元)和寒衣(约合港币3万元)。

由于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当时香港分局、广东区党委、香港

工委、香港城委及这些机构的 10 余个下属业务部门，都集中于香港，每月开支甚巨。另外，上海局的钱瑛在香港指导西南各地工作，每月开支需 5000 港元；50 余名领导干部的子女在香港读书，每人每月需 20 港元。从 1948 年春开始，仅上述各项开支，每月就超过 4 万港元。郭沫若、彭泽民、千家驹等民主人士在港的生活费及省级干部在港家属的生活费等，每月也需七八千元。

为了支援印度支那人民的抗法斗争，中共中央还决定通过香港财经委不定期地提供经费给胡志明等越南同志。

以上各项开支，过去主要、甚至全部由中共中央提供。由于华南党组织积极开展了香港及南洋的财经工作，故而使香港分局能自行解决上述工作经费中的不足之数，从而减轻了中央的财政压力，在财政和物资上保证了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

此外，华南党组织还积极协助中央派来的钱之光和上海局的刘晓，为他们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及在香港拓展工商事业等提供种种便利条件。解放前后，中央和原中共上海局在港系统的经济业务均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四、培训财经干部，设立调研机构

1946 年 10 月，港粤工委与民主人士共同在香港创办了达德学院，致力培养各类干部。1947 年夏，在方方指示下，达德学院设立了经济系，开设金融、贸易等课程，大力培养财经干部。1948 年秋，方方又指示财经委筹办建中工商专科学校，专门培养华南地区从事接管工作的财经干部。1949 年 2 月，建中开学，设立了初、高级两个班，开设了工商管理、会计、统计、银行、财政及政治经济学等课程。2 月 23 日，达德学院被港英当局查封，随后该学院经济系的学生大多数转到建中。由于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过快，建中工商专科学校于 6 月提前结束，大多数学生立即转入粤东解放区。

建中虽然只办了 4 个月，但它培养的 2000 余名财经干部在接管两广大中城市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人担任财经部门的领导，有的还成了大学教师。

与此同时，华南各地区党委也积极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培养包括财经干部在内的各类人才。

财经委的研究组除开展经济宣传外，还担负收集经济情报及调查研究工作。这一工作主要集中于资料室，它的对外名称是“建华经济通讯社”，研究对象是香港、广州和上海的经济资料。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的不断溃败，从1947年秋天开始，大批官僚资本从内地转移到香港，研究组又将调研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国民党四大家族及地方实力派在港经济机构方面。

1948年夏，方方和许涤新研究后，将资料室分成6个小组，每组5至7人，分别研究财政税收、银行、侨汇和民信局、工矿管理、国际贸易及运输，以后又专门成立了广州小组。与此同时，香港城委及其它部门，分别成立调研机构，重点研究广州和桂林的资料。至解放时止，仅从事研究广州资料的干部就有53人，他们在上千件资料中共整理出105件材料，对接收广州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分局对大城市及国民党重要经济机构进行调研外，从1949年初开始，华南各地区党委，也组织专人对本区内的中小城市开展了调研工作。其中，粤中负责调研江门、高要（肇庆），粤桂边负责调研广州湾（湛江）、南宁，滇桂黔边负责调研昆明，琼崖负责调研海口、文昌，各地委负责调研本区内一两个中心县。

五、建立人民银行和物资局等机构，为迎接解放做好财政物资准备。

在人民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为挽救其崩溃命运而进行的各种币制改革均遭失败，特别是金圆券在发行7个月后就贬值到原币值的1%。在这种情况下，外币、特别是港币则趁机侵入中国大陆。1949年6月中旬，港币发行量达9亿元其中有6亿元在内地流通；8月，港币发行量猛增至13亿元，其中又有8亿元在内地流通，而华南就占了6亿元，占总数的88%。这种以金融方式进行的经济侵略，严重破坏游击根据地的经济生活，造成人民财产的重大损失，阻碍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同时也对解放后确立人民币的地

位及恢复生产设置了严重障碍。

为免遭重大经济损失,华南一些商人发行了本地区的流通钞票,一些部队也以商人面目发行纸币。这种做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任其发展下去,还会产生其它问题。为此,从1949年初开始,香港分局开始筹划建立分局及几个大战略区的银行,准备发行流通券和货币。就此问题,分局多次电请中央,并提出一些具体措施,以防出现严重工作偏差。4月8日,中央复电方方、许涤新,同意华南发行1000万元流通券,还同意“在需要增加时尚可酌量增加”,称赞他们提出的办法和措施均称妥善,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接此电后,分局抽调财经委的蔡馥生、赵元浩等人,着手建立华南人民银行(成立时称南方人民银行)。

考虑到华南各大区尚处于分散割据状态,分局决定先在少数地区发行区域性货币,待条件成熟时再建立统一的币制。1949年5月2日,华南分局(香港分局改称)指示粤赣湘和闽粤赣边区党委,“在各自管辖的地区,首先分别独自发行一种流通券”,并在各区党委财经委领导下,“成立贸易局之类的一种商业机构,用以掌握物资,调剂市场,稳定币值”;随后又电示琼崖区党委开展这一工作。在此前后,华南各地区陆续发行了裕民券(潮汕)400余万元,新陆行流通券(陆丰)60万元,九连流通券6万元,大埔流通券1万元,琼崖解放区则发行了光银代用券等。

5月初,财经委开始在香港启源行印制流通券。下旬,已印好的流通券入印钞机等被转移到广东省揭阳县河婆镇。7月10日,正式成立了南方人民银行总管理处,下设潮汕分行、东江分行和梅州分行,同时向粤赣湘和闽粤赣两大游击根据地发放南方券。至9月底止,共发行南方券1000万元(以2元折合港币1元)。

与此同时,分局在粤东解放区建立了南方物资局,在香港则以商人的名义设立了侨汇局和物资进出口庄。分局利用这些机构接收侨汇与采办物资及接收内地的出口物品,通过物资之抛售去保证币值的稳定。

9月10日,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的新的华南分局在赣州举行货币政策讨论会,分局第三书记方方和南方人民银行副总经理赵元浩介绍了华南港币广泛流通的严重状况。随后,会议讨论并做出了《华南港币处理意见》的决定,制定了以排挤为主,存兑为辅的肃清港币方针。

香港分局所采取的上述各项措施,为华南地区在解放后确立人民币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为了迎接解放军主力解放华南,并为解放后安定社会秩序,保障供给,恢复生产,分局从1949年初就布置华南各大区积极做好各项物资的准备工作,特别强调要做好夏收的征粮、购粮和借粮工作。与此同时,分局贸易局等机构,想方设法从香港和南洋等地购进紧缺物资。7月,方方电示庄士平和许渠清,立即用侨汇在暹罗筹集500至1000万斤大米,最迟于汕头解放后一周内运进。

鉴于南下大军多数人为北方人,不习惯南方水土,又经长途跋涉,极易生病的情况,分局组织人力在香港购置了许多应急药品,并建议中央告诉南下部队保持身体健康的注意事项。

在9月的赣州会议上,华南分局专门讨论了解放广州后的物资供应问题。会议制定了加速从广东及南洋等地筹粮,从北江和西江运入木材的措施,并做出了《关于支前工作的决定》。会后,分局又在香港和南洋等地开展了募捐活动。

六、开展护产斗争及策动国民党在港经济机构起义

分局多次指示香港城委及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和布置华南大中城市的护产斗争,粉碎国民党撤退时对城市的大破坏。遵照这一指示,华南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统战、策反和情报工作,特别是利用香港开展这一工作;各城市地下党则广泛发动工人、学生和市民开展护厂、护校、护城的斗争,力争将各部门的财产和资料,在解放时尽可能多地转移到人民手里。华南最大城市广州市在解放时,除海珠桥及少数仓库被炸外,基本上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加速了其官僚资本向香港的涌入,如能

在解放时将这些资财转移到新生的人民政权手中,其意义十分巨大。为此,分局布置统委、侨委、财经委和情报等部门全力加强财经统战工作,积极策动国民党在港经济部门的起义。

1949年11月9日至1950年1月18日,滞留在港的原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资委会、招商局、九龙关、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广东银行、广西银行、福建银行、中信分局、邮汇分局、中植油厂等25家机构全部起义。这些机构员工总数4900人中有4855人参加起义,占总数的97%;以后,有3420人回内地,540人分配留港,占起义人数的81%以上。这些机构的总资产超过2.43亿港元,其中2亿多元被人民政府接收。这些起义,不但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而且大大增强了中共在港经济工作的实力,并在人、财、物等方面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

解放战争时期,华南党组织成功地在香港开展了财经工作,创造了巨大的物资财富,有力地支持了内地的武装斗争和党的其他工作,团结和争取了大批工商界朋友,积累了从事市场经济工作的大量经验,培养了一大批从事财经工作的各类人才。

1949年春夏间,根据华南党组织的部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重要干部继续坚持港澳和东南亚的财经工作。他们利用这些地区的特殊条件,继续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40多年过去了,南洋商业银行在董事长庄世平的领导下,已经成为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近年在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地也设立了分支机构。安达公司扎根于香港,现已成为华润公司属下的一个重要企业。《经济导报》发展至今,已经发展成为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以经济专业出版为中心的颇具规模的多元化企业集团。当年中国共产党播下的种子,如今都已长成参天大树,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栋梁之材。

毛泽东在安徽推广责任田的前前后后

刘 以 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大包干(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之所以能在安徽省率先起步,迅速推开,使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出现崭新的局面,是因为早在60年代初安徽就有了这样的基础,也就是说,这是与安徽当年推行责任田的实践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的。而安徽责任田的起落和命运又是与当年毛泽东的态度密不可分的。

一、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安徽责任田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环境

安徽的责任田酝酿于1960年秋,试点于1960年底,形成于1961年春。那时的形势如何呢?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大都记忆犹新。50年代末,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们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五股歪风迅速泛滥开来,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当时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从1959年起发生严重困难。1960年冬,安徽、山东、河南等地均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

面对严重困难,毛泽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头脑逐渐冷静下来。为了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他下决心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为迅速扭转困难局面,他一方面强调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另一方面,又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强调实事求是。毛泽东不仅亲自搞调查研究,而且派身边的工作人员下去了解真实情

况。他曾对汪东兴、叶子龙、林克、高智、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等七人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并严厉地强调指出：“要讲实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①

在初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960年冬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3日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着重解决对农业生产破坏极大的“五风”问题和农村人民公社政策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中强调指出，在纠正“五风”中需要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②

从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相继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着重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问题。1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③。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等省农村进行调查。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发现了人民公社中存在的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在毛泽东主持下，党中央又于1961年3月讨论和制定

^①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0页。

^③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为了更好地推动全党开展调查工作,毛泽东还批准印发了他在1930年写的、而在1961年1月发现的重要著作《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强调说:“这篇文章发下去的时候,有些要解释一下,主要是讲基本方法。民主革命时期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仍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要进行调查研究”^①。这篇文章对全党大搞调查研究,转变思想作风来说,是一个有力的武器。

正是在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实事求是的情况下,安徽省委为了提高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扭转当时的严重困难局面,通过调查研究,在全省逐步试验、推行了责任田办法,即在“五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全奖全赔^②。其主要特点是:把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结合了起来,把包工和包产结合了起来,把生产成果和计算奖赔结合了起来。

这个办法,是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率先提出和倡导的。自从安徽省1960年发生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现象以后,他的心情焦虑不安,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开始,曾希圣曾试图从加强集体生产责任制入手来研究对策。他认为:集体生产必须有相应的责任制,人民公社化以后,在高指标和“共产风”的影响下,把过去一套包工包产的集体责任制全吹掉了。没有责任制生产就搞不好。为了参考国外的经验,他让省委办公厅和农村工作部的有关人员,查阅了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有关农业生产管理的资料。在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他决定采取划小包产单位,实行包产到组,认真评工记分,超过底分奖

^①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② 《1961年推行“责任田”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

励的办法。

1960年8月28日,曾希圣在省委召开的县级以上干部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包产到组的办法:“就是生产队下划分三个组,分别包产,一组包口粮,一组包饲料,一组包商品粮。好处是各有责任。”^①不久,他进一步提出,“生产队下面均应设生产组,避免生产大呼隆……对社员干活超过基本工分的,都可以适当予以奖励。每月结算一次,按月发奖”^②。这个办法后来引入了曾希圣主持制定的有关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十条具体政策中,并以人民政府名义布告全省。各县均召开了有生产组长参加的六级干部会,做了传达贯彻。

这年10月,曾希圣以华东局第二书记的身份,调往山东兼任山东省第一书记。11月,安徽省委为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曾希圣专程赶回安徽,在会上继续强调指出:“我们是三级半所有制,小组是半级所有,以加强生产责任制。包产问题仍实行双包制,小队向大队包产,小组向小队包产。”^③曾希圣提出的这套办法,在安徽得到全面贯彻。这与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实行的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不联系产量的做法相比是一大进步,它对克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群众最厌恶的干活呼隆、分配吃大锅饭的办法。群众形容这种办法是:大呼隆变成二呼隆,大锅饭变成二锅饭,大矛盾变成小矛盾。生产小组的评工记分,仍然避免不了“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的现象。这种情况,促使曾希圣对农业生产责任制做进一步探索。

1960年冬,曾希圣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

^① 《曾希圣同志在县级以上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8月28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② 《曾希圣同志在省委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10月14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③ 《1961年推行“责任田”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听到毛泽东谈到“可以把高级社时期实行田间管理农活包工到户的办法恢复起来”的讲话,受到很大启发^①。之后他亲自布置省委办公厅和农村工作部组织人员,查阅了我国互助合作运动中的改进经营管理方面的大量资料,进行系统的研究,对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在包工包产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总结出责任不明、干活大呼隆、评工记分繁琐、分配不合理等四大弊端。同时,他也广泛地研究了各行各业的责任制办法,深刻地认识到:“任何生产都要有责任制……没有责任制,工作就搞不好。”“工厂也是把生产任务分配到每一个车间,车间又把任务分配到每一台机床……超产奖励,谁超谁得”^②。他经常对身边工作的同志们说:工业上按件计酬的办法,为什么不能移植到农业上来?于是,曾希圣提出要他们回到安徽,在偏僻山区搞个包产到户的试点。1961年1月,安徽省委常委、副秘书长郑锐和省委常委、副省长张祚荫去山东向曾希圣汇报工作时,曾希圣又再次提出要搞包产到户的试点。同时,还对他们说了以下几件事:第一,关于恢复农村经济问题,可以考虑走包产到户的路子。第二,已经向毛主席请示过,农村食堂制度不成功,要取消,让社员一家一户自己做饭吃。第三,安徽也出了大问题,主要责任在他,他向毛主席请示,拟不再任山东省委书记,回安徽去纠正自己的错误,把安徽的生产搞起来,并且说,他很快就要回安徽^③。根据曾希圣的意见,省委布置舒城县委在晓天公社一个大队搞了包产到户的试验。

1961年2月,曾希圣调回安徽工作。在路经蚌埠时,张祚荫在火车上向他反映:宿县有个老农,带着一个有病的儿子上山开荒,

^① 安徽省委办公厅印:《关于“责任田”的几个参考材料》(1962年7月20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② 《曾希圣同志在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61年4月23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③ 张祚荫:《推行责任田的回忆与思考》,见《1961年推行“责任田”纪实》,第36页。

获得丰收,还交给大队很多粮食。曾希圣对此很感兴趣,非常重视。通过进一步了解,这个老农叫刘青兰,是宿县褚兰公社苗光大队王庄生产队的社员,73岁,儿子有肺病,不能做事,别人劝他到敬老院,他向公社党委提出:现在我还不能吃公家饭,还要尽我的力量做事。他就带着儿子到山里,一面养病,一面开荒种庄稼,第二年收了3300斤粮食,交给大队1800斤,还交了60元现金(养猪、养鸡所得)。他还向领导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种,统一分配,不然不少社员混工,没有责任心,生产搞不好^①。这个老农的事迹,使曾希圣很受启发,他曾多次表扬这个老农是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他认为“包产到户”是来自群众的创造,应该推广。后来,蚌埠地委派人在怀远县曹老集公社搞了一个试点。

2月14日上午,曾希圣回到合肥,当天下午即召开省委书记会议。在会上,曾希圣提出了他设想的“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责任制办法。书记处对此进行了研究,同意他的观点,赞成他的设想。但是,正当全国各地批判包产到户为异端邪说的情况下,推行这个名义虽非实质仍是包产到户的办法,又感到有风险。会后,省委把这一情况向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作了汇报。柯庆施答复说,这个办法不推广,每个县先搞一个典型试验一下^②。

不久,柯庆施来安徽,途经全椒县古河镇休息时,与当地几个老农交谈,老农向柯庆施提出:“你们最好把田包给我们种,我们保证种好。”并且质问:“为什么不相信我们?”^③柯庆施到合肥后,即把这一情况转告了曾希圣。

宿县和全椒两处老农的事迹和建议,完全符合曾希圣的设想,也验证了这一设想的正确性,从而更进一步增强了曾希圣推行这

① 《安徽工作》,1962年第13期,第19页。

② 《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草稿)》,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③ 同上。

一办法的决心和信心。他决定进一步亲自搞试点。1961年2月底，曾希圣便带领张立治、赵岭峻、周曰礼、陆德生4人到合肥市蜀山公社井岗大队的一个穷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联产到户的试点。曾希圣之所以选在蜀山公社试点，是因为1959年毛泽东曾视察过这个公社，这个社知名度较高，影响较大，试验成功之后，有利于推广。通过试点，初步形成了责任田办法，其基本内容是：在“五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以产计工，大农活包到组，小农活包到户，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简称“责任田”。通过试点，曾希圣也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一办法的认识，并总结出以下十大好处（也称为十大优越性）：

（一）人人有责，大家都会动脑筋想办法来增加生产。

（二）所有能够参加劳动的人都参加生产。

（三）人人都要努力学习生产技术。

（四）自留地和大田在用肥方面能够统筹兼顾，消除矛盾。

（五）社员能够更好地安排自己的劳动时间和休息时间，更好地做到劳逸结合。

（六）大家都会更加爱护耕畜农具。

（七）能够保证农活质量，不窝工，不出废活。

（八）能够限制那些投机讨巧的人。

（九）户户都会更好地培养丰产田，并且能够更加做到精收细打，颗粒不丢。

（十）能够更快地发展养猪家禽，以及其他家庭副业^①。

由上可见，安徽责任田是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的大环境、大气候下，由以曾希圣为首

^① 安徽省委办公厅印：《有关“责任田”办法的文件汇编》（1962年3月29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的安徽省委通过调研试点，探索出来的一个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一个新办法。

二、毛泽东的认可和支特，对安徽责任田的迅速推行起了重大作用

在取得责任田试验的基础上，能否由点到面地推行到全省，既取决于以曾希圣为首的安徽省委的胆识和决心，更取决于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态度。

1961年3月6日，安徽省委召开了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了南新庄的试点材料。当晚，还召集了蜀山公社的部分干群到省委座谈责任田问题。座谈后，省委书记处会议决定扩大试行责任田。会后，根据曾希圣亲笔写的提纲和书记处讨论的意见，写出了《关于包产到田责任到人问题(草稿)》的文件。3月8日上午书记处又开会，决定由书记处同志携带文件草稿分头下去传达，组织试点。后来，这个文件又经两次修改，称为《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一面向下传达贯彻，一面等待在即将召开的广州会议上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请示汇报。到3月14日，每个县都搞一两个试点，还有一些社队自发搞了责任田。

1961年3月7日，曾希圣赴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会议上，曾希圣把华东小组实行责任田的做法及优缺点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说明从试点情况看增产是有把握的。毛泽东答复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①毛泽东在与曾希圣谈话时，谭启龙也在座，耳闻目睹了谈话的情景。毛泽东表态后，曾希圣非常高兴，立即打电话告诉在家主持工作的省委同志，并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②于是，省委马上向地市县委第一书记发了一封信，并附上

^① 《曾希圣同志传达广州会议精神》(1961年3月28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② 安徽省办公厅印：《关于“责任田”的几个参考材料》(1962年7月20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第二次修改稿)》，要求他们对责任田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行”^①。省委这封信，对解除下面干部的疑虑，在全省范围内推行责任田起了重要的作用。

可是，正当全省各地广泛试行责任田时，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从华东局某负责人处拿到了一份安徽试行责任田的材料，即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认为这是在严重困难面前惊慌失措的表现，后果不堪设想^②。于是，在广州会议后期，毛泽东又经由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由于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含意与原来有所不同，限制了试行面，曾希圣便于3月20日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并少奇、恩来、小平、彭真以及柯庆施，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责任田”的做法和积极作用。信中说责任田的“好处是：改变了计算工分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缺点，堵塞了投机讨巧的空子(逐丘定产、逐块定工与工矿企业中的产品定额和劳动定额相类似)。因此，能更好地体现多劳多得的政策，能提高每个社员对包产的责任心和生产积极性，从而改变过去对包产只是生产队干部关心或包办而社员不甚关心或完全处在被动的情况”。信中也指出这样做的“坏处是：可能发生‘各顾各’的危险，有的农活可能出现争先恐后的现象，自私自利的思想可能发展，困难户的困难可能得不到解决等。”信中强调指出，我们“是吸取它的好处，又规定办法防止它的坏处”^③。曾希圣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为了说服毛泽东，取得他的进一步支持。可是，毛泽东对这封信未作进一步表态。

3月28日，曾希圣从广州回到合肥。当晚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他在简要传达广州会议精神的同时，指出：责任田“这个办法，

① 《关于推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办法的意见(第二次修改稿)》(1961年3月15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② 《1961年推行“责任田”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③ 《曾希圣同志给主席写的一封信》(1961年3月20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现在看来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能够增产。我们就今年试验一年,如果实践证明是好的就继续搞,实践证明不好,以后不搞就是了”^①。他根据毛泽东在广州会议后期经柯庆施转达的指示,提出只能在小范围内试验,叫省委办公厅电告下面停止推行。但当时全省已有 39.2%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而且方兴未艾,继续发展。大家都感到难收,所以实际上并没有采取什么收的措施。

责任田的推行,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省内外对此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大多数群众拥护责任田,少数社员态度不积极,或者表示反对。干部中有许多人到农村调查责任田,看法也不同,有的热情称赞,有的认为可作权宜之计,有的持反对态度。来信来访很多,争论的焦点是这个办法符合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为了说明真相,排除干扰,统一认识,取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中共安徽省常委数次向党中央、毛主席并华东局写书面报告。1961年4月27日,安徽省向中央、主席并华东局写了《关于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说明责任田和六十条中所说的“实行严格的田间管理责任制”,“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是完全一致的,请求中央告知邻省,“以免发生误会”。同时,这个报告也发给了省直各部门和各地市县委,要他们在“有人前来了解这个办法时,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进行解答”^②。省委还派人向各大专院校、机关干部、军区部队作报告,说明情况。同年7月24日,安徽省委又向中央、主席、华东局写了《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在较详细地说明责任田的做法以后,着重分析这个办法是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报告指出:这个办法“不是单干”,“不会造成两极分化”,“不会加重社员的私心”,“是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

^① 《曾希圣同志传达广州会议精神》(1961年3月28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② 《关于试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1961年4月27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群众的觉悟水平的,是符合当前农业生产以手工操作为主的特点的。”^① 根据上述认识,安徽省委向干部群众做了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

1961年7月,正当省委在岳西县石关招待所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讨论进一步完善、推行责任田时,毛泽东外出视察,途经蚌埠。为了取得毛泽东的进一步支持,曾希圣连夜赶到蚌埠,在列车上向毛泽东汇报了石关会议情况,也汇报了推行责任田的情况。他说:“过去包产的办法,只有队长一个人关心产量,社员只关心自己的工分,现在的办法不仅队长关心产量,而且每个社员也关心产量。田间管理,长年包工好处很多。缺点是:(1)可能私心重;(2)年年要调整,增减人口都要调整责任田。群众反映不光是包责任田有私心,评工记分也有私心,过去工分是抢工分,现在是要把田做好。这个私心比那个私心好,这个心能提高产量。”毛泽东听后回答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② 有了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全省上下就可以放开手脚去干了,因而责任田得到迅速推广。到8月中旬,全省实行责任田的队增加到74.8%^③。10月中旬又增加到84.4%^④。到1961年底,全省实行责任田的有261249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90.1%^⑤。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认可和支 持,使责任田办法在安徽全省得到迅速推行。

责任田的推行,得到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并且

① 《关于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报告》(1961年7月24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② 安徽省委办公厅印:《关于“责任田”的几个参考材料》(1962年7月20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③ 《关于实行“责任田”办法的经过情况》,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④ 《关于继续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办法的意见》,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⑤ 《桂林栖同志写给曾希圣、黄岩、光宇同志的信》(1962年2月4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广德县誓节公社杨柯大队牌坊生产队的社员们说：“这个办法责任分明，人人有责，依赖不成，瞎混不行，不会干不干一样吃饭了。现在，积极的更加积极了，不积极的也积极了。”全椒县有些社员说：“实行责任田算是摸透了我们的心，这个办法一定是会种庄稼的人想出来的。”^①一位安徽籍的在京工作人员叫刘年的，给曾希圣写了一封信，称赞责任田说：“据我在今年夏天的了解，最大好处，是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推动群众把生产搞好了。凡搞了责任田到户的地方，比起没搞的邻近地方，其气象一般地总是好些。因此，大多数群众都拥护这个办法。”^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为了检验责任田的效果，安徽省委于1961年5月23日发出了《关于认真调查和全面总结“包工包产责任制”的通知》，要求每个地委第一书记亲自组织和参加调查总结一两个典型，摸准摸透经过夏收夏种和夏收分配的考验后，责任田到底管用不管用，到底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如果管用，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改进。同年9月14日，省委又向各地发出《关于进一步调查和总结两种包工包产办法的通知》，指出，现在秋收即将结束，全年收成可见分晓，两种不同包工包产办法（注：指责任田新办法和包产到队老办法）的成效和问题，在这个时候也看得更加明显。因此，这个通知要求各地委在不同类型的地区各选择两个条件大体相同的生产队，对两种包工包产办法再深入进行一次调查，加以对比分析，研究总结，以便改进提高。

根据省委上述通知，省委和各地委负责人及时组织并参加了调查。从全省各地向省委报送的许多调查材料来看，责任田确实优于其他办法。比如，肥东县长乐公社润南大队路东生产队（实行责任田办法）和路西生产队（没实行责任田办法）同在一个自然村，只

^① 安徽省委办公厅印：《有关“责任田”办法的文件汇编》（1962年3月29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② 《刘年的信》（1962年10月6日），见《1961年推行“责任田”纪实》，第141页。

是一路之隔。两队的生产条件基本相同，路西队还要稍好一点，因此路西队往年的生产一直比路东队好。可是1961年路东队实行责任田以后，生产超过了路西队。路东队全年粮食产量平均每亩339斤，路西队只有264斤，即少75斤^①。又如，繁昌县峨山公社铁厂生产队的调查材料说，这个队3月底开始实行责任田，全年预计粮食亩产638斤，比条件相同、没有实行责任田的宗塘生产队平均亩产402斤，要高出58.7%。全队承包责任田的17户社员除一户保产外，其余户的责任田都超产。午季、早稻、中稻的上交任务，都已超额完成^②。再如，据有关部门1961年10月对36个县的典型调查，实行责任田的36个队，平均每亩粮食产量284斤，比上一年增产38.9%；而另外36个条件大体相同、不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平均每亩产量270斤，比上一年只增长12%^③。更有说服力的是：阜阳、宿县两个地区，由于广泛推行了责任田，取得了40年来少有的好年成。1961年山芋获得大丰收，自己吃不完还支援河南、山东和江苏的部分灾区。安徽省委专门发了文件，要各地不要拦截运往外省灾区的粮食。河南省的驻军出动各种车辆帮助灾民运送粮食。蚌埠铁路分局还增开了运粮专列，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书记处书记金明和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等，于1962年2月专程来到宿县，对安徽的干部、群众表示感谢。在安徽责任田起重大的作用的1961年至1963年，国家粮食征购任务每年全省能完成并超额完成。据当时粮食部门汇报，1961年粮食年度超额0.96亿斤贸易粮，完成了中央安排的征购任务，收支相抵比上年增加粮食库存1.14亿斤，一举改变了前几年粮食库存直线下降的局面。1962年

① 安徽省委办公厅印：《有关“责任田”办法的文件汇编》（1962年3月29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② 《一个执行政策比较好的生产队》（1961年10月18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③ 安徽省委办公厅印：《关于“责任田”的几个参考材料》（1962年7月20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和 1963 年农民交粮要排长队久等，各地粮站不得不增加两万名临时工参加收购。由于粮食征购状况好转，1962 年 10 月份开始增加了城镇人口口粮供应^①。

这样，在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下，安徽的责任田由点到面，迅速推广到全省，产生了巨大威力，结出了丰硕之果。正因如此，广大干部群众一直称颂责任田是“救命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灵丹妙药”。

三、形势好转后毛泽东的态度发生变化，安徽的责任田中途夭折

实行责任田办法，虽然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战胜了严重困难，改善了人民生活，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但由于它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户为单位分散经营，不符合当时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要求，因此，围绕这个问题的方向道路之争始终没有间断。即使后来积极主张改革开放、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和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他于 1961 年下半年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认为：责任田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这种做法对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确实起了积极作用。现在有许多社员还很拥护这个办法，还能起一定的作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并不否认这个事实，一棍子打死。但是，这种做法已经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纠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系列的危险：（1）会发生不等价换工，从而产生剥削；（2）违反简单协作优于单个的原理，从而降低生产效率；（3）大家既然对集体生产资料不关心，就不可能发展扩大再生产的能力；（4）集体观念要淡漠下去，集体组织也会瘫痪。总起来说，这种作法发展下去，最后会引导到降低整个社会生产水平”^②。可见，从安徽到中

^① 王光宇：《关于责任田的回忆》，见《1961 年推行“责任田”纪实》，第 33 页。

^② 《曾希圣同志对刘年同志的来信、胡耀邦同志写给中央报告中的一段的批语》附二，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央、上上下下，围绕安徽责任田的争论波及范围之广。这种情况，也不能不影响到毛泽东的态度。

自1962年起，安徽和全国的经济形势都开始好转。在这前后，毛泽东对安徽责任田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61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9月29日提出的建议，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就此问题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党中央作出决定。1962年2月13日，经过充分讨论后，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毛泽东看来，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够了，不需要再搞责任田了。因此，1961年12月，毛泽东在无锡时，把曾希圣找去汇报工作，谈话间毛泽东问曾希圣，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否还要搞责任田？^①并用商量的口吻说：生产已开始恢复，是否把责任田这个办法改回来？^②曾希圣请求说：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当时，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

1962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大会结束后，中央留下安徽的代表揭盖子，对曾希圣压制民主的霸道作风进行了严肃批判，并指责责任田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等等。党中央决定将曾希圣调离安徽，改组安徽省委，派李葆华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新省委主要负责人李葆华、李丰平、刘季平来安徽后，多次主持召开省委书记会议、常委会议和其他会议，研究责任田问题。在第五次书记处会议上，李葆华作了结论性的发言。他指出：“对责任田办法如何估计，当时安徽灾情很重，提出责任田办法是好心，

^① 安徽省委办公厅印：《关于“责任田”的几个参考材料》（1962年7月20日），原件存安徽档案馆。

^② 《1961年推行“责任田”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

从解决灾情出发的。”“但是，是否一定要用责任田办法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呢？”“现在看，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安徽的责任田，一种是中央的十二条、六十条、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践证明，按中央的办法做不会走回头路，按责任田办法做要走回头路，而且后果很坏，会把农民引向单干的道路，发展下去会两极分化，出现高利贷。”“在北京时，改责任田问题曾经向少奇同志讲过，少奇同志说，要走回头路，这是很明确的”^①。1962年3月，安徽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对责任田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并由省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这个决议指出：“我省绝大部分地区实行的责任田办法，与中央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这个办法是调动农民的个体积极性，引导农民走向单干，其结果必然削弱和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办法在方向上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的，必须坚决地把它改正过来。”^②同时，也强调指出：“改变责任田又必须本着积极谨慎的精神，分期分批有步骤地改，防止产生急躁情绪，闻风而起，全面铺开，草率从事，影响农业生产。”^③

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下达后，引起了改正和反对改正责任田的激烈争论。一些了解基层情况的同志纷纷上书党中央、毛主席和安徽省委，反对改正责任田。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于1962年5月向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说道：“根据太湖一年多来实行‘责任田’的结果……我总认为，‘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重

① 《安徽省常委第五次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2月19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② 《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1962年3月20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③ 《1961年推行“责任田”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要补充。有了它,当前的农业生产就如鱼得水,锦上添花。”还说:“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的起码占80%以上,甚至于占90%以上”^①。同年7月,宿县符离集区委也写信给毛泽东,认为责任田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而且解决了六十条没有解决的问题。他们认为:“实行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克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调动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推行‘责任田’办法,则比较彻底地克服了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可以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② 上述信件,毛泽东是否亲收,不得而知。

不仅许多基层干部反对改正责任田,就是一些高级干部也不赞成改正责任田。比如,华东局农委副主任董家邦等,于1962年7月到安徽来安县大余郢公社大余郢大队进行调查。调查报告说:“去年实行责任田的15个生产队,队队超产,4个包产到组的队,两个队减了产。”在改正责任田的决定下达后,“三个坚持责任田的队和一个包产到组的队大家都公认比去年好,而15个改为集体生产的队,据干部分析,如同去年相比,有的好些,有的就差些”。“从当前的思想情况来看,在座谈会上,干部老农比较一致的反映:留恋责任田是普遍的”。根据调查,“我们初步的看法是:在当前生产力水平、群众觉悟水平和干部管理水平的现实状况下,实行责任田办法,比之一般队的集体生产,可以增产是肯定的。在已经实行责任田的地方,目前可不必急于去改变”^③。又如,有一位中央下放干部上书刘少奇,“要求主席在全国各省都要实行田地承包到户,都要学习安徽的经验,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多打粮食,才能国富民强,

① 《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1962年5月),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② 《宿县符离集区委会的来信》(1962年7月),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③ 董家邦、张世荣、李彬:《关于“责任田”的初步调查》(1962年7月17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才能更快地提高工、农的生活”^①。再如，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1962年6月曾写信给中央，反映实地考察安徽责任田的情况，表示支持“责任田”^②。特别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早在1961年广州会议期间，就表示赞同责任田办法，广州会议后又亲来安徽了解情况。1962年7月，他派张其瑞等人到安徽省符离集区进行调查。他们调查后写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的调查报告》，认为：“责任田不能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央书记处接到这个报告并进行讨论时，邓子恢不计个人得失，直言生产责任制很好，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可以在农村普遍推广。不久，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一次推荐了这个报告。然而在当时，邓子恢的意见不但没有被理解，反而受到严厉批评。但是，他仍最后重申：“对责任田，我现在还是这样看。”^③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断，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全会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一片黑暗风”和“翻案风”。邓子恢和曾希圣均受到了批评，并作了检讨。毛泽东批评邓子恢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④。于是，全会撤销了中央农村

① 《有关“责任田”的人民来信汇编》（1962年7月10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② 宋任穷、陈丕显、叶飞：《奋斗不息的坚强战士》，见198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第5版。

③ 《1961年推行“责任田”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页。

工作部和邓子恢的部长职务。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安徽对责任田进行了更猛烈的批判,责任田被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风”而加速纠正。

1962年10月12日至11月12日,安徽省委召开了一届十三次会议,传达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强调“这次会议反对了‘单干风’、‘一片黑暗风’、‘翻案风’,‘闹单干的中央有,省、地、县、公社都有。单干风大,但为数不多,不过百分之几,全国只有安徽最多’^①。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的决议》,决议指出:“这个决定对安徽更有特殊意义,它为我们顺利地改正责任田办法,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强调我省过去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六十条,反而错误地实行了责任田办法,这股严重的单干风,是由过去省委带头和强制下面刮起来的”。“必须按照六十条的规定,有领导有步骤地把它改正过来,彻底纠正单干风”^②。

会后,全省分三片举办了有区社干部一万人参加的改正责任田训练班,结业后以他们为骨干组成工作队,到农村帮助改正责任田。从1963年开始,在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接着又于1966年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掀“走资派”、“走资社员”。在这些运动中,对责任田进行了更猛烈的批判,责任田也随之被全面“改正”。

四、历史的经验教训

回以上顾这段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哪些经验教训呢?

首先,必须根据广大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来制定党的路线、方

^① 《省委关于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传达要点》(1962年11月15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② 《省委一届十三次会议“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的决议》(1962年11月17日),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针和政策。由于责任田办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反映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又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干部的管理水平;也由于毛泽东在责任田刚出现时,尊重群众的愿望要求和首创精神,予以认可和支持,因而责任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迅速推行到全省各地,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后来,由于毛泽东态度变化而作出的“改正”责任田的决定,违背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尽管一再以大批判开路,实行高压政策,然而,“改正”的速度却是相当慢的。到1962年11月12日止,全省有60%以上的生产还没有“改正”责任田^①。而且在“改正”过程中,广大群众往往采取一拖二糊的办法,不仅出现明改暗不改的现象,而且有的就一直延续下来。从全省来说,拖了三年才基本“改正”过来。由于责任田深深地扎根于江淮大地,扎根于广在群众的心坎深处,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多年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一种类似责任田的大包干农业生产责任制又在江淮大地蓬勃兴起,迅速扩展到了全国,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这说明,凡符合客观规律和群众愿望要求的新生事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一定要从广大群众的愿望要求出发,而不能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其次,不论在任何形势下,都要始终坚持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责任田是在我国处于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在毛泽东大力倡导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大环境、大气候下产生的一个新生事物。然而在国民经济形势好转以后,由于毛泽东不够谨慎,不够重视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一个模式搞“一刀切”、“一锅煮”,安徽的责任田正是在“一大二公”的模式下被取缔改正的。在毛泽东看来,责任田只是在困难时期的一种暂时退却,形势好转了,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村问题就解决了,其他模式都不需要了,不管它是否适合于当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是否为群

^① 《安徽工作》,1962年第13期,第1页。

众所欢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论在任何形势下,我们都要始终坚持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某个固定的模式出发。

最后,必须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真正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60年代初安徽不论是在责任田推行过程中,还是在责任田“改下场”过程中,都充满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概括起来,就是姓“社”姓“资”的争论。不少同志,包括毛泽东在内,当时对社会主义存有严重误解。比如,认为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实现“一大二公”,就是社会主义;而把脱离实际的生产关系调整过来,使之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就是走回头路,就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又如,把集体经济和集体经营混淆起来,认为集体经济只能集体经营,集体经营就是集中劳动,集中劳动才是社会主义,分散经营、分散劳动、包产到户、责任到人就是资本主义,等等。这些认识上的错误,是导致后来对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责任田”这种经营管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新方法,进行错误批判并予以取缔的重要原因。如何判断姓“社”、姓“资”呢?邓小平同志正确地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①按照这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看,安徽1961年的责任田和后来的大包干农业生产责任制,无疑都姓“社”而不姓“资”——历史的结论就是如此。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冤案酿成始末

陈 文 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该文把吴晗1960年写成的《海瑞罢官》同1961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说吴晗“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用地主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在“牛鬼蛇神”刮“单干风”、“翻案风”的时候,鼓动“退田”,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代表被打倒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鸣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海瑞罢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一株大毒草”。

文章发表之后,最初在学术界确曾引起一场是非之争。但很快就演变成一幕对吴晗及其支持者进行残酷迫害的文字狱,并由此而引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顶点的“文化大革命”。然而,发动这场“批判”的根据纯属子虚乌有,它是一桩不折不扣的历史冤案。

《海瑞罢官》的由来

事情是由毛泽东倡导宣传海瑞引起的。

1959年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

议期间,许多同志谈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題,同干部不讲真话、不敢讲真话有关。毛泽东在一次观看湘剧《生死牌》时说,现在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精神,并要胡乔木找几位历史学家研究一下,请他们写这方面的文章。毛泽东还讲了一段海瑞骂皇帝的故事: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他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并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奏章里,触怒了皇帝,被关监狱。有一天,看监的老头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吃了以后奇怪。经追问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于是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毛泽东说,尽管海瑞骂皇帝很厉害,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并要胡乔木找人写关于海瑞的文章,胡乔木找到了吴晗,要他根据毛泽东的意思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文章。

1959年6月16日,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在《人民日报》同读者见面。9月21日,吴晗又发表《论海瑞》。这篇文章初稿写成于庐山会议之前,吴晗把文稿交给了胡乔木。庐山会议后,胡乔木把批判彭德怀和毛泽东关于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的意思告诉了吴晗。吴晗根据上述精神,在文章结尾加了三段批判所谓“假冒海瑞、歪曲海瑞”,批评“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的话,以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话。

1959年下半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约吴晗写海瑞戏。吴晗七易其稿,历时年余,写成《海瑞罢官》。剧本原名《海瑞》,在彩排过程中,经过许多人共同研究才改名《海瑞罢官》。

作为历史学家,忽然写起剧本来,其间尝过多少甘苦,经过哪些艰难行程,吴晗在剧本序言中,有过简要的交待。关于剧名,他说:“剧本原就叫《海瑞》,后来有不少朋友提出,这个剧写的只是海瑞生平一部分,才改名为《海瑞罢官》”。其具体情节,吴晗的秘书郭星华有一段记述:

“1960年夏,吴晗同志邀请了一些历史学家、戏剧家在市人委会议室研究讨论《海瑞》剧本,到会的有王昆仑、孙方山、老舍、魏静

生、王雁、李慕良等同志。吴晗同志还要我参加会，帮助他记录大家的意见。会上讨论热烈，提出的主要意见：首先是剧名《海瑞》太大，剧本写的只是海瑞在任江南巡抚期间的几件事，由上任到罢官这一段，剧名和戏的内容不贴切，不如改为《海瑞罢官》更切合实际；其次是在剧本中海瑞令乡官退田事，在舞台上不好表现，缺乏戏剧性，不如把平冤狱作主线，退田作为副线；再一点是剧本的结尾描写海瑞罢官离任的场面，使人感到灰溜溜的，戏没有达到高潮。建议去掉几场戏，让海瑞斩了徐瑛，然后交印，以罢官结束。与此同时，袁震同志（吴晗的爱人）告诉我说，吴晗同志的老友蔡希陶同志出国考察，路过北京，到吴晗同志家里，看了《海瑞》剧本，也提出应该加上“罢官”的意见。吴晗同志采纳了这些意见和建议，在1960年底，彩排后，将剧名由《海瑞》改为《海瑞罢官》。”这就是《海瑞罢官》的由来。

事实说明：第一、吴晗写《海瑞罢官》开始于1959年，完成于1960年，他当时写“退田”和“平冤狱”，同1961年出现的所变“单干风”、“翻案风”毫无联系，第二，吴晗写《海瑞罢官》是应马连良之约，马连良也是为了响应毛泽东关于宣传海瑞精神的号召，也是因为他喜欢海瑞的刚直不阿和清廉，喜欢演清官戏。第三、剧本原名《海瑞》，只是听了朋友们的意见才加上“罢官”二字，而朋友们的意见完全是从艺术上考虑，要有戏。硬要同罢彭德怀的官联系在一起，说是为彭翻案，纯属子虚乌有。

史学界、文艺界的春天

《海瑞罢官》一上演，立即在文艺界、史学界掀起波澜。1961年2月26日，《北京晚报》发表繁星写的《“史”和“戏”》一文，繁星对吴晗“破门而出”，作为历史家“却来写‘戏’”，表示祝贺，并提出三个问题来讨论：①历史的“真实”和戏剧的“真实”，该不该有个区别，如何区别？②写历史书中的人物和写历史戏中的人物，如何区别又

如何统一？③写历史和写戏，都得讲究发展过程。不但情节（其事）有发展过程，人物（其人）也得有发展过程。吴晗是怎样来写这两种过程的？

1961年2月28日，吴晗在《北京晚报》发表《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回答繁星提问。

1961年3月9日，常谈以《从“兄弟”谈到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为题，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就繁星的提问和吴晗的答覆，发表意见，并表示：“我也佩服吴晗破门的精神，海瑞一剧是有收获的，我祝他从破门起步入堂奥”。

1961年3月11日，方三在《北京日报》发表《看〈海瑞罢官〉所想到的》，称赞“《海瑞罢官》是一出好戏，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的一个新历史剧。”

1961年3月17日，《北京晚报》发表史优的《也谈历史剧》，就繁星提出的三个问题，同吴晗、繁星、常谈讨论。

1961年3月，《北京文艺》3月号，发表曲六乙的《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邓元建的《评〈海瑞罢官〉》，讨论如何写戏，并对吴晗“破门而出”的精神表示钦佩。曲六乙说，海瑞不愿做甘草剂，不愿做乡愿，而要做医治国家的神手、神医。吴晗立意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而不苟求于海瑞，不着重写海瑞的缺点和不足，“从剧作的角度来看，是可以被允许的”。

1961年6月23日，《北京晚报》发表马连良的《从海瑞谈到“清官”戏》。文章说，封建社会的官，“给皇帝办事就难为老百姓分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他们和最高的封建统治者，专制帝王或其他的封建官僚之间也会产生一定的矛盾与冲突，而对老百姓又不是绝对不能理解或同情的。因此有的官也可能办出一些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来。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即人们在戏剧里表扬‘清官’，很可能有微言大义存焉，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文艺界活跃一时、以历史剧创作为主题的学术讨论在全国各报刊展开,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戏曲、电影创作呈现出繁荣景象。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电影《燎原》和《怒潮》,戏剧《李慧娘》、《谢瑶环》等等,纷纷同读者和观众见面。在史学界、哲学界也展开了清官问题、让步政策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道德继承问题、美学问题的讨论,其深度和广度为建国以来所未有。

暴风雨的来临

1962年7月,康生向夏衍传达江青对戏剧的批评:最近一个时期戏曲舞台上出现了许多坏戏,是个严重问题。《海瑞罢官》存在严重政治错误,应该停止演出。江青还找到中宣部、文化部的4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但遭到拒绝。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提出要大抓阶级斗争。9月,毛泽东根据康生的汇报,认定《刘志丹》是“反党小说”,并且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批评文化部:“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

非咄咄怪事”。

1963年12月，江青搞起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的“改革”，企图抢夺文化革命的旗帜。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看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后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随后，即对一些艺术作品，学术观点和文学艺术界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

1964年8月，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被作为“修正主义材料”公开批判。此后，在全国展开了对一批影片的批判。

从毛泽东的一系列批示和江青的行动中已经可以看出，一场从文艺界开刀，目的在于打倒“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的运动正在酝酿着。文艺界形势严峻，整个中国的政治舞台，也已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

1965年初，江青前往上海，同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委部长的张春桥密谋策划，并由姚文元（当时任《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执笔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此后，张春桥频繁来往于京沪之间，名为“搞戏”、“修改音乐”，实则“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关于这篇文章的出笼过程，江青于1967年4月12日向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曾透露：“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

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江青的这段自供充分反映了他们泡制这篇以笔杀人的“评论文章”其过程的诡密程度之深。

著名学者胡愈之义正词严:“吴晗写《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吴晗是不会反党的。”

著名科学家周培源说:“吴晗是进步的历史学家,哪里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

周谷城教授怒斥姚文元“陷人于罪”。

元史专家翁独健指责姚文元的文章“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和秦桧陷害岳飞的理由一样”。

广大读者或撰文,或写信,纷纷驳斥姚文元,仅上海《文汇报》即收到来信来稿 3000 多件。为了“引蛇出洞”,《文汇报》有计划地选登了一部分。但从这部分来信来稿中也可以窥见一斑。读者主要从两个方面驳斥了姚文:

一、吴晗“臆造”一个“假海瑞”,宣扬“阶级调和论”的说法,不能成立。

姚文说,《海瑞罢官》中的海瑞“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过的人物。”吴晗“歪曲、臆造”,是“借古讽今”,是“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读者驳斥道:“剧

本描写海瑞所干的几件重要事情,如为民除害,退田等,也都实有其事的。剧本中有些情节处理,如把戴凤翔写成是新任巡抚,把徐瑛判成绞罪,只是为了使情节更加集中,冲突更加尖锐,在不违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海瑞确被弹劾罢过官,也确曾处分过一些豪强子弟),应该允许剧作者有虚构、加工的自由。”^①不能象姚文元说的是“编造出来”的“一个假海瑞”,“更不能说成是“歪曲、臆造。”^②吴晗对海瑞的评价“是比较正确的,对待历史剧的观点,也是对立统一的马列主义的观点。”^③姚文元“事实上全部否定了历史人物的作用。没有用一分为二,用毛泽东思想评论历史人物。”^④这才是“赤裸裸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⑤读者质问道:“《海瑞罢官》在基本上符合历史的情况下,让海瑞做出历史上的海瑞不敢为的事情,他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不是大快人心的事吗?”^⑥

二、《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不是影射 1951 年的“单干风”、“翻案风”。

姚文说,《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就是配合 1961 年的“单干风”和“翻案风”,而且气壮如牛地要吴晗明确回答:“在 1961 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读者替吴晗作出了回答:《海瑞罢官》“全剧从头到尾,处处都写了恶霸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海瑞和大地主集团之间的斗争,以此来构成剧本主要的也是基本的戏剧冲突。至于‘退田’,只

①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范民声等给《文汇报》的信,1965 年 11 月 29 日《文汇报》。

②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范民声等给《文汇报》的信,1965 年 11 月 29 日《文汇报》。

③ 马捷:《也谈〈海瑞罢官〉》,1965 年 11 月 30 日《文汇报》

④ 蔡成和:《怎样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剧》,1965 年 12 月 1 日《文汇报》。

⑤ 马捷:《也谈〈海瑞罢官〉》,1965 年 11 月 30 日《文汇报》。

⑥ 马捷:《也谈〈海瑞罢官〉》,1965 年 11 月 30 日《文汇报》。

是构成基本冲突的一个具体事件,尽管这件事贯串剧本始终,但不能概括剧本的基本内容……因而姚的意见就难成立。”^①《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主要地应是教育观众向海瑞的明辨是非,不徇私情,反对贪污,反对坏人坏事,不向困难低头的优良作风中,汲取精神力量,惩前毖后,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②把“退田”和“平冤狱”,同1961年出现的“单干风”和“翻案风”相联系,这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扯不到一起。”^③硬把它联系在一起“是把学术问题扯到政治问题上去了。”^④这种逻辑“是荒谬绝顶的逻辑”。是对吴晗的“诬蔑、造谣和中伤。”^⑤

全国各报刊对姚文,表示了愤慨和抵制。姚文发表了半个月,只有华东地区的《解放日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新华日报》、《福建日报》、《安徽日报》、《江西日报》转载。

11月26日,彭真明确表示:“吴晗的性质,不属于敌我。对姚文元文章的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再次表态:“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彭真还布置北京市委赶写一个按语,特别是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功夫。凡提吴晗的名字都加上同志二字。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姚文。《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措辞严厉地定性:《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并号召军人“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善于于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则要求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解决问

①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范民声等给《文汇报》的信,1965年11月29日《文汇报》。

② 羽白:《海瑞罢官》基本上应该肯定,1965年12月17日《文汇报》。

③ 羽白:《〈海瑞罢官〉基本上应该肯定》,1965年12月17日《文汇报》。

④ 复旦大学赵少荃等给《文汇报》的信,1965年11月29日《文汇报》。

⑤ 马捷:《也谈〈海瑞罢官〉》,1965年11月30日《文汇报》。

题”。

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同时发表周恩来定稿的按语。按语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服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根据彭真的布置,为了不致震动太大,《光明日报》于12月2日才转载姚文。编者按语也强调:“应该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充分的讨论,以便分清是非,坚持真理,克服错误。”

12月27日,吴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他对学术讨论和批评表示欢迎,然后列出事实,说明研究海瑞并非影射庐山会议,并对一些学术问题作了说明和解释。

1966年2月3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当时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讨论的结果整理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提出,对《海瑞罢官》的讨论是学术讨论的性质,并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然而,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毕竟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政治斗争,在这种斗争中,无论是群众的反对,报刊的冷谈和抵制,吴晗的辩白,还是中央领导层彭真等人的抗争,其结果都是一样。

在上海,按照张春桥一伙的预谋,把“蛇”引出洞之后,就扯下学术讨论的面纱,把所谓“讨论”变成一边倒的政治讨伐。江青、张春桥还密令关锋、戚本禹到上海,密谋围攻吴晗。关、戚回京后,相继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等文章,展开了对吴晗的南北“围剿”。

3月中旬,毛泽东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

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①。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多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批评《二月提纲》。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从不要批准,而发表姚文元文章,却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批判彭真,并决定起草一个通知,撤销《二月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4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撤销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的决议。

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按照毛泽东在会前的部署和安排,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进行了揭发批判,给他们加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罪名,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

^① 中央农村工作部被说成“10年来没做一件好事”,于1962年被撤销。

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问题。会议通过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5月16日通过，又称《五·一六通知》）。该《通知》称：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为了宣传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解放军报》还于5月4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声称当前文化战线上的大论战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同吴晗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5月8日，《解放军报》又发表了江青秘密组织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北京市委及其领导下的《前线》杂志、《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同日，《光明日报》也发表署名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该文污蔑北京市委宣传部长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污蔑《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这篇文章污蔑邓拓、吴晗、廖沫沙“合股开了黑店”，继《海瑞罢官》之后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地向党进攻。文章宣称“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的指使，受到什么人的支持，受到多少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它们”。自此，以“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契机，一个以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批判”、“围剿”吴晗和所谓“三家村”的运动，从中央推向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揪“三家村”、“四家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各

省市、自治区、各机关，都在抓“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神州大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终于发展至以打倒一切、全面内乱为显著标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

林 蕴 晖

众所周知，七届六中全会是以批判“小脚女人”、加速农业合作化而载入史册的。问题是这场反“右倾”运动在当时何以能发动起来？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总结的。

会议的背景和简况

问题是由对 1955 年春季农村紧张形势原因的不同判断引起的。

邓子恢认为，农村关系紧张，固然是有农民小生产者对社会主义改造相抵触的一面，但主要是工作上的行政命令作风，违背了自愿互利政策。而这又是因为 1954 年冬季，农村基层任务过重：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对私改造，三管齐下。所以他指出，这三项任务都是造成紧张的带根本性的因素。而其中最根本的是合作化，因为，合作化是要根本改变个体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据此，他提出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是：必须搞好，必须慎重，必须稳步前进。

毛泽东认为，春天农村关系紧张，主要是富农、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改造反抗的表现。亦即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尖锐表现。因此，他主张，在粮食征购数上可减少一点，作点让步，但合作化不应放慢速度，而应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应当利用广大农民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产还不富裕的状况而希望变革的心态，从速引导他们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才能使农业的发展适应工业的需要。

邓子恢则认为，整个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速度相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还是打基础时期，农业技术改造的速度可能很慢，合作化还是手工劳动为主。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使农业生产有比较显著的发展，超过一般富裕中农水平，就必须认真把经营管理搞好。而要做到这些，在办社的初期阶段，各种条件很差的情况下，过多过猛的发展，是不适当的。他主张合作化运动，应由点到面，积极而稳步地分批分期展开。这样做，当前看似乎缓慢一些，但从整个来看，会是更快一些和更好一些。

毛泽东坚持认为，只有他的主张才是有利于向社会主义发展，因而也是符合广大农民利益的；而邓子恢的主张则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因而是不符合广大农民利益的。他在1955年7月31日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把这种不同意见上纲为“两条路线的分歧”。

尽管毛泽东7月31日的报告事实上已成为党中央的主导意见，但终究还只是个人意见。为了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这个报告上来，有必要召集一次中央全会并作出相应的决议。

1955年9月5日，毛泽东致函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请小平商少奇同志”，对他起草的中央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加以斟酌修改，印发各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用电报发各省市和地委。7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明确会议议程两项：（甲）讨论和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乙）讨论和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代表选举工作的决议。通知还明确六中全会是一次扩大会议。列席会议的同志，有发言权，无表决权。并要求参加的同志立即开始准备发言稿。

六中全会（扩大）于10月4日至11日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8人和候补委员25人。上海局书记，北京、天津、上海市委书记，各省、自治区和地委书记，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388人列席会议。会议第一日，在毛泽东主席宣布开会以后，由中央委员陈伯达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

明》，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有80人，167人作了书面发言。10月11日，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同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大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结论性讲话。

会上的重要发言

刘少奇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比民主革命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得多的革命。

他说，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是从规定党的总路线以来，为进一步地贯彻实现总路线而斗争的一个极关重要的历史文件。

他指出，我们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这个革命，就它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比民主革命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得多的革命。民主革命曾经是一场长期激烈的武装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则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农业、手工业及其他个体经济为集体经济，消灭富农阶级，并消灭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要永远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的革命。虽然这个革命在我国是通过“和平道路”去进行的，但它终究是一场激烈的深刻的阶级斗争。我们正处在这场斗争中间。城市中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早已到来，农村中全国性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但是我们有许多同志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却还是不够的，因此，他们在领导这个革命的斗争中就表现了信心不高，决心不够，劲头不足。另有一些同志则在斗争中表现了不可容许的犹豫和动摇，甚至被群众运动吓昏了头脑，从而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这在目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是表现得特别明显的。

他强调指出，我们从这里应当得到一种严重的教训：共产党员

要善于分别社会上各种人的意见,在听到各种叫喊的时候,要注意是什么人在叫,是代表什么人在叫。如果是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在叫,有余粮的人在叫,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在叫,我们听到这种叫喊,就要小心,不但不应当跟着叫,并且要在研究之后加以揭发,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最近在粮食问题和农村问题上所作的揭发一样。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吸取这一次的教训,那就更要增强我们抵抗各种谣风和错误意见的力量,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种动摇。

周恩来着重阐明了怎样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他说:

从农村中正在走向改革高潮联系到全国正在经历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我想讲一讲怎样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问题。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我国革命已由前一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到目前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早就提醒我们,要准备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我们过革命战争的关,过土地改革的关,都过得很好;现在,我们过社会主义这一关,也必须而且应当过得很好。

不能认为我们全体共产党员对于过社会主义这一关都已经有了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有一些同志原来是抱着赞成我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态度来参加党的,一到同党走完民主革命这段路,他们便不愿意继续前进了。有一些同志平日熟悉的只是民主革命的纲领,全国解放以来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注意去熟悉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因而便迷失了方向,丧失了对新鲜事物的感觉,表现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某些动摇。有一些同志虽然接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但是由于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对于中央的方针和路线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对于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不足,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客观过程也缺乏认真的研究,因此他们就在这样或那样的工作上发生抵触情绪,并在革命高潮面前惊慌失措起来。同时,还有一些人,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腐蚀,变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阴谋手段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俘虏,直接走上了政治上堕落和背叛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

种种情形，应当引起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的严重注意。

在这个阶段，我们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集中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上。我们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而资产阶级却要求放慢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企图多多保存和发展资本主义企业。我们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而资产阶级却要无条件利用，反对限制和抵抗改造。我们要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资产阶级却采取各种方式通过地主分子和富农，影响富裕中农，企图破坏或推迟这种改造。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党内曾经出现过城市依靠商人亦即依靠资产阶级、农村容许四大自由亦即容许自由剥削的资产阶级论调，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同时，也可看出，在我们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并且要经过联合它来达到消灭它的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全党同志是多么需要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提高马列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并从实践中磨练自己，来很好地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使所有共产党员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并且经过他们逐步教育广大劳动人民，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首先就需要在共产党员中，大张旗鼓地并且极其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也就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在全党能够很好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是会愿意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的。

但是，要过好这一关，单靠有这个理论还不行，需要在实践中考验。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最带根本性的问题，是同资产阶级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由于我们党现在处于当权地位，对资产阶级是采取经过联合达到消灭的政策，同时在社会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象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而我们党内出身于小生产者阶层的党员还占很大的比重，他们又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保持有广泛的联系，这样，资产阶级思想便不会不经过他们传播

到党内来，以动摇、阻碍甚至破坏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这种斗争是极其尖锐的，也是逃避不了的。……资产阶级对我们党内的影响是会不断发生的，我们必须有准备地在长期的实践中来肃清它。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全党有了精神准备，全党保持团结和统一，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在实践中学会了如何战胜资产阶级和它的影响，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是能够过好这一关的。只有那些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那些不堪造就的蜕化分子才会被历史前进的列车所抛弃。

朱德发言强调要贯彻决议，迎接高潮。他说，

毛主席的报告和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是过渡时期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希望同志们很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报告和决议及有关文件，并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加以贯彻。如何贯彻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呢？……各级党委书记，必须牢牢地站稳自己的工作岗位，劲头十足地亲自领导和研究这一工作，切切实实地把自己变成内行。必须学会在不同问题上贯彻自愿、互利原则；在不同季节、不同作业上加强生产的经营和管理。总之，要具体，不要空洞，不要浮夸。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我们要预见到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以后，农村中将必然出现许多新的情况。对于这些新的情况，我们应该及早研究准备，采取有效的措施紧紧地跟上。……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乡政权任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政权的组织领导和文教，财政工作，都将引起重大的改变。乡政权的组织形式应当适应农业合作化的要求，领导作风应该更加深入细致。基层干部应该具备农业科学的知识，农民群众对于文化教育，卫生福利等要求增加，乡政权应逐步建立和筹划。凡此种种，都需要及早进行研究，预先准备。总之，各级党委，各级国家管理机关和各有关部门，都应该研究和改进自己的工作，使自己的工作适应这种新的情

况,从各方面来支援和保证农业合作化的发展。

陈云:农业的发展要适应工业化的需要,要适应国家计划经济的需要。

他指出: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部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重点是重工业,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农业生产不但供应全国人民的食粮,而且工业设备和建设器材所需要的外汇,绝大部分是以农产品出口换来的,用农产品作原料的工业产品占目前国家工业产值的50%以上。农村经济发展了,也就更加扩大了我国工业品的市场。因此,我国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必须发展农业,必须用多种方法来增加农业的产量,使农业能够适应、或者至少不落后于工业的发展。

他说:增加我国农业产量的方法是很多的。例如,我们可以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等,但是大规模的开荒,像开垦4亿亩荒田,还不是最近几年所能办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们正在尽可能开垦荒地,但是能够垦出不到1亿亩,兴修水利,无论是大型的或者小型的,都是需要的,而且我们将尽力推行。但是短期内,也不可能大量增加灌溉面积。就目前的需要和可能来说,增加农业产量的主要办法,无疑是实现农业生产的合作化,只要把分散的小农经营组成几十户或更多户的联合经营,就能使个体农民难于单独进行的种种措施,得以实现。如果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建设的头一、二年内,没有拖拉机,仍旧使用畜力和现有农具,一般可以增产20%的话,那末,单单这一项,在全国农民组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就可以增产粮食6—7百亿斤。在目前,这是一种投资最少,收效最大、收效最快的增加农业产量的办法。也只有把小农的经营组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才有可能在具备了客观条件以后,使我国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

他还指出:把农民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面,这不但是目前增加我国农业产量的主要办法,而且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知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全体农业实行社会

主义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在变革生产关系方面的两项根本任务。在这两项任务中，由于农民的数量特别大，改造农民的任务尤其繁重。只有在农村社会主义化了之后，我们才可以说，社会主义确实战胜了资本主义。

邓小平着重阐明了工农联盟问题，他说：

因为对合作社问题抱着右倾观点的同志的重要论据之一是怕破坏工农联盟。究竟农业合作化是有害于工农联盟呢？还是有利于工农联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工农联盟的基本条件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目的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是为了反封建革命的彻底胜利，在现阶段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既然我们所要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工农联盟，那么为了巩固工农联盟，我们的党就应当明确提出合作化的道路是农民继续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生活的唯一道路，并且用事实来向农民证明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就应明确依靠贫农的方针，热情地支持广大贫农和下中农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在合作社中树立贫农的优势，就应当不断地用说服的方法，并通过事实来克服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动摇性，同时采取各种经济措施（例如实行统购统销、办供销合作社、办信用合作社等）来割断他们同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扩大社会主义阵地，缩小资本主义阵地，这样来达到团结中农一起走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毫无疑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巩固的工农联盟。反之，如果我们迁就富裕中农，抹杀贫农和下中农的利益，那就是既损伤了贫农和下中农群众的积极性，也不能使还在动摇的中农坚定起来。巩固地联合中农当然是工农联盟的一个基本内容，但是，如果采取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结果不但贫农会对我们失望，而最后连中农也会离开我们，因为按照这种方针，结果只能是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自由发展，而发展资本主义只是有利于极少数的富农，对中农群众甚至对大多数富裕中农都是不利的。由此可见，如果执行这个错误方针，结果决不会是什么工农联

盟的巩固，而只能是彻头彻尾地破坏了工农联盟。

彭真强调，农业合作化是一场革命的群众运动，不可能按照画好的格子沿着一条直线前进。他说：

目前，在农村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很尖锐的，阶级关系是紧张的。在过渡时期中，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农村中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将总是相当紧张的，虽然紧张的程度有时不同。我们对于这种形势加以分析和估计是有好处的，免得临时因为缺乏精神准备和工作准备，惊慌失措。

他认为，如果只是富农和少数富裕中农叫嚣，那还不要紧，严重的是一般中农因为是私有者，有个人发财的幻想，有时很容易受富农、富裕中农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中有一部分党员，在土地改革以前是贫农，现在“发了财”了，他们中间有些人有时也叫喊得很凶，他们的叫喊最容易影响我们，往往使空气显得特别紧张，使问题表现得特别严重和复杂。我们必须估计到，现在抵抗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逆流不但有它的社会基础，而且在党内有它的支持者……。因此，就在党内形成一种相当紧张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党内发生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个最后彻底消灭农村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富农阶级的斗争，是五万万农民群众的一个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运动，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地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因而可以彻底地消灭一切城市资本主义痕迹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很早就已经提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而是劳动群众大手大脚的激烈的斗争。这样一个由五万万农民所进行的震撼全世界的群众运动，绝不可能象有些人所幻想的那样，会在一切方面都按照画好的格子沿着一条直线前进，它必然还会发生一些“左”的或右的偏差和大大小小的乱子。……我们必须遵从着中央、毛泽东同志所屡次给我们的指示。在战略上坚决地勇敢地毫不迟疑地前进，藐视一切敌人的反抗和工作中的困难，在实际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地分析

具体情况,谨慎从事,决不可粗心大意。只要这样,我们就可以少犯错误,少出乱子;犯了错误,出了乱子,也可以及时克服,保证运动完全健康地发展。

毛泽东结论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他说,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

他强调指出,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工农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的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种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呢,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他还说,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的性质错误。同时指出,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只要虚心,愿意接受同志们的帮助,我们相信他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

农村工作部的检讨

邓子恢在会上发言,从五个方面作了检讨:

(1)中央农村工作部在我主持之下曾于1953年及1955年春间先后犯了两次原则性的错误,1953年春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曾经把农村工作中的“五多”问题和反对互助合作运动中错误的“贪多贪大”“急燥冒进”的问题混在一起,对于合作社发展计划未作布置,片面强调“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稳步前进”,结果变成“宁缓

勿急”“稳步不前”，从而形成合作化运动在一个时期内的自流倾向，并引起某些地区解散合作社的混乱现象……。到了今春，当整个合作化运动已取得巨大发展，局部地区出现了高潮，全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本来应该采取一个积极发展的方针以推动这个高潮，但我对合作化运动发展却采取了相反的、消极的、错误的指导方针。在新区有条件大发展，我却主张小发展，主张先慢后快，主张严格控制；在老区还可以再发展（特别是空白乡村和发展不够的地区），我却主张停一年以后再说，合作化发展较多的省份虽然当时发生一些问题，但只要加强领导，端正政策，作好工作，绝大部分是可以巩固的。我却主张“适当收缩”，这种错误方针是同中央方针完全相反的是违背中央路线的，是脱离群众的，特别是在收缩方针的影响下有些地方发生了强迫群众退社，强迫群众解散合作社的严重情况，大大挫折了干部和贫农、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这种类似革命时期解散人民游击队的令人痛心的极其错误的行为，应该完全由我负责。这种错误方针幸得中央及时纠正，所以在实际工作已发生的不良影响，这也应该由我完全负责任。

(2)为什么会提出这种错误方针呢？主要是由于我在思想上的右倾，这种右倾思想，首先是对于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估计不足，……当时反映到我思想上的正是占人口20—30%的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动摇抵触情绪……。其次是对党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估计不足。……这就是我的右倾思想的另一表现。正是由于上述的错误估计，当然对于即将到来的农村中的全国性社会主义革命大高潮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估计，也不敢去估计。

(3)此次错误除上述右倾思想之外，还由于我长期存在下述两个机械论点：首先是不适当地简单地过分地强调土改可以较大胆迅速，而合作化则必须谨慎小心，必须慢慢来。因而始终不敢提放手发动群众的口号，固然社会主义革命是要触动一切私有制，不仅要逐步消灭富农，而且要改造一切农民私有制，从而是它的震动面

比之土改要大一些,因此谨慎小心是需要的……但应该估计到,我们目前的农业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土地仍然可以分取报酬,而又坚持互利自愿原则,我们只是打击富农而不是中农……,而且在土改中我们已经充分发动了农民群众,打下了群众基础,土改后又有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有了城市工业和国家财政支援,这就给合作社增加了有利条件。这些有利条件过去我们也是估计不足的。从而不适当的过分强调了“合作化运动要比土改难”“比土改慢”,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这是第一个错误的机械论点。其次是过分强调“发展容易巩固难”“建设容易办社难”,这也是不对的。……我是在困难面前退缩,而不是鼓起勇气去克服困难。这也是第二个错误机械论点。

(4)为什么我会产生这种右倾思想长期的存在而不能改变?今天认真检查起来,应该指出它的根源正是一部分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动摇抵触情绪在我思想上的反映。……因此,我的错误思想,其本质是资本主义思想隐藏在脑子里作怪,模糊了社会主义思想,克服不了资本主义思想。这就是我对广大贫农和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熟视无睹不去爱护它,而却与此相反,敢于挫折它,从内心去对他们“泼冷水”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富裕中农的动摇抵触情绪,很容易影响我的决心,而不敢去克服它的根本原因。这种资本主义思想不清除,我的错误是无法加以根绝的。

(5)我此次错误之所以形成,还由于犯了组织纪律的错误。某些重大问题,如浙江省合作社收缩的方针,未请示中央,即擅自对该省农村工作部发出电报。今年5月初,主席初步发现我的错误即提出警告,要我不要犯1953年的错误,再来一次检讨,当时我对这个警告并未引起警惕。6月间中央政治局否定了农村工作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合作化运动的指示,我思想上仍然有抵触,7月中间,主席召集我们几个人作了严正的批评,我也未完全想通。我总以为我只是在合作社发展速度问题上同中央存在不同意见,而未认识到这是方针路线的不同。直到7月31日看了主席《关于农业

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才开始转变过来。这说明我对中央意见是采取了十分不尊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态度,也说明我在组织上何等严重的何等危险的分散主义错误。

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也在会上作了检讨。他说:

从骨子里看,还是从 1953 年残存下来的安于小农经济现状的思想作祟。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反映着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对小私有制暂时性的满足情绪和对社会主义的抵触。……1954 年冬天,有些省发展合作社的速度比一般地区稍快,我就无根据地认为那里定有比较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违反了群众自愿原则的情形,就主张“停止发展”或“坚决收缩”。

由于误认为发展很快的地方即将出现损失,所以就有勇气去坚决收缩。结果是在本无损失的情况下,无故制造了重大的损失。象浙江所发生的收缩了 15000 个合作社所引起的那种大损失,我是应当负很大责任的。因为虽然在事先,中央农村工作部对省委农村工作部作过收缩合作社的建议,但是我亲自去宣传了“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我为了说明坚决收缩的必要性,曾宣传了许多错误的道理,象“合作社发展太快是造成农村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下马恐怕有一批社要减产,影响工农联盟”等等。我当时的工作态度,完全是靠自己的错误成见去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当地客观实际情况出发考虑问题。我受部委托到河北省商量停止发展的方针,也有类似的情形,也同样负有应有的责任。

10 月 25 日,杜润生又再次向中央报告,进行检讨。主要内容是:一、一些具体的错误事实;二、我的错误从政治上说,是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激烈变化时期,阶级立场发生了动摇;三、中央农村工作部在 1953 年和 1955 年两次工作错误中间都同时犯有对中央的分散主义错误。这种分散主义错误中我同样是有很大责任的。

历史的评述

七届六中全会，在50年代是以迎来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载入史册的。

1955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完满地实现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的社论中说：“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经过详尽的讨论，经过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全国各省市和各地委的领导同志充分地认识了中央的方针的正确性，并且对农业合作化的伟大前途充满了信心。”“根据各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七届六中全会对农业合作化的许多基本政策和工作方法都作了妥善的决定。完满地执行这些决定，将使党在农村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中有保证取得伟大的胜利”。

历史的发展正是如此，七届六中全会不仅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整个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全会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进而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以至这样的事实，在当时又被用来证明：中国的工业化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经过历史的检验，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指出，1955年夏季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邓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对他的这种批判，曾导致以后合作化运动高级化和人民公社化等急躁冒进的错误”。“把这些问题当作是挑起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争论，而给予斥责和批判，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中央原来制定的、体现于两个互助合作决议文件的正确方针，损害了党内民主讨论和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助长了业已存在的‘左’的思潮，给农业生产带来以后长时间的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从

组织上说,当时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所作的工作部署,都是事先向中央请示报告,得到同意后才进行的。在中央作出不同于自己的决定后,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从来没有过非组织活动;而且,即在当时提意见的方式,也是符合党规党法的。因此不存在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的错误”。

对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平反,可以被认为经过实践检验以后,对七届六中全会的历史评估。

问题是当年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何以会形成一种一面倒的局面?应该承认,在50年代上半期,党内的政治生活,总的来说,基本上还是正常的。但从会上发言的内容来看,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又是一致的。如:对农民自发倾向,尤其是对富裕中农自发倾向的担忧;把劳动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与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等同起来;把贫富差距的相对扩大与两极分化等同起来。与之相应的是:关于个体农业的出路;当前得以迅速提高农业生产产量的途径;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关于新时期工农联盟的基础;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革命的群众运动;等等。集中到一点,就是实现农业合作化,是当时解决一切矛盾的焦点。即只有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才有可能实现我国几千年来个体小农经济向集体化大农业的过渡,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获得彻底解放;才有可能使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获得巩固;才有可能迅速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并将其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使农业的发展适应工作化的需要;才有可能最后消灭农村的富农阶级,孤立并消灭城市资产阶级;才有可能顺利地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因此,农业合作化是大发展还是小发展,就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即所谓两条道路的问题了。由此可见,根本问题,是一个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诚如邓小平在1984年6月30日同外宾的谈话中指出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形成发展大事记(之四)

(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继续深化发展

(1992. 10—1993. 12)

概 述

以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和以这一谈话为灵魂的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新的科学概括为标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完成了这一理论的基本形成阶段,并随之进入一个继续深化发展的新阶段。之所以说它还要继续深化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一理论实践的时间还不长,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可能还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同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还很多。因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还有待充实、发展和完善。但是,仅仅是14年的实践——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不断完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已经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确是深刻揭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科学的革命理论。毫无疑问,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

的十四大所开辟的新的发展阶段的实践中,这一理论将会继续接受新的检验,得到新的发展,并将继续指导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在新的发展阶段刚刚呈现出壮丽开端的时候,有四件大事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二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和闭幕。八届人大产生了新的国家权力机关,选举了新的国家领导人选,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对我国经济建设作出的安排和步骤,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基本路线,明确载入我国的根本大法,使之成为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这是我们事业和我们国家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实现发展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三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及《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次全会上的被顺利通过。这一《决定》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的原则,既有比较完整的总体设想,又紧紧抓住当前改革和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做出了在当前实行重点突破的改革安排;既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吸收和借鉴了国外的成功经验,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总结了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既反映了抓住时机、加快建立新体制的紧迫性,又考虑到建立和完善新体制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注意到它的渐进性。以《决定》的通过为标志,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设计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蓝图,从而使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开始具体化。以《决定》的通过为契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向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自此开始全面地整体性的向前推进。四是在199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适应了改革开放形势对执政党建设的时代要求,明确回答了在当前如何把党

建设成为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按照这一决定建设我们的党,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有胜利保证;党就能率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迎来充满希望的崭新的二十一世纪。

政 治

1992年10月

10月27日 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座谈会,座谈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江泽民总书记向与会人士介绍了中共十四大的情况。江泽民讲话指出,党的十四大的重大收获和主要特点,就是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14年来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重要成果做出了郑重结论,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对90年代的主要任务做出了部署,同时明确确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明确确定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他说,十四大是一个团结的在会,胜利的大会,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会。他强调大政方针、目标任务都明确了,关键是真抓实干,狠抓落实。当前第一件工作就是要领导和抓好十四大精神的学习、宣传和落实,真正使它变为广大干部群众自觉的实际行动,变为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同日 国家人事部部长赵东宛在北京举行的七届全国政协第21次常委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介绍了行政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思路和设想。他阐述了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总的指导思想是要围绕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进行,必须有利于加快改革开放,搞好大中型企业;必须有利于组织和培育市场;必须有利于加强宏观调控,提高效益。他还谈到了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的六条具体原则,即:1.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做到政企公开;2. 要围绕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下放权力,真正推动企业进入市场;3. 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尽快形成统一的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4. 理顺各方面的关系,完善行政运行机制;5. 大力精兵简政,提高工作效率;6. 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行分类指导。

10月30日至11月7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传达了党的十四大的精神,并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发展经济必须既靠科技又靠教育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两法于1992年11月7日由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公布,并将分别于1993年7月1日和1993年5月1日起施行),表决决定我国加入《保持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许可复制其录音制品公约》,批准了《中国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领事条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批准了人民解放军选举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名单和任免名单。全国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和人大代表还在大会上指出,香港总督彭定康在其施政报告中提出的“宪制方案”严重违背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和接受的。

11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京约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这次座谈的中心议题。在座谈中,李瑞环强调,必须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统一战线工作。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所谓基本制度,我理解它是长期的制度,是影响其它许多制度的制度。

今后我们要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也必须依靠这个制度。他指出,中共十四大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确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用这一理论指导统战工作,我认为至少要研究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这一理论有关统战工作的内容;另一方面是如何更好地为根据这一理论所确定的总任务服务。他还指出,最大限度地团结人,是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各民主党派可以在实现最广泛团结的任务中,发挥特殊作用。

11月19日至12月30日 我国8个民主党派及工商联先后在京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要求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各自制定了新的章程,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

11月22日 李鹏总理在京就县级机构改革问题回答了《瞭望》周刊记者的提问。对这次机构改革为什么从县级开始这一询问,李鹏回答说,从国家机构职能方面讲,县一级是城乡工作的结合部,在行政管理层次中处于基础地位,加之县级经济市场调节的比重大,受计划影响较小,改起来比中央、省、市容易些,因此,是机构改革比较适当的突破口。他还指出,进行县级机构改革的目标,总的说,就是转变职能、精简机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并强调说,机构改革势在必行。搞好县级机构改革将会对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一定要切实抓紧抓好。

12月12日 国务院授予人民警察警衔仪式在北京举行。李鹏总理为总警监、副总警监和一级、二级警监代表51人颁发了授予警衔命令证书。

12月14日至19日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研究全国政法战线贯彻落实十四大精神的重大举措,部署1993年工作。江泽民总书记同会议代表举行了座谈,他强调,党的

十四大对政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政法部门的任务更加繁重。政法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搞好社会治安工作,对于保障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的极其重大的作用,以高度的责任感承担起维持社会稳定的光荣政治任务。会议确定的1993年全国政法战线的主要任务为:认真贯彻落实十四大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革政法工作,强化人民民主专政职能,坚决打击敌对势力和各种犯罪活动,落实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多渠道、全方位的法律服务,保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12月24日至25日 中南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在湖北武汉举行。江泽民总书记与会并就必须坚定不移地牢固树立农业是基础的思想,切实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强宏观调控能力,以及全面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等4方面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他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无论是各级党委还是全党同志,无论是主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部门还是其他部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千万不要忘记党确立的这些重要指导思想,必须坚持不懈地把它们贯彻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而绝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他还要求全党和各级干部全面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把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真正落实到基层,及时发现和妥善解决农村发展中的问题,诚心诚意地为农民谋利益,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而努力。

1993年

1月8日至12日 全国青年干部锻炼成长经验交流会在武

汉举行。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专程赴会听取大会发言,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青年同志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接好老一辈英勇革命斗争精神的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他还要求青年干部从五个方面努力提高自己:第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正确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第二,要有必要的理论素养。第三,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工作中脚踏实地不断开拓创新。第四,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五,要谦虚谨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团结同志,顾全大局。会议期间,他还同与会同志就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党的建设这一问题进行了座谈,并在闭幕会上专门就党建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他指出,要更好地发挥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作用,党的自身建设必须改进和加强,绝不能削弱和放松。他强调,新时期党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坚持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遵循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抓住了这一条,就抓住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根本。他说,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建设党,必须牢牢把握三点。第一,一定要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建设党,使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都符合并体现基本路线的要求,努力把党的各级组织建设成为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强核心。第二,一定要密切联系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践开展党建工作。第三,一定要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成效来考察党建工作。归根到底,党的各方面工作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党建工作也应当以此为标准。当然,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工作还要有一些具体要求,而这些具体要求都应该符合和体现这个根本标准。他还指出,要做到围绕经济建设抓好党的建设,抓好党的建设服务和推动经济建设。并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建工作主要应抓好十四大提出的各项任务的贯彻落实。他强调,要把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作为首要任

务切实抓好,以此来带动党的建设和其它任务的贯彻落实。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紧密联系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力求完整准确地理解十四大报告阐述和概括的九个方面的内容。特别要紧紧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使学习和教育的过程,真正成为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在观念上除旧布新的过程,在工作上开拓前进的过程。

1月10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联合发出《关于在基层党员中深入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的通知》。通知指出,在广大基层党员中深入进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教育,进一步用这一理论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对于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和建设步伐,全面完成十四大提出的战略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1月11日至16日 十四大后第一次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贯彻十四大精神,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宣传思想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推动宣传思想工作迈出新步伐,登上新台阶,做出新贡献。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宣传思想工作,是会议讨论的核心问题。会议认为,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是宣传思想战线最重要的任务,这是整个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只有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运用于宣传思想战线的各个方面和全部工作中,并通过深入持久的学习宣传,使这一理论在全党同志尤其是高级干部头脑中深深扎根,宣传思想工作才能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促进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会议期间,江泽民总书记于1月15日同与会同志进行了座谈,并就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始终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不断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思想保证,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环境。

他还在谈了当前形势和宣传思想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之后,明确要求,宣传思想工作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广大群众的聪明才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他对宣传思想工作战线的同志提出了四点希望:1. 要坚持抓好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宣传教育,这是我们在新时期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和中心环节。在这个基础上,当前还要加强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加强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宣传教育,加强团结的宣传教育。2. 要保持宣传思想工作的鲜明性的特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应该提倡什么、发扬什么,应该反对什么、限制什么,不但我们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们和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小平同志的理论观点、战略思想,自己首先要认识得十分明确十分清楚,并身体力行,而且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也弄得很明确很清楚。3. 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加强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要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重点是学好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时要努力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当代科学、技术、管理和文化知识。4. 要大力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加强需要改进,在改进中实现加强。首先要抓好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注意继承和发扬过去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好的传统、好的经验,又要大胆在新的实践中探索新的途径、方法、手段,积累新的经验。

1月11日至13日 全国省市区纪委书记、监察厅(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是传达并落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中央纪委、监察部自1993年起开始合署办公的决定。合署后实行一套工作机构,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督两项职能的体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书记兼监察部部长尉建行在会

上专门就此指出,中央决定中央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这是我国党政监督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是适应加快现代化建设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和强化行政监察机关职能,并使之形成合力的重大措施,以便能够更加集中力量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他还指出,合署后的中央纪委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两项职能,对党中央全面负责。合署后的监察部,依照宪法规定仍然属于国务院序列,接受国务院领导。监察部部长、副部长的任免,仍按有关法定程序办理,地方各级监察机关在合署后,继续实行由所在地政府和上级纪检监察机关领导的双重领导体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规定的职责、权力和工作程序开展工作。他还强调,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监察部和各级监察机关领导职务的制度继续坚持执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应以改革的精神加强业务和队伍建设,更好地发挥监督检查的职能作用,为维护政治稳定,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1月13日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巴黎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并在签约后发言,向参加签约大会的100多个国家和代表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1月15日 在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发表1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向全国发行。该书选录了邓小平同志从1977年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1992年2月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谈话这段时间内,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

同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在于北京召开的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同时还评选出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草案)。这标志着澳门按一国两制方式回归祖国的过渡时期,进入了新的阶段。

1月22日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农历除夕之夜与上海各界人

士共迎全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春节。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在邓小平同志会见各界人士的大厅里向他转达江泽民总书记的电话问候。邓小平在请吴邦国代他向江泽民和中央同志拜年后，高兴地对参加会见的同志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小平同志并对上海人民 1992 年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说：“上海人民在 1992 年做出了别人不能做到的事情。当然，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有一点小的损失不要紧。回头总结经验，改正缺点就是了。你们上海去年努力了一年，今年再努力一年，乘风破浪，脚步扎实，克服困难更上一层楼。”邓小平同时还指出：“实践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工作做得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同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我国以宪法为中心、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建立。在过去 5 年中我国立法步伐明显加快，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 5 年任期中共制定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补充规定 80 多件，占党的十一届立法总数的 41% 左右。在这些法规中经济方面的约占 1/4 左右，尤其是出台了一些经济方面的重要法律。如宪法修正案中关于私营经济和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土地管理法修改等。在 5 年中，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速度也明显加快，制定了著作权法，修改了专利法，并参加了世界版权公约、保护文学作品的伯尔尼公约和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的公约等。

2 月 8 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主要形式之一的提案工作 5 年来取得新成绩。据统计，自 1988 年以来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共提出提案 9627 件，其中许多提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采纳。在上述 9627 件提案中，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 3389 件，占 35.2%；有关科技教育方面的 2888 件，占 30%；有关政法、劳动人事方面的 2070 件，占 21.5%；有关统一战

线、民族宗教、侨务方面的 1280 件,占 13.3%。

2月1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建议内容有八点。这些建议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深化了的认识。建议将在提请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后再提交给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2月15日至22日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决定这一会议于 1993 年 3 月 15 日在北京召开,并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为: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 199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1993 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政(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听取和审议《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选举国家领导人和决定国家机关的领导人选。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也在这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并将被提交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商标法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和《产品质量法》等四项法规。四项法规旋即由国家主席杨尚昆于即日签署主席令公布实施。会议最后通过了若干领导任免名单,并决定将经审查有效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人民解放军等选举单位选出的 2977 名八届人大代表名单予以公布(原选出 2979 名代表,有 2 名在选出后逝世)。在 2977 名代表中工人农民代表有 612 名,占代表总数的 20.55%;知识分子 649 名,占 21.8%;干部 842 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 572 名,人民解放军 267 名,归国华侨 36 名,分别占代表总数的 28.25%、19.21%、8.97%和 1.21%。代表中,中共党员 2036 名,妇女代表 626 名,少数民族代表 439 名,分

别占代表总数的 68.37%、21.03%和 14.75%。全国 56 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代表,因而八届人大的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2月16日 中共中央把经过民主协商提出的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人选建议名单提请至全国政协七届常委会协商决定。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并受中共中央委托,向即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七届常委会第 22 次会议作了说明。他指出,建议名单是经过充分酝酿、反复协商而提出,大体反映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新特点。他说明名单具有下述特点:1. 贯穿为经济建设、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思想。为适应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这次对政协界分别作了适当调整,增设了 80 余人的“经济界”。2. 新老合作和交替有新的起色。在委员人选,七届委员继续提名的占 49.67%;新提名的占 50.33%。3. 委员人选有广泛的代表性。在名单中,少数民族委员人选比七届一次会议增加 19 名,民族成份由 46 个增加到 56 个,各民族都有代表人士参加全国政协;有妇女委员人选 283 名;有在两个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有近年涌现的爱国、敬业、守法又有一定实力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物;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中的知名人士有较大幅度的增加,香港地区的委员由 57 名增加到 81 名,澳门地区由 7 名增加到 19 名;还有一些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的外国血统的中国籍人士。4. 委员人选的知识层次高。名单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 1321 人,占总数的 63.2%;有高级职称的 1175 人,占总数的 56.1%。在名单的协商中,特别注重安排了一些经济、法律方面的专家和经营管理的行家,还注重安排了一些在对外联系上有贡献的人士。进一步提高了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整体水平。

2月16日至19日 全国政协七届常委会第 22 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作出了 3 月 14 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的决定,通过了中共中央建议的八届政协委员人选名单和修改后的七届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还通过了七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

关于七届五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2月23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北京接受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总编辑莫蒂默·朱克曼的采访,就中美关系、香港和台湾问题以及中国的经济形势等问题回答了客人的提问。在谈及中美关系时,江泽民说,中美间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分歧。近年来,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客观现实仍需要中美之间加强和扩大互利合作。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对双方都很重要。这就要求两国领导人在处理两国关系时,一要有长远的眼光,需要看到,两国不论在双边关系方面,还是在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方面,都有着广泛而重大的共同利益;二要妥善处理分歧,求同存异,增加信任减少麻烦,不要让分歧来妨碍和损害两国正常关系的发展。在谈及中美关于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时,江泽民说,由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同美国在人权观念上存在分歧是很自然的。世界上很难找到两个没有分歧的国家,最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是我们自己。我国的宪法从根本方面保障了人民的各种权利。中国参加了一系列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赞成国际间就人权问题进行平等对话。我们主张对话,反对施加压力,不造成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向中国施加压力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效的。在谈及中国统一问题时,江泽民说,我们一直主张通过和谈实现中国统一,这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愿。为了早日结束海峡两岸分裂局面,两岸应尽早进行接触与谈判。只要坐下来谈,总能找到两岸都能接受的办法。我们对祖国统一大业的前景是乐观的。我们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尽早实现国家统一。我们不承诺不使用武力,绝不是针对台湾人民,主要是针对“台独”和外国干涉势力。这个主张,是和台湾人民的利益一致的。在回答中国的经济是否过热的问题时,江泽民说,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是好的,发展是健康的。前进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新机制尚未完善所产生的一些现象,对于这些

现象已经引起重视。我们认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也只有不断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我国经济更好更快的持续发展。在谈及邓小平同志的重大贡献时,江泽民说,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他在全国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虽然他现在不再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了,但他倡导的这一伟大理论,是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确立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积极、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江泽民表示,中美贸易潜力很大,欢迎美国企业来华参加竞争。并在谈及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的分歧时表示,希望英方迅速回到中英联合声明的轨道上来。

2月27日 首都各界人士在京举行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46周年座谈会。与会人士指出,方兴未艾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在为海峡两岸的交流与统一提供历史机遇。要把握当前的有利时机,进一步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近几年,海峡两岸各项交流迅速发展,到大陆旅游、经商的台胞1992年达到130万人次,是1990年的3倍多;人员层次也提高到台湾有影响的人士;交流领域从旅游、经商,拓宽到科技学术、文化艺术方面;两岸转口贸易金额1992年达到74亿美元,创10年来最高纪录;台商在大陆投资协议金额1992年也达到40亿美元,超过1981年至1991年台商到大陆投资的总和。发展两岸关系已是民心所向,历史潮流所趋。与会人士还针对最近台湾岛内“台独”活动的新趋向指出:“台独”、“一中一台”没有前途,在国际政治上也是行不通的。中央政府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尊重两岸历史和现状的合理方案。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

度,谁也不吃掉谁,更可以互补互益,共同发展经济,振兴中华。

同日 《光明日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和《公共关系导报》,最近就我国现行改革政策在沿海开放城市青岛进行了千户居民抽样调查。调查发现,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新举措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人民支持和理解改革,绝大多数人给政府目前所推行的改革政策投了“赞成票”。调查表明,支持率最多的是退休福利改革,认为“可行或基本可行”的占75.4%。其次是房改政策,认同率为74.9%,以下依次是公费医疗、劳动用工和物价政策,其支持率分别占被调查总人数的74.2%、69.9%和96.3%。这充分证明,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发表后,人们对社会发展前景普遍看好,认为“全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月28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七届全国人大一至五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共提出建议17693件,在这些建议中,反映政治法律问题的1887件,占10.67%;经济建设方面的8208件,占46.39%;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方面的3469件,占19.6%;民族、民政和劳动工资方面的4129件,占23.34%。这些建议均是人大代表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人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其中已解决或基本解决的4831件,正在解决或已列入规划将逐步解决的7813件,这两项占总建设数的71.61%;因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需待以后解决的3396件,留作有关部门工作参考的1618件。一次到五次会议期间,30名以上全国人大代表和代表团向五次会议提出的议案共2226件。经大会主席团决定作为议案的有437件,转为建设、批评和意见的有1789件,这些建设、批评和意见也已由有关承办单位全部办理完毕并答复了代表。

3月4日 中央党政军领导和首都近千名干部、群众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纪念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发表3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在集会上讲了话。他强调,雷锋精神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过去具有、现在仍然具有重大价值和时代意义。发扬光大雷锋精神,仍然为我们这个时代进步所

必需,仍然为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所必需。他指出,发扬光大雷锋精神,就要象雷锋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就要象雷锋那样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树立集体主义思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就要象雷锋那样艰苦奋斗,勤俭创业;就要象雷锋那样发扬“钉子”精神,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就要象雷锋那样立足本职,忠于职守,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会上并宣布了中宣部、国务院办公厅、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表彰学雷锋活动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这一决定对在学雷锋活动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共青团北京市宣武区委“学雷锋综合包户服务队”等 101 个先进集体和北京市西单菜市场售货员张丽丽等 100 名先进个人给予了表彰。大会召开前,江泽民、刘华清、胡锦涛、丁关根、李铁映等领导同志,还亲切会见了 100 多位新近受到表彰的学雷锋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代表,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3月5至7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八五”计划若干指标的建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全会科学分析了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强调指出,在当前和整个九十年代,抓住国内和国际的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这个指导思想要坚定不移。全会认为,“八五”计划若干指标的调整是必要的、符合实际的,调整后的指标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是能够实现的。全会要求,在经济工作中,要更好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善于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和认真解决前进中的突出矛盾与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经济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全会认为党政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重要条件,必须抓紧进行。机构改革应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为目标,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

简政,提高效率。这项改革,直接关系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要切实加强领导,统筹规划,精心组织,分步实施。全会指出,为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决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强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廉政建设,大力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全会还决定将由中央政治局提出、经过党内外民主协商后形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选名单和全国政协领导人选名单,推荐给即将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全会最后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时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为全面完成党的十四大确定的各项任务而继续努力奋斗。

3月6日 《光明日报》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過去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完善,逐步向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与决策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相当的进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为显著。据统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约94次。其中,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共召开了57次,江泽民或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主持的达37次。

3月10日 《光明日报》报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参加政府工作近几年有较大发展。截止1992年底,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540人担任全国人大代表,1100多人成为全国政协委员。1人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人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0人担任国务院部委副部长,8人担任国务院直属局负责人,12人担任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长(市)长、副主席,6人担任计划单列市副市长,地方各级政府中其他非中共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有6000余人。各民主党派成员有21人被聘为监察部特邀监察员,18人被聘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13人被聘

为国家审计署特约审计员。全国各级特约监察员 4000 多人,特约检察员 466 人,省级特约审计员 195 人。为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作用,中共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

3 月 12 日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在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召开纪念马克思逝世 110 周年理论座谈会。与会者认为马克思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始终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与会者指出,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新的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存在着难得的发展契机。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贵在坚持,重在发展。与会者特别强调,由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继承和重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3 月 14 日 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周觉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本次人代会在推进机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何作为时,周觉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不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取得重大成就,同样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取得重大成就。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多党合作的基本政治制度。14 年来全国人大制定了 200 多个法律法规,基本改变了过去无法可依的状况。目前,我国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有更多的机会参政议政,已有 24 名民主党派人士担任了部省级领导职务。今后还将有更多的民主党派人士参与国家和政府的领导工作。他还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就要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实行公务员制度和政务公开，改革工资制度、用工制度等，本次人代会将推动这些改革的进程。就记者提出的大陆对台政策问题，周觉说，在目前台湾尚未回归祖国之前，我们真诚地希望台湾稳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凡是有利于祖国统一的言行，我们坚决支持，凡是不利于祖国统一的言行，我们坚决反对。我们希望台湾当局能为发展两岸经贸关系和祖国统一多做实事。

同日，中共中央向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议产生的大会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补充建议的主要内容有三条：1. 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末尾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2. 宪法第十五条原修改建议第二款中的“改善宏观调控”，修改为“完善宏观调控”。这一款中的“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修改为“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列为第三款。3. 宪法第十七条原修改建议第二款的“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民主管理”，修改为“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在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指出，1982年制定的宪法是一部好宪法，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宪法的有些规定已经同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况不相适应，需要依照法定程序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说明指出，这次宪法修改，以党的十四大精神为指导，对涉及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的有关规定，必须进行修改的加以修改。修改中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并根据十多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经验，着重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了修改和补充，使其更加符合现实情况和发展的需要。这次修改宪法不是作全面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些问题今后可以采取宪法解释的

方式予以解决。宪法修改方式,继续沿用1988年的修正案方式,同时在出版的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

3月14至27日 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李瑞环当选全国政协主席,叶选平、吴学谦、杨汝岱、王兆国、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艾则孜、洪学智、杨静仁、周培源、邓兆祥、赵朴初、巴金、刘靖基、钱学森、钱伟长、胡绳、钱正英、苏步青、侯镜如、丁光训、董寅初、孙孚凌、安子介、霍英东、马万祺当选副主席。大会通过政协八届一次会议政治决议和关于修改政协章程第4章第41条政协组织任期的决议,决议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地方委员会的每届任期一律定为5年。叶选平在会上作了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报告,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了5年提案工作情况的书面报告。李瑞环在闭幕会上作重要讲话。会议期间,委员们列席了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

3月15至31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局面。本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荣毅仁为副主席;乔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田纪云、王汉斌、倪志福、陈慕华、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秦基伟、李锡铭、王丙乾、帕巴拉·格列朗杰、王光英、程思远、卢嘉锡、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甘苦、李沛瑶、吴阶平为副委员长;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刘华清、张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选举任建新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思卿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表决通过新一届国务院组成人员,朱镕基、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为国务院副总理,李铁映、迟浩田、宋健、李贵鲜、陈俊生、司马义·艾买提、彭

佩云、罗干为国务委员。大会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分7个部分,即:1.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五年;2. 争取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3. 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4. 认真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5.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6. 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7. 关于我国的外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等文件。并通过了全国人大8个专门委员会(民族、法律、内务司法、财政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外事、华侨和环境保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

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还以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与1993年计划的决议、关于1992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3年国家预算的决议。会议还逐项表决通过了下列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包括三个附件和区旗、区徽图案、关于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立法会和司法机关产生办法的决定;关于批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关于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建议》的决定;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关于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准备工作机构的决定。在表决之后,国家主席江泽民、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先后发表了重要讲话。

江泽民主席指出,从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来说,今后的五年,对于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是很重要很宝贵的时期。胜利地完成本次大会确定的各项任务,我们就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迈出重大步伐,就能提前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就能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

文明建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从而为我国以更加雄健的步伐进入二十一世纪,打下良好的基础。他强调,我们要实现今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最根本的是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积极、全面、正确的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乔石委员长讲话指出,八届全国人大任期的五年,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发展目标的关键时期。八届全国人大要在前几届人大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面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和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提前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并为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积极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他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组织形式。八届全国人大要继续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根本任务,努力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能,使全国人大更好地履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崇高职责。他还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律作保障。八届全国人大要围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改革的精神加快立法步伐,特别是要把经济立法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要求力争在本届全国人大任期内,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推动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也要抓紧制定保障公民权利,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加强廉政建设以及促进科学、教育、文化发展和国防建设等方面的法律。

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预定议程后,于 31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

3月16日 国务院秘书长罗干代表国务院向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调整方案：1. 拟撤销能源部、机械电子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商业部、物资部等7个部。2. 拟新组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国内贸易部等6个部委。3. 拟更名对外经济贸易部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4. 拟保留34个部、委、行、署。5. 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委41个，有国务院办公厅、外交部、国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部、地质矿产部、建设部、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部、国内贸易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卫生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经过改革和调整，国务院将设直属机构13个，办事机构5个，共设置18个，比现有44个减少26个。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的国家局。

3月24日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人事部部长赵东宛应邀就我国的机构改革、公务员制度、新的工资制度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他说，这次的机构改革是全方位的。在政府部门机构改革的同时，党的机关、政府的事业单位和部分群众团体也要进行改革。现在全国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干部有几百万人，这次改革将精简25%的人员。关于推行公务员制度的问题，他说，党的十四大后，这项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一是对公务员条例进行了修改；二是拟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三是继续对干部进行培训；四是准备好了公务员的工资制度；五是各省市都在做准备工作。可以

说,推行公务员制度的准备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各项工作都已基本就绪。关于新的工资制度,他说,新的工资制度将在今年适当时候实施。这一新的工资制度包括五个原则:一是要根据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不同的特点,实行不同的工资制度;二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都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增长;三是要建立正常的晋级升级制度;四是要根据生活费用指数来适当调整工资标准;五是要改革现在存在的地区倾斜制度。他还说,实行这一新的工资制度,在政府机关是公务员制,也就是职务等级工资制;在事业单位是工资和专业技术岗位责任制挂钩。事业单位的工资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固定工资,占70%;还有30%是活的工资。他并强调,这次工资改革特别注意了如何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学校、医院、新闻单位、科研单位和艺术家们的工资将有所提高。

3月28日 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置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八届全国政协设置提案、学习、文史资料、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医药卫生体育、法制、民族、宗教、妇女青年、华侨、祖国统一联谊和外事委员会。各委员会在常委会和主席会议领导下进行工作,日常活动由秘书长协调。八届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会上讲话。他说,新一届人民政协开展工作的5年是我国发展进程非常关键的时期。在这5年中,我们要完成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要为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做好准备。这5年的任务是宏伟的、令人鼓舞的。但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将是很多的。他强调,今后5年我们政协如何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实施本届大会确定的方针任务,关键是选好角度,发挥优势。他还说,对政协来讲,需要研究如何把我们特有的事情干得更好,如何把我们与别人共有的事情干得更能体现政协的特点和优势。总之,在如何使政协的工作尽职而不越位,切实而不表面,更加生动活泼、富有成效方面,需要我们

大家都来动动脑筋。只要我们常委会这个集体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就一定能够不负众望，共同把工作做好。

3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大会上获得通过。根据该项议案：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后两句，修改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末尾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宪法第七条修改为：“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宪法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宪法第十五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宪法第十六条修改为：“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宪法第十七条修改为：“集体经济组织在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宪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修改为：“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

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宪法第九十八条修改为:“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

3月30日 中国代表金永健在曼谷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亚洲区域筹备会上,阐述中国政府关于世界人权大会和人权活动的6点主张,呼吁亚洲和世界人民求同存异,达成共识,推动亚洲和国际保护人权事业的进步。中国代表主张:人权会议应优先审议由于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殖民主义、外国侵略与占领等造成的大规模粗暴侵犯人权现象,并为制止这些行为寻找更为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应当重申《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中关于尊重国家主权的原则,以此作为保障人权的前提;应当尊重各个国家和人民享有的民族自决权,各国有权自由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应当重申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应当促进对国际人权文书全面和完整的理解,强调各类人权的不可分割和互相依赖性,应当提倡在互相尊重、平等交流的基础上进行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

3月31日 国家主席江泽民发布第三号主席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包括《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等3个附件),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将于1999年12月20日实施。这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根本大法,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对包括中央和澳门的关系、居民的基本权利、政治制度、经济、对外事务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

同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闭幕会上通过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对“八五”计划主要指标所进行的调整,认为把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由原定平均每年6%调高到8—9%,是适当的。决议强调,今后五年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

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全面地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凡是条件具备的,要搞得快一些。条件不具备的,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决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迈出重大步伐。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大胆实践,积极探索。决议还对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要地位,加强对农业的领导和指导;各级政府要注意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善于抓重点、抓薄弱环节,努力保持国民经济协调持续地发展;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努力推进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坚定不移地执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以及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努力目标。决议最后号召: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振奋精神,万众一心,努力奋斗,开拓进取,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更大胜利。

4月8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邓小平同志的著作,近来已由民族出版社用5种少数民族文字印行80余万册。

4月13日 海南隆重庆祝建省办特区5周年。江泽民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创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设计并始终关注和支持的一项崭新事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决策,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为全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发挥着试验、探路和积极推动的作用,并以自己宝贵的经验为丰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做出了贡献。他还强调,当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对我们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进行

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时机。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扎实工作,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经济特区要办得更活更实更富有生机更有成效,继续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继续走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前列。随后,江总书记又于14至20日对海南经济特区进行了考察。考察中,当谈到学习和借鉴外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时,江总书记说,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行相互配套、相互促进的一系列改革。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后起的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搞市场经济已搞了多年,积累了许多经验,凡是符合市场发展规律,有利于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东西,我们都要努力学习,认真借鉴和吸收,这对于我们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很有益处的。他并强调,要促进全国经济建设上新台阶,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不懈地狠抓落实党的十四大和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精神,在这方面必须下真工夫和细功夫,来不得半点花架子和形式主义。各地要把中央的精神同本地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一定要做到两条:一是各级领导干部自己首先必须吃透中央的精神,然后认认真真传达下去,让所有的干部和群众都了解和掌握;二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农村、深入工厂、深入学校,全面熟悉本地的实际情况,并坚持与中央精神相结合,同基层干部和群众一道,共商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具体办法,同时加强分类指导,使我们的改革和建设又快又扎实地向前发展。考察期间,江总书记还看望了驻守边防海岛的解放军官兵,勉励指战员以边海防驻地之家,为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做出新贡献。

4月27至29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这是海峡两岸授权的民间团体的最高负责人间的首次会谈。会谈取得了积极成果,双方共同签署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岸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

《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等4份协议。汪辜会谈的圆满成功，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迈出历史性的一步。此前的4月8至10日、23至25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副董事长邱进益还就“汪辜会谈”先后进行了两次预备性磋商。

5月3至10日 共青团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共青团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团结带领各族青年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奋斗》；修改了团的章程；选举产生了共青团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李克强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这次大会认为，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将团的建设和改革推向更广阔的背景、更高的起点，为此，大会要求：各级团组织必须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服务经济建设全局，适应改革开放进程，遵循青年成长规律，按照报告提出的要求，加强团的建设，推进团的改革，使共青团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5月17至21日 全国政协八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议部分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决定，通过了八届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名单。

6月5至9日 全国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提供的材料表明，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建设都有了新的发展。我国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人数已从解放初期的1万多人发展到目前的228万多人，全国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4个自治县政府的主要领导，都已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干部担任。截止到1992年底的统计，全国党政及群众团体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中少数民族干部有2.9万人。此外，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结构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政治业务素质有了较大提高。在少

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中,党员干部占 37.7%,女干部占 26.6%,40 岁以下的占 40%以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 75%。在企事业单位中少数民族专业技术干部也已达 147 万,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 64.4%。6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与出席座谈会的代表进行了座谈,座谈中他指出,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只有妥善解决民族问题,才能推进社会历史健康发展。他强调,大力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形势下,民族干部工作总的要求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坚持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深化改革,完善制度,改进方法,努力创造有利于少数民族干部健康成长和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6 月 15 至 19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上海召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与会同志交流了党的十四大以来理论界研究的新成果,并就如何进一步深化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在闭幕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综合国力所以能够上一个大台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能够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不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我们的发展道路所以能够如此清晰和开阔,根本原因就在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强调,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这是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党的建设、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战略措施。他还指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首要的是学习好这一理论,掌握它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抓住精髓,把握实质,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这是贯通这一理论的主线和核心。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反复锤炼而形成的科学思维方法和创造精神。学习这一理论,就要掌握这个精神,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我们观察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基础。他特别要求,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关键是武装好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并强调,落实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理论工作队伍负有重要责任。要根据党的十四大的要求,紧密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宣传、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鼓舞全党全国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奋斗。他最后说,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既是紧迫任务,又是长期任务。各级党委和宣传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制定规划,推广经验,努力在全党造成浓厚的学习空气,充分发挥这一理论对全党的思想指导、意志凝聚和精神推动的伟大力量。

6月22日至7月2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并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及其组成人员名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葡萄牙文本的决定。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国和摩尔多瓦共和国、中国和玻利维亚共和国领事条约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乌克兰三国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决定。通过批准1992年国家决算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的人选名单,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重点、组成人员守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法工委主任任免名单,以及任命专门委员会顾问的名单等。会议还根据李鹏总理提出的议案,决定免去李贵鲜兼任的中国人民银行

行长的职务,任命朱镕基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乔石委员长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法问题,强调要抓紧时机努力做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立法工作。并强调在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过程中,要注意6点:立法要同改革开放进程相适应,局部利益要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经验;地方人大立法是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立法的重要补充;要更好地发挥专家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在加快立法步伐的同时,注意提高立法质量。

7月21至23日 全国机构改革工作会议有京举行。会议强调要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和实施意见,李鹏总理给会议写了信。罗干在会上作了报告,国家主席江泽民同与会代表进行了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机构改革是一项战略举措,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机构改革是深化经济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紧迫任务,也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战线、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客观需要。他并强调,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体制的革命,没有解放思想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很可能一事无成。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我们就能从我国国情出发,妥善处理各种矛盾,积极而稳妥地推进改革。

8月9至13日 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江泽民在与会议代表座谈时强调,中国的事情要办好,归根到底取决于党的自身建设和党的领导。只要我们党是坚强有力的,党的队伍是团结巩固、步调一致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前程似锦。他还指出,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总体布局和目标,是牢牢掌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改革,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

振兴中华的希望所在,也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使命。他并强调,加强党的建设,首先必须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他说,领导班子建设,组织建设是基础,思想作风建设是根本。抓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要认真学习和掌握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努力做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科学态度的统一。二是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增强全局观念,严肃纪律,保持全党组织上、行动上的高度统一,保证党和国家政令畅通,三是加强廉政建设,自觉抵制和反对消极腐败现象,为党员和干部作出榜样。他在讲话中还要求县以上领导机关要高度重视并扎扎实实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胡锦涛也在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共分6部分:1.充分认识加强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认真学习和全面正确地掌握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3.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保证党在组织上行动上的高度统一;4.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5.树立务实创新、真抓实干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6.加强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主要领导要切实负起责任,一级抓一级。

8月14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自1993年10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包括18章88条,对国家公务员的遴选、奖惩、义务与权利、考核、纪律等诸方面均作出明确规定。

8月19日 江泽民总书记就李登辉被国民党十四大(8月16日至22日在台北市举行)选为新一任国民党主席事,致电李登辉表示祝贺。

8月20至25日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在京举行。全会的主要议题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研究在新形势下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思路 and 对策,动员各级党

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落实党中央关于近期内反腐败的工作部署，保证和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为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服务。江泽民总书记向 21 日的大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反对腐败是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必然要求，是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的重要保证。他明确提出，近期反对腐败要着重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1.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特别是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要起表率作用。2. 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大案要案。重点查办发生在党政领导机关和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中的案件。3. 紧紧抓住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突出问题，刹住群众最不满意的几股不正之风，年内要见到明显成效。他还强调，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推进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这次反腐败，在党政机关进行，重点放在党政领导机关和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经济管理部门。他并在讲话中要求，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工作，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党政一齐抓，主要领导同志亲自负责。党政同心同德，各方面协调一致，形成整体合力。要建立责任制，明确分工，专人负责，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这次全会还全面分析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提出了新形势下反腐败斗争的思路、对策和当前任务。全会提出：反腐败要紧密结合重大改革措施和行政、经济决策的实施来进行；反腐败要抓好两方面的任务，一是要坚决惩处腐败分子，二是要坚决克服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包括纠正不正之风；反腐败要加强法规和政策的研究，及时规范行为，把惩治腐败纳入法制轨道；反腐败要加强综合治理，既治标又治本；在反腐败斗争中，对广大党员主要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全会并审议通过了尉建行代表中纪委常委会作的《适应新形势，深入反腐败，为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服务》的报告。全会指出，反腐败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又是紧迫的。要坚决持久开展斗争，又必须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当前全党要着重抓好三项工作，务必在近期取得阶段性成果。三项

工作为：1. 落实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带头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2. 查办一些大案、要案。3. 狠刹几股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

8月23至25日 “93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就共设法学教育研究、婚姻亲属法研究、两岸知识产权保护、两岸投资权益保障等议题进行探讨。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等60位台湾人士和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陈先中教授等100位大陆人士与会。江泽民并于21日，会见了莅京参加会议的章孝慈。

8月25日至9月2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会议批准了中国和古巴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批准了中国和乌克兰领事条约，通过了关于选举、补选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还通过了各项任免事项。

8月31日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说明书。说明书阐明了台湾问题的由来、现状和解决的办法，是实现国家统一的纲领性文件。

9月1至6日 中国妇女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胡锦涛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黄启瓏受全国妇联六届执委会的委托向大会作报告，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等接见全体代表并出席大会。会议期间，朱镕基向大会作了关于我国经济形势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新领导机构，陈慕华继续担任全国妇联主席，推选黄启瓏为书记处第一书记。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妇女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决议》，以及关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

9月11至14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政府法制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加快市场经济立法步伐和改善政府立法执法工作。据悉，自1979年以来，国务院已制定了近700个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法定权限制定了上万个规

章。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会议最后一天会见与会代表时讲话指出,全国各级政府的领导同志要重视政府法制工作,把法制建设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摆到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要依法执政,促进我国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他强调,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当前我们的政府立法工作要把做好经济立法工作作为重点。与此同时,我们要做好社会发展、社会治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立法工作。他还强调,在做好政府立法工作的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工作。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向会议提出了政府立法当前的四个侧重点,一是规范市场主体的立法项目;二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立法项目;三是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的立法项目;四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项目。

9月15日 国家民委发布《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和《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两条例均于8月29日获得国务院的批准。

9月21至24日 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燕山石化公司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在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如何适应贯彻落实国有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深化企业内部改革,进一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要求,切实加强和改进企业党的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于23日同与会代表进行了座谈。座谈中他指出,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增强活力,提高素质,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本质特征就在于把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市场机制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结合在一起,把市场在资源合理配置上的长处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运转得更好更有效的崭新的经济体制。这就必须通过改革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以巨大的实力、旺盛的活力进入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这需要有一个过程,要作出艰苦的努力,但是我们必须解决好。在谈到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领导体制的问题时,他

说，党的十四大重申了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三句话互为依存，不可分割，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所必需的。“三句话”的方针，是对多年来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内部领导体制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他在讲话中还阐述了企业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以及加强和改进企业党的建设的不关系。他指出，企业党组织要紧密结合企业改革和生产经营开展工作，为企业改革和发展服务，在这个过程中体现政治核心作用。这是新形势下改进和加强企业党建工作的一个突出要求，必须坚定不移。企业党组织要积极主动地参与企业改革和发展中重大问题的决策，探索新的工作方式，真正把党的活动渗透到企业改革和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中去。他还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国有企业党的工作者队伍和整个企业工作者队伍几十年的贡献，希望大家进一步振奋精神，积极工作，再创新业，再立新功。

10月4日至11月2日 首期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班在中央党校举办，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在开班时强调，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项根本性工作，关系到我们党、我们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都要把组织全党认真学习和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项根本任务坚持不懈地切实抓好。江泽民总书记于10月22日听取了学员代表的学习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切实按照党的十四大要求坚持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肩负重任，必须下决心坚持不懈地学习和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尽心尽力地做好各项工作。他还强调，邓小平同志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非常丰富,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党的十四大报告从9个方面概括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我们都要学习和掌握。他着重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要真正掌握这个精髓,必须用心把邓小平同志著作中贯穿和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学到手,他并要求各地各部门和军队的同志高度重视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这件大事,无论工作多么忙,都要逐级负责,一级抓一级,把学习组织好,务求取得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做到学习和工作两结合、两促进。

10月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近期抓好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带头廉洁自律,查办一批大案要案,狠刹几股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等三项工作。

10月6至9日 全国政协八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京举行。朱鎔基代表国务院向会议作了《当前国家形势和对策》的报告。李瑞环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他强调,人民政协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一种体现,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创造、一个特色、一大优势。他要求人民政协做好参政、议政工作,促进领导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会议还通过了全国政协八届部分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增补名单,任命周干峙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通过了撤销禹作敏八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10月8日 中纪委、中组部、监察部制定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五条规定”的实施意见》,经中央同意发布执行。

10月14、15日 中共中央分别邀请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的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和一些专家,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座谈会,就准备提交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讨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江

泽民总书记就这个决定的起草情况向党外人士作了说明。他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须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根据这个精神，今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十四届三中全会要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定。他还介绍说，在着手起草决定的同时，还组织了有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以及地方同志参加的专题调研组，文件起草工作是和调研工作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他并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解决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我们的经验还不足，在座的各位同志都十分关心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有很多好的见解，希望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把这个决定搞得更好一些。

10月22日至31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国家主席江泽民分别签署了公布这几个法律的主席令。乔石委员长在会议的闭幕会上讲话指出，当前，人大及其常委会面临的任務相当繁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特别是加快经济立法，力争在今后几年内逐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框架。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国和西班牙王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以及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白俄罗斯共和国、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等4国签定领事条约的决定，通过了内务司法委员会等关于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和若干任免事项。

10月24日至30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胡锦涛等出席了开幕式。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贺词，张丁华作了工作

报告。朱镕基向大会作经济形势报告。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工会十二大代表和主席团常务主席。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大会选出了全总第十二届执委会，尉建行当选为全国总工会主席，张丁华等九人当选为副主席，张丁华被推选为全总书记处第一书记。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一届执委会工作报告等4个决议，会上还宣布分别授予1465位同志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优秀工会积极分子、荣誉工会积极分子称号。

11月1日至3日 全国农村宣传思想工作座谈会在杭州举行。会议提出，农村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农村党员，教育广大农民；要积极引导农民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

11月2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该书收入邓小平同志1982年9月至1992年2月这段时间的重要著作119篇。编辑工作在作者亲自指导下进行，全部文稿都经作者逐篇审定。中共中央于当天在京举行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新一卷《邓小平文选》，是1982至1992年这十年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富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引导我们继续胜利前进的科学指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汇集了邓小平同志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的最重要最富有独创性的著作。它立足的基础是党和人民的崭新实践，它的光辉价值已经并将继续在我们的实践中得到证实。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灿烂光辉。他强调，理论思维的成熟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改革开放十五年来，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

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还指出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并代表党中央向全党发出号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努力学习新一卷《邓小平文选》,把十四大提出的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认真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领导作用。让我们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团结一致,扎实工作,艰苦创业,奋勇前进!在学习报告会上,胡锦涛还代表党中央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决定》指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已经出版发行,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党同志都要高度重视,认真学习。《决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本指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团结一心,扎实工作,为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11月3日至7日 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向会议作了题为《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工作报告。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共分4个部分。第一部分概括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主导中国社会发展的6个根本性问题。第二部分阐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6个方面客观必然性。即:1. 爱国统一战线是实现广泛团结,凝聚人心,完成新时期总任务的基本保证。2. 爱国统一战线是多党合作,参政议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形式。3. 爱国统一战线是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4.

爱国统一战线是体察民情,反映民意,密切党同群众联系的重要渠道。5. 爱国统一战线是安排人事,合作共事,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必要途径。6. 爱国统一战线是联络友谊,沟通感情,促进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桥梁纽带。第三部分总结了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统一战线工作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继承传统,积极探索,创造出的一些适应新时期要求的重要原则和方式方法。它们是:1. 坚持平等相待,充分尊重统一战线中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及其广大成员。2. 坚持民主协商,在协商过程加强党的领导。3. 坚持求同存异,正确对待统一战线中的各种差异和分歧。4. 坚持自我教育,不断提高统一战线成员的思想素质。5. 坚持真诚服务,切实帮助党外人士解决实际问题。6. 坚持广交朋友,注重做好党外代表人物工作。7. 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做好统战工作。8. 坚持抓紧抓细,把各项统战工作落到实处。第四部分,提出了当前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领导的4项要求,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也于11月7日同与会代表进行了座谈。座谈中他强调,为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党的统战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发展,不能停顿。各级党委都要把统战工作看作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这个法宝牢牢掌握起来,作为党委工作的重要一环。他提出要使我们党的统战工作形成新的气势,开创新的局面。这种新气势、新局面,要体现在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中各界群众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之上,要体现在为我们党和政府广交朋友、广纳群言、广求善策之上,要体现在为促进政治稳定、促进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促进祖国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做贡献之上,而最根本的是要促进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把我国经济建设搞上去。这也是我们党对新时期统战工作的基本要求。他还就民族、宗教和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等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

11月11至14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

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共50条,分10个部分:1.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2.转换国有企业经济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3.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4.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5.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6.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7.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8.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9.加强法律制度建设;10.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奋斗。全会认为,《决定》把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是九十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必将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全会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开创性的伟大事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相互促进,相互统一;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重视群众切身利益;实行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统揽全局,把更大的精力集中到加快改革上来。当前要紧紧抓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和金融、财税、计划、投资、外贸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制定具体方案,采取实际步骤,取得新的突破。全会还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和自觉性。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

发展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切实抓好廉政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在全会的最后一天,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分三个部分。讲话的第一部分江总书记概括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讲话的第二部分江总书记阐述了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4个问题。即:1.正确处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他强调要按照这次全会精神,不失时机地推出已经准备好的各项改革措施,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条件。还强调多少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抓好两件大事,一是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二是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他要求要根据《决定的要求》,扎扎实实地深化企业改革,真正把国有企业搞好,使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和骨干作用。2.正确处理加强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他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他指出1993年的实践证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这两个方面共同努力。每个时期工作的着重点可以有所不同,但切不可在强调一个方面的时候,忽视以致放松了另外一个方面。3.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他强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要始终如一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过深刻教训的,决不能重复一手硬、一手软的错误。他要求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和执法工作,依法惩治各种犯罪活动。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时继续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廉政建设,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必要条件。4.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他指出,《决定》对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规定了方向和

原则,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既符合国际上的通常做法,也考虑了中国的特点和具体情况。这样做,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好,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他强调,我们的方针,是充分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力量凝聚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上来。讲话的第三部分,江总书记就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讲了三个问题,即:1.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他指出,中央已经作出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全党同志特别是县以上领导干部一定要结合实际,认真学习。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认真研读原著,掌握精神实质,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加以贯彻。2.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他就此强调了三点:一是必须坚持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二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三是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3. 加强调查研究,改进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他指出,1994年是推进改革的很重要的一年,任务十分繁重,一定要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努力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经济环境。为此,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把握和处理好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坚持唯物辩证法,避免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排除干扰,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要深入改革和建设第一线,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不断总结经验,善于运用群众创造的经验来引导群众前进。

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圆满结束各项议程、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后胜利结束。这次全会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两大奋斗目标。一大目标是发展的目标,即达到小康,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另一大目标是改革的目标,即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大目标交相辉映,双放异彩,为我们展现出一幅锦绣中华面向新世纪崛起腾飞的壮丽蓝图。这次全会又是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的

会议。会议通过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论述，特别是1992年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的精神，将党的十四大确定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决策，进一步具体化和系统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这对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向前发展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全会胜利结束的直接结果将是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随之开创出崭新的局面。

11月25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反腐败工作座谈会。国务院召开这次会议，目的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贯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交流前一阶段反腐败斗争的成功做法，检查和督促各部门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工作，研究这一斗争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决定真正落到实处，把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引向深入，保证在近期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在听取了铁道部、农业部、电力部等三部门关于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工作介绍后，李鹏总理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反腐败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他要求国务院各部门：1.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抓好近期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2. 要精心组织指导反腐败斗争，集中力量抓落实，抓出成效。3. 把反腐败斗争与廉政建设紧密结合起来。4. 鉴于元旦、春节将近，两节期间各级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廉洁自律，做好表率。

11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第二期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结业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根据中央已举办的两期省部级学习《邓小平文选》研讨班的经验，提出学习邓选第三卷要在4个方面作出努力：1. 提高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增强学习的自觉性。2. 认真研读原著，在系统学习中把握精神实质。3. 在认真阅读和领会原著的基础上，围绕一些重大问题组

织好研讨。4. 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注意总结经验教训。他并强调指出,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表明我们党对建立新经济体制在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以后,开始了实践上全面推进的伟大飞跃。他说,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必将出现一个以贯彻落实《决定》为主要内容,以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为基本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好更快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局面。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适应和促进这个局面的发展。他要求在新的形势下,要把学习和贯彻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同学习运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摆脱那些不合乎当代中国实际、不合乎时代进步潮流的陈旧观念的束缚,大胆实践,勇于创新。要引导干部和党员正确对待随着改革深化必然要加以调整的各种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经济发展,保持社会政治稳定。

12月9日至11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在京举行。李鹏总理到会讲话指出,英方单方面中止了谈判,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理应由英国政府承担。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会影响中国政府恢复行使香港主权、维护香港稳定繁荣的决心和信心。会议还审议了预委会专题小组提出的工作报告,通过了新闻公报。

12月18日至20日 全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上海举行。

12月18日至23日 海协、海基会首次在台北就落实汪辜会谈有关协议进行工作商谈,重点商谈了遣返劫机犯和海上渔事纠纷处理等问题,并取得了积极成果。

12月20日至29日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公司法。以及关于修改会计法的决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

暂行条例的决定,关于我国加入《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的决定,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部门对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关于召开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决定等。会议还通过了若干任免事项。2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第16、17、18号主席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决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等。

12月21日 《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毛泽东年谱》出版发行。

同日 全国人事厅局长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改革人事管理体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12月21日至25日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期间,江泽民、李鹏同代表进行座谈,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提出的1995年政法战线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强和改革政法工作,强化人民民主专政职能,坚决打击敌对势力和各种犯罪活动,在反腐败斗争中抓紧查处大案要案,大力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保障和服务,进一步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的安定。

12月25日至28日 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在京举行,李瑞环作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关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决议。决议要求,人民政协的各参加单位和全体政协委员要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把思想统一到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中共十四大精神上来,统一到《决定》上来;要围绕《决定》的贯彻实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和研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带有倾向性的问题,踊跃建言,参政议政;要在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切实抓好廉政勤政建设等方面,积极开展民主监督;还要利用广泛联系各方面人士的有利条件,对新旧体制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利益调整 and 认识问题,多做思想工作,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为促进各项改革的顺利实施和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会议还通过了在1994年3月召开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的决定。

12月26日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在京举行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会。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总结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阐述了邓小平同志继承、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

中央致叶挺两则电文释疑

余海明

中央档案馆所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一书中收有下面两则中央致叶挺等人的电报。

一,1941年1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等:

“你们率主力已突围出来,甚慰,望鼓励士气,坚持到底。迅达苏南,军中一切由希夷(即叶挺——作者注)作主,小姚(即饶漱石——作者注)辅之,全军应服从希夷命令。重庆方面,正在交涉,但你们不要靠望,一切靠你们自己。”^①

二,1941年1月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等:

“(甲)闻你们率傅秋涛部两团突围,甚为喜慰,望速赴苏南。

(乙)你们突围者人枪多少,现至何地,情况如何。在茂林被围者人枪多少,何人指挥。望即告,以便交涉。”^②

上述两则电文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当时叶挺已率傅秋涛两团突围出茂林;二是部队中仍有一部分人被围困在茂林。除上述两则电文外,周恩来、叶剑英(当时在重庆)1月13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有“本日公开告诉刘为章说:(一)叶、项等及其主力,已经突围出重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页。

^②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8页。

围,进至泾县、宁国间有一小部后方,尚在茂林山中被围”^① 等语。这说明中央已把所谓“叶挺已率主力突围出茂林”的消息转告给周、叶,并叫他们公开告诉刘为章。显然,这些电文是和事实不符的。因为自从1941年1月4日,驻在皖南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的率领下奉命北移,从云岭驻地出发,6日在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包围袭击,新四军陷入国民党六万余军队的重围中,叶挺军长自始至终(1月14日谈判被扣)都没有离开过新四军军部及部队,更没有率领傅秋涛部的两个团突围。实际上,在1月12日中央打电报给叶挺时,新四军中只有傅秋涛两个团突围出小包围圈。笔者查阅了新四军被围期间致中共中央及江北刘少奇、陈毅处的电文,都没有讲到“我们率傅秋涛部突围出茂林”之类的电文,上述电文内容令人费解。而且毛泽东等在1月13日和14日致重庆周恩来和叶剑英的电报中就否定了上述说法。1月13日的电报中说:“希夷军部率六个团仍在泾县以南茂林地区围困中,并没有出来,现粮尽弹绝,处境极危,有全军覆没之可能。”^② 1月14日电报中说:“突围者是傅秋涛两个团,亦尚未脱离大包围圈,叶、项、姚主力尚在茂林原地,被数万大军围攻。”^③ 这说明中央此时已知道叶挺并没有率主力突围出去。

那么,中央为什么在12日和13日的电报中说:“叶挺已率部突围出来”呢?中央的错误消息源于何处呢?我们可以肯定,叶挺是不会打电报告诉中央说他“已率主力突围出去”的,因为叶挺一直和军部在一起,根本没有突围出去。那么,此错误消息源于何处呢?

笔者在查阅资料中发现1941年1月10日叶挺、饶漱石在被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42页。

②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8页。

③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46页。

围中给刘少奇、陈毅的电报，电文如下：

“我等待秋涛两个团已打到泾县、宁国间，余均被围于茂林附近山地，敌大我五、六倍，突围困难，死守硬拚到最后一人，惟粮弹不济，恐守不住。……”^①

显而易见，这则电报原文第一句有错误，“我等待秋涛”无法解释。笔者认为，“我等待秋涛”应为“我军傅秋涛”之误。我们知道，自1月6日我皖南新四军陷入国民党顽固派六万军队的包围后，到1月10日前只有傅秋涛同志率两团突围出小包围圈。因而上述电文中“我等待秋涛”应为“我军傅秋涛”之误，只有这样，电文才通顺。史学界已有人对此作了纠正^②。这则电文中只讲到傅秋涛两个团已突围出去，叶挺等率其余的人仍被围困于茂林附近山地。除了这则电文外，在1月14日前再也没有其它报告皖南新四军任何其它一部突围出去的电报，因为自始至终只有傅秋涛率两个团突围出茂林（但也未出大包围圈）。

这则电文是叶挺、饶漱石1月10日打给刘少奇、陈毅的，中央档案馆所藏电文原件是刘、陈所收到和看到的电报，而不是叶挺军部所发电报的底稿（因为皖南新四军在1月13日分散突围时烧毁了所有的机密文件，不会留有此电报的底稿）。对这则有误的电文，我们可以作如下的推想：

电报在刘、陈看到前，其中的“我军傅秋涛”被电报人员误记或误译为“我等待秋涛”。当时的情况可能是这样：叶挺向机要科人员口述电文后，由于战地情况紧张，机要人员极有可能把“我军傅秋涛”记为“我等待秋涛”发给刘、陈。刘、陈看到此有误电文时，一定又把有误的电文“我等待秋涛两个团已打到泾县、宁国间，余均被围困于茂林附近山地。”理解为“我等带秋涛两个团已打到泾县、宁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页。

^② 段雨生等：《叶挺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00页。

国间，其余的部队均被围困于茂林附近山地”。因为刘、陈在1月10日前并不知道皖南新四军中到底是哪些突围出去（而我们今天知道，就不会这样理解），因而他们就不会想到“我等待秋涛”是“我军傅秋涛”之误。而很容易认为“我等待秋涛”是电报员把“带”误记为“待”，因为他们考虑到战争的紧张环境及电报人员的文化水平，而且“带”误记为“待”，读音相近，这是合乎情理的。

刘、陈收到此电报，误以为“叶挺、饶漱石等带领傅秋涛两团已打到泾县、宁国间”，就把此消息转告给中央。从时间上看，叶、饶是10日打电报给刘、陈的，对此重大军情，刘、陈一定马上转告给中央，因而中央在12日前一定能知道此消息，这在时间上是合理的。中央从刘、陈那儿得知此消息，因而才有1月12日和13日给叶挺等人的上述两则电报。

综上所述，中央的有误消息是源于刘少奇和陈毅，而刘、陈对电文的误解是由于电报员的误记或误译所造成的。